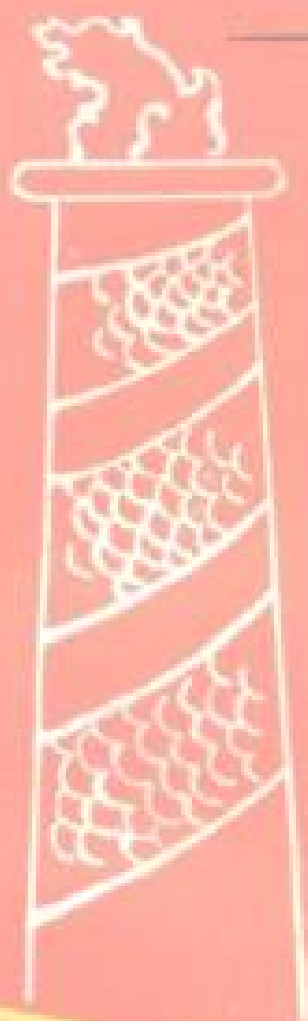


共和国走过的路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49—1952



中央文献出版社

K27 (2) 78835

《党的文献》丛书



200212233

共和国走过的路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

(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编辑部
中 央 档 案 馆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共和国走过的路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

(1949年——1952年)

GONGHEGUO ZOUGUO DELU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1740信箱)

新华书店经销 昌平县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10.75印张 250,000字 000,001--5,000册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3-0062-5/D·14 定价: 6.30元

献 给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70 周 年

《党的文献》丛书

主 编：刘武生

副主编：唐 群 顾龙生

编 辑：孙 钢 吴雪生 杨茂荣

王明鉴 侯俊智 孙东升

《党的文献》丛书编者的话

《党的文献》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的内部刊物。它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内部刊物《文献和研究》(1982年4月至1987年12月,共出刊51期)和中央档案馆主办的内部刊物《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3月至1987年12月,共出刊9期)合并而成的。《党的文献》的基本内容是:公布党的历史文献档案,刊载未曾发表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稿,刊载研究党的文献档案和研究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生平的文章,为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以及党的文献档案编辑研究工作服务。

为充分发挥党的文献档案的社会效益,应广大读者要求,本刊决定将《党的文献》刊载过的部分重要专题文献、重要理论研究文章和党史重要人物、党史重大事件的纪实和研究性文章,陆续汇集成《党的文献》丛书出版,公开发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党的文献》编辑部

目 录

前 言.....	(1)
----------	-------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文献选载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十三日).....	(9)
-----------------------	-------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十三日)	毛泽东 (10)
-----------------------	------------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	刘少奇 (17)
-------------------	------------

一次重要的战略决策会议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情况介绍.....	陈思惠 (27)
-----------	------------

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文献选载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九五〇年一月).....	(36)
-------------------------	--------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	毛泽东 (36)
------------------	------------

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	(43)
-------------------	--------

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45)
--------------------	--------

关于组织劳资发展生产问题复邓子恢电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朱 德 (4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 经济机构大纲(草案)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刘少奇 (50)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陈 云 (53)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刘少奇 (56)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邓小平 (60)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周恩来 (65)

新中国的外交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 (71)

我们不光用军队把敌人打败还要用军队把 中国建设起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朱 德 (76)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建立.....乔东光 (79)

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献选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88)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

代表会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88)

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92)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	(93)
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	(93)
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94)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刘少奇	(96)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毛泽东	(99)
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必须反对形式主义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100)
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有益无害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102)
必须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	(103)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104)
在各地推广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	(105)
必须将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团结各界人民	
的重要工具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05)
关于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工作给廖鲁言的复电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五日).....刘少奇	(106)
毛泽东把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作	

一件大事来抓.....张积毅 (108)

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文献选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九五〇年九月)..... (116)

我们的情况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 (116)

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 云 (117)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 (119)

调整工商业，争取财经情况根本好转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120)

致陈毅电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 (121)

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节录)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刘少奇 (121)

继续稳定金融物价

(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陈 云 (122)

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经工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 (125)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稳定金融物价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126)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调整国家仓库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127)

建国初期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户 佳 (130)

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文献选载

-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九五一年九月)..... (138)
- 中共中央对平稳物价的几项建议
-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138)
- 关于公债及其发行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陈 云 (139)
- 中共中央关于邀请工商业界代表人物分批座谈财经问题致陈云并华东局电
-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 (142)
-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铁路财政统一的决定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143)
- 在全国财政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朱 德 (144)
- 向毛泽东并中央转报邮电部党组关于全国电信会议的综合报告
- (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日).....陈 云 薄一波 (154)
- 中共中央关于失业救济问题的总结及指示
-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58)
- 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一九五一年总收支预算的指示
-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2)
- 中共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一九五一年银行工作方针与计划的决定
-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 (165)
-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稳定沈阳物价通报的批语
-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168)
-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张 韩 哲 (169)
- 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周太和 (178)

关于建国初期土地改革问题的文献选载

(一九五〇年二月——一九五一年九月)…………… (204)

关于新区土改问题致刘少奇电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 周恩来 (205)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

和征收公粮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206)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法大纲中若干问题征询

各中央局的意见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日)…………… (210)

关于转发邓子恢对富农问题的意见致饶漱石

(一九五〇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 (212)

附：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 …………… (215)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给邓子恢的复示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毛泽东 (216)

关于富农等问题致刘少奇信

(一九五〇年六月四日)……………毛泽东 (217)

关于土改报告中不写国际上土地问题历史

致刘少奇信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 (218)

关于加速进行土改等问题致中南局等电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 (219)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应注意防“左”倾

危险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221)

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在经济上应团

结所有的人进行生产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	(222)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概况、特点及其意义 ···诸班师	(224)

关于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的文献选载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九五一年五月)·····	(233)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	(233)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	(235)
镇压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	(237)
对反革命分子判刑可分别不同情况处理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	(238)
大城市应当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239)
要向各界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239)
要取得党内思想的一致和各界人民的拥护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	(240)
镇压反革命应当准确、精细、有计划、有步骤,完全	
由上面控制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	(241)
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	(242)
严格限制镇压范围,控制捕杀批准权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	(243)
镇压反革命要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和派遣	

工作组下去巡视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	毛泽东 (244)
将捕杀批准权分别收回到地专和省级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245)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党、政、军、群团体内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246)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九五一年五月).....	(247)
使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工作要有一些具体组织形式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 (248)
建国初期的镇反斗争概述.....	张 民 (250)
关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的文献选载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九五一年七月).....	(258)
关于我军应当入朝参战致周恩来电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	毛泽东 (259)
关于十三兵团部改组为志愿军司令部致邓华等电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260)
中央军委关于作战方针问题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	
(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	(261)
中央军委关于作战方针及兵力部署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262)
关于持久作战方针和今后作战的指导原则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彭德怀 (264)
关于同敌方代表准备和实行谈判期间我军部署	

致彭德怀等电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毛泽东 (270)

关于和谈致李克农、邓华、解方并毛泽东电(摘要)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彭德怀 (271)

抗美援朝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的考察.....王建华 (272)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文献选载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月)..... (281)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坚决进行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281)

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282)

必须严重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283)

切实执行七届二中全会防腐蚀的决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283)

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285)

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展开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 (286)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要形成有力的

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287)

加强党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的统一领导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88)
对压制群众批评的负责干部要敢于揭露和惩处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89)
各级领导都要亲自“上前线”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	(289)
毛泽东和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汪裕尧	(291)
 关于粮、棉、油统购统销的文献选载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九五四年七月).....	(301)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	
供应的决议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301)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310)
附：中财委(财)关于目前食油的产销情况及	
处理办法的报告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311)
中共中央批准“中财委(财)关于实施棉布	
计划供应和棉花计划收购的报告”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	(317)
附：中财委(财)关于实施棉布计划供应和棉花	
计划收购的报告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317)
粮棉油统购统销的历史作用.....户 佳	(322)

前 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占当时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共和国走过了一条光辉而曲折的道路，饱尝胜利的喜悦、探索的艰辛和失误的苦痛。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发生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挫折。但是，勤劳而勇敢的共和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也没有因挫折而退缩，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是对我们的共和国又一次严峻的考验。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平息了国内敌对势力制造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顶住了国际反共反华势力的猖狂进攻，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这场斗争的胜利，保卫了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信念更加坚定，共和国的步伐更加矫健。

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当我们回顾和思考共和国走过的路时，我们既为共和国的成功经验而欣慰，也为她的失误教训而痛心。回顾过去，正是为了展望未来。总结共和国成功的经验和受挫的教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更好地为共和国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的内部刊物《党的文献》的前身之一《文献和研究》，从1987年第3

期起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文献 档案选载”专栏，围绕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基本上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专题选载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有重要价值的文献档案，并配合发表有关专家、学者或当事人撰写的研究文章。《党的文献》1988年创刊后，继续保持这个专栏。这个“系列片”栏目从开办至今，业已三年多了。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这些文献档案的社会效益，应读者要求，我们将《文献和研究》以及《党的文献》上发表的有关专题文献和研究文章汇编成《党的文献》丛书《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公开出版发行，旨在更好地为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文献档案编辑研究服务。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共有10个专题，收编了从1949年前后构想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蓝图到1952年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献96篇和有关研究文章11篇。在这3年中，共和国人民团结一致，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建立了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反映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文献已经陆续公开发表，没有再收入本书，本书选载的有关重要文献绝大部分是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是对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献的必要补充。这些文献大体上反映出共和国在这一时期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每一个专题配发的研究文章，或介绍历史背景，或阐述文献精神，或总结经验教训，都有一定的

理论分析和较高的史料价值。本书编入的专题文献和研究文章，涉及建国头3年一系列重大事件，犹如共和国走过的路上一个个前进的脚印，构成了共和国头3年历史的缩影。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鉴于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将面临着经济建设的任务，会议对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基本经济政策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探索。《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文献选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夕对建立新中国所作的思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思想，为新中国勾画出一幅大致的蓝图。《一次重要的战略决策会议》一文，对这次会议召开时的形势、会议的议程和议题、会议讨论决定的主要问题以及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作了简要的介绍，有助于读者对当时历史背景和这些文献形成的了解和研究。《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文献选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在建国过程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进行的部分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建立》一文，反映了毛泽东等同志研讨制定建国方略的情景。

建国伊始，旧的国家机器已被摧毁，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相继建立。在人民政权建设初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曾是人民政府密切联系各界人民的纽带，成为党和政府团结各界人民的重要组织形式。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把组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作一件大事去办”。本书收录的《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献选载》，对于我们研究人民政权建设之初就高度重视发扬人民民主的历史经验，是很有价值的。《毛泽东把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一文，说明了毛泽东等同志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召开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

情况。

共和国成立之初,虽然货币已经统一,但就整个财政经济工作来说,基本上还是分散经营的。如果不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任其发展,势必造成物价波动,影响新生共和国的巩固。本书编入的《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文献选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党和国家为恢复国民经济和稳定物价,而在财经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政策和措施。配合刊载的《建国初期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一文,着重回答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的必要性、步骤和内容及其作用和意义等三个问题。

共和国建立头3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这3年里,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努力发展生产,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文献选载》,部分地反映了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采取的重要措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文,介绍了建国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和重要措施、以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一文,根据作者所见所闻,比较具体地论述了1949年至1956年我国经济战线上“三大战役”的历史进程。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已有1.45亿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但是,拥有3.1亿人口(其中农业人口2.64亿)的广大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党中央决定从1950年冬开始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大陆上(除少数民族地区)完成土地改革。本书收入的《关于建国初期土地改革问题的文献选载》,反映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政策的酝酿形成过程,有助于研究建国初期土改政策的变化和特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概况、特点及其意义》一

文,具体分析了整个新区土改的两个阶段,并从路线与政策的关系、土改和生产的关系、放手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四个方面,说明了新区土改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斗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不甘心失败,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坚决镇压反革命,是建国初期一场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收入本书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文献选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建国初期的镇反斗争概述》一文,介绍了这场镇反斗争的背景情况、进行阶段和积极成效。

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悍然出兵,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并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我党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根据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关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的文献选载》,部分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抗美援朝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的考察》一文,概述了这个决策和方针制定、实施的过程,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辉战斗历程。

1951年底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一批腐化分子,教育挽救了一批干部,使年轻的共和国更加兴旺发达。《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文献选载》,基本上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历史原貌,阐明了斗争的重大意义,概括了我们党指导这场斗争的方针政策和主要经验。今天重读这些文献,仍然给人以深切的启迪,并能从中看到毛泽东在领导反腐败斗争中所表

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领导艺术，以及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决心和巨大魄力。《毛泽东和建国初期的反腐蚀斗争》一文，概述了这场反腐蚀斗争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斗争的进程，以及毛泽东在斗争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和总结的主要经验。

粮、棉、油统购统销，是共和国成立后陆续实行的对粮食、棉花、油料等有计划地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一项重大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在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基本商品匮乏的情况下，起了有效保障城乡经济建设需要、广大人民基本生活资料需要和稳定物价的作用。《关于粮、棉、油统购统销的文献选载》，反映了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的基本政策和措施。《粮棉油统购统销的历史作用》一文，介绍了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以及这项政策的历史作用。

总之，在共和国走过的头3年的路程中，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前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在探索中也难免失误，但成就是巨大的，胜利是辉煌的。这是举世瞩目的历史事实。我们编辑《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正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批翔实可靠的思想资料，来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共和国走过的路，以便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阔步行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任重道远，前程似锦。

无庸讳言，本书的编辑工作肯定有不足之处。比如，有的重大事件未能列为专题；有些重要文献没有收编齐全；有的研究

•
文章内容比较单薄，等等。我们期待着读者批评、教正。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刘武生、唐群、顾龙生、孙钢、
吴雪生、杨茂荣、王明鉴、侯俊智、孙东升。本书由金冲及审
定。

1990 年 9 月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 政治局会议文献选载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十三日)

编者按：198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纪念日。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是短短的一瞬，而神州大地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犹如醒来的雄狮，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事业才能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这个重要节日，这里发表一组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历史文献。这组文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夕对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所作的思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思想，为新中国勾画了一幅大致的蓝图。同时，刊载了几篇建国前后有关中共中央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活动的文章。

在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地区发生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妄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共和国，想把中国变成附庸于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十三日)

毛 泽 东

一、报 告

第一,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对国际形势,去年十二月会议曾作过估计。当时党内意见不一致,就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提法是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前一种提法,认为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后一种提法,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我们有任务动员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都这样说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中间派还看不清楚),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我们不应提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我们应该提或者较迟妥协或者较早妥协的问题,最近在柏林问题上就是这样。

我们讲的妥协,不是讲在一切问题上都能妥协(如要决议取

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讲在若干问题上可能妥协:是讲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不是一切问题,而是若干问题,包括重要问题在内。一九四七年苏、美、英等国就同意、罗、匈、保、芬五国订了和约。对德奥、对日的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究会订下来的。英法与苏之间的通商贸易有发展可能,但美苏之间的这种可能会少些。

苏与美英法按民主原则妥协,我们同国民党也来一个妥协吧,中间派就这样想。我看不能这样提。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大西洋宪章也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按民主原则妥协就是斗争的结果。是不是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反动派妥协呢?不能这样提。如能强迫蒋介石照我们的做,解散法西斯组织,不要土豪劣绅,让我们搞军队又搞土地,那有什么不好。但是蒋介石是反动派,他不赞成。从古以来,反动派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英国现在先消灭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对社会上的共产党就慢慢来。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

这是去年十二月会议的三点估计。世界和平,苏联不打仗,对世界人民有极大的利益。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党内也有人这样想。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能够和平生产十年到十五年,苏联能提高生产力到年产6000万吨钢,人家就望也不敢望了。时间已过了三年,只差十二年了。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第二,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饭吃。

作战方式要由游击战争逐渐过渡到正规战争。游击战我们是得了益处的。我们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这二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没有铁轨、车头、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如东北正规化就搞得比较好。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都是同一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正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

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而要如此,就要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就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

建军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时间五年左右即可以,军力四百万即可以。第三年军队数目上不增加,现在我们的军队二百八十万,加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一百四十万,共四百二十万,不足的还要补充起来,如只有一万多的,要补到两万。第四、第五年,还要扩大,到江南后即可以扩大。五百万是包括这一切的。

消灭敌人正规军五百个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第二年九十二个旅,两年已消灭正规军近二百个旅。第二年较少的原因是:一、敌军将二团制改成了三团制;二、东北和粟裕少打了一个仗;三、刘邓^①到大别山后减弱了;四、华野主力在第二年前半年,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②五个月未打仗,东北半年未打仗,但我们还歼敌九十二个旅,一百五十万人,可见国

①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② 陈粟,指陈毅、粟裕。

国民党军队不难消灭。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①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②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可能的。把济南、太原搞下来,刘邓搞南阳,彭^③只要一个月交一个旅就很好。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没理由说不可能。国民党现在有二百八十四个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强有弱,消灭五百个旅,一般的是消灭了两次。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是说把每一个角落都扫清了,如在济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可以说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阎锡山?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是全部打倒。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与公开宣传至少五六年在全国胜利也是符合的。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二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第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一九二七年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采。以后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的规定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这是后来发生的,是因为日本的侵略,现在

① 徐,指徐向前。

②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

③ 彭,指彭德怀。

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一九二七年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与蒋介石合作,是与冯玉祥、李济深、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就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她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会议就必须当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们过去又叫“苏维埃”,又叫“大会”,就成了“大会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也不能反对,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德国、北朝鲜^①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是要开一次,今年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临时再定,其性质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

^① 德国、北朝鲜,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

第四,关于财经统一,不需要多讲。以华北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而金融发行就必须先统。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第五,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实行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不足、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干部会的好处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较容易,代表会要保存干部会的好处,不要太繁杂了。

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如一个候补中委见了打人、杀人他不赞成,但是他讲不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

第六,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做宣传写文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

第七,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与无政府状态。上面说了这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

会畅顺。现在无纪律与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他们没有分田,嗷嗷待哺。这种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将它克服过来。

第八,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我们政权的性质已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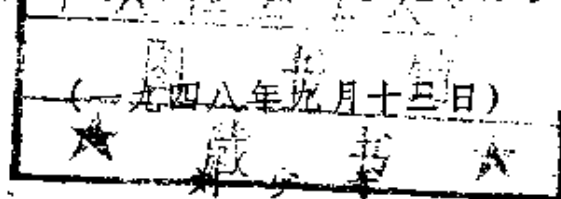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二、结 论(节录)

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的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意思“二七”社论写了。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如汉族同西藏、新疆少数民族的矛盾,回回民的矛盾,在某一个民族内部也有矛盾,这可以用苏联的办法来解决。拿马列主义的话讲,内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工农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分给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了。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①



毛主席的报告和同志们讲的都很好,我都同意。

^① 这是刘少奇 1948 年 9 月 13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记录整理稿发表。标题是编者加的。

毛主席的报告,对今后战争前途的估计,大约五年左右基本上打倒国民党,歼敌五百个旅。这种估计,是稳健的、谨慎的、实际的估计,不是冒险的估计,有过去两年做根据。过去这两年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现在虽然在军队数目上,我们还比较少,但把各方面的优劣总算起来,特别是我军士气旺盛,是国民党万万比不上的;总算起来,现在已是大体平,并过渡到超过它。敌现已处于被动,我已取得主动了。另一方面,敌人也学乖了,仗更难打了,可能第三年更困难了。(毛主席插话:今后三年,不一定更顺利,但也并不一定更困难。)也许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如果济南、太原打了胜仗,打下来了,东北也获得大的胜利,那么,就在九、十、十一三个月中,可能就过了最困难的一关。

我们估计应该是最稳健的,但也要估计到最好的可能。从第三年起,这两三年内,可能有一种突然事变,对国民党蒋介石不利的突然事变,如西安事变之类,而不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对我们不利的。自卫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有起义的,中期少些,后期可能多的。歼敌五百个旅,不一定是那样平均的,每年一百个旅,可能后面更快些。我们的计划不摆在这上面,但可以力争,争取缩短痛苦,早日胜利。自然,早日胜利,可能是“胜利逼人”,而多有两年准备,胜利得比较圆满一些,我们应当很好准备。(毛主席插话:全国胜利恐怕还要十年,十年也不一定全国完全完成土改,而是都实行减租减息。)

我们是为统一全中国而斗争,为党内统一,为国内统一。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现在是由我们统一全中国。过去十年内战中,我们没有这样提,而现在我们提出统一全中国。统一这个口号在党内党外都应强调,这个统一是以我们为领导的统一。这次战争初期,我们曾估计大、中、小三个前途,结果是按照我们的理想越打越大了。因此,我们提出: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

(毛主席插话:我们的口号是民主的统一,所谓统一,就是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国家就是那五百个旅,打掉他五百个旅,就可能统一。现在已搞掉了他两百个旅,所以,统一全中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以前这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以“一个县五十个干部”,“十万新兵”来计划了。这个计划是有条件保证胜利的。

自然,要达到胜利,还有些任务要完成,就是这次提出的那些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中间,也有些困难,要重视这些困难,当提出解决具体任务时,是要重视困难的,但总的方面,前途是光明的。自然,要防止骄傲,但也要知道,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会比第一第二两年更困难。(毛主席插话:第一年的困难是敌人进攻,第二年的困难是到大别山。)而第一第二两年的困难我们已经克服了。(邓小平插话: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还有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没有过,大的会战,一次消灭其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带决战性的攻坚和大的会战常常是联系着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敌以大兵来援,那于我是最有利的。(朱总司令插话:将来在徐州有最大的可能。)过了这两关,那就解决了。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朱总司令插话:这就是围城打援。豫东战役,现在想来,加上许谭兵团就解决了。)

现在困难虽多,但在毛主席领导下定可克服,定可胜利。列宁说,一九〇五年革命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演习。中国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内战,就是这次的演习,没有第一次的演习,就不能教育人民,也不能教育全党,有了第一次的演习,才会有经验。有了第一次演习,这次有些地方还重复了第一次的错误:不过,领导上有经验了,所以很快就可以克服。第一次合作和内战失败了,就是由于党犯了重大错误。现在可以肯定地

说,那样重大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了,即使犯了若干原则性的错误,也能很快纠正。只要有了这一条,胜利就有保证了。至于具体困难,中国党历来是能够克服的,即使用办蛮的办法,也总算解决了。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的和平幻想、右倾错误、地主富农思想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八七会议。今年二月工委召集的会议,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十一月扩大会议。^①但二十年学会了,二月会议未如十一月扩大会议去发展“左”倾,而是极力克服和纠正“左”倾错误。土地会议确定两条:平分土地和整党,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但有重大缺点。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没有1933年文件,也就没有第一行第一条。(毛主席插话:有大法,而无详细说明、分析和具体规定,下面就没有办法。)整党问题,讨论虽然较多,但偏重于思想,也没有具体办法。土地会议,也提出防止“左”倾,也反对了一些“左”倾错误,如杀人、扫地出门,也不赞成动工商业(但不够坚定)。当时会场上的精神状态是包含许多不健全因素的,但没有注意到,没有予以严厉的批评,也批评了,但批评得不够,惩办主义也批评了,但大家听不进去;有个别人也提出些不正确的口号,如“贫雇农路线”、“干部路线”等等,做结论时也未加批评或批评得不够。这里的经验是要注意干部的精神状态,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要做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这一方面,要切实注意防止那一面,两面都要分析。譬如,这次写代表会的决定,本是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把集中写了很多。这是在以后的工作方法上要学习的。土地会议的缺点和错误,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毛

^① 指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

主席插话,这次会开得很好,把去年一年的工作也总结了。象土地会议那样的大会,会后应迅速做出决议。这形式上是个技术问题,而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在土地会议以前,也有些“左”,有些与我也有些关系。这是反右中所引起的。现在“左”已成过去,右也防止了。这一年来,既反对了右,又反对了“左”,路线已走上了健全的道路,胜利已有保证。

在新的情况下,新的问题上,是否又会发生“左”的或右的偏向呢?我看那是可能的。经济建设问题就是个新的问题,要弄清楚,这次会上已经提出来讨论了,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总方针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讲过了,具体系统地讨论是在这次会上开始的,要在这个问题上不犯重大错误,就要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这与革命胜利也密切相关。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一)国家经济。银行、铁路、大企业等等,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但是在数量上是比较很小的一部分,其工业生产是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20%。(毛主席插话: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10—20%,光是国家经济还不会有这样多。)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但是这一部分又掌握着经济命脉,数量虽小质量很高,这种国家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毛主席插话:按企业讲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按政权性质讲,按政策的性质讲,又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决定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小生产者合作的工农民主专政,陈瑾昆^①等不是决定的,是新的资

^① 陈瑾昆(1887—1959),湖南常德人,法学家,1946年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法院院长。

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成份问题,过去是有所考虑的,现在东北有八千多公里铁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手里,政权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成分问题就提出来了。二七社论中已讲了这个问题、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中也讲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点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都有社会主义成份。文化中有社会主义文化,就是马列主义,但是国民教育方针、小学课本,不是共产主义的,演剧不是演打倒资本家,而是演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国家经济就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而整个国民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机关生产有许多可以归入合作社经济的范畴,又有许多是国营企业的组成部分,基本上机关生产可以属于国营经济一类的。

(二)还有陈伯达同志讲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名词不通俗,也可以讲。

(三)合作社经济。现在要系统地建设合作社,主要是商业性质的、消费的、运销的,下层是农业变工合作,合作社还可以开办一些工厂和作坊。所以,合作社经济要分别看。象这样系统地搞起来的合作社发展起来,有很大的财产,并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领导之下,甚至于有50%以上的资金是国家投资,其方向是照顾劳动人民的,这种合作社,社会主义性质就多了。(毛主席插话:合作社既有退股自由,股票可以转让,就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它是两重性的,小生产者加入了合作社,就带有两重性了。)合作社发展起来,搞了工厂、煤矿、汽车等类的财产,那么,社员退股就不能影响到合作社了,这种合作社的财产就是社会主义的了。还有一种合作社,是在小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组织起来的,如变工互助组,它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其等价交换的原则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它已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萌

芽,集体农场的萌芽。所以,这种合作社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但已有社会主义的萌芽。

(四)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最大量的。其中有的是资本家的,有的是小生产者的。资本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小生产者在国家帮助他以机器的条件下,可以走向合作,走向集体化,走向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小生产者的发展,也可以走向资本主义,但小生产者本身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

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份,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份。(朱总司令插话:还有公私合营经济。)提倡公私合营时要慎重,不要盲目提倡,私人资本的投资光投一堆纸票子,我们不一定欢迎,可以经过国家银行吸收这些资金转入企业,付以利息即可,何必分以企业经营的利润呢?

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就已结合起来的同盟军,我们的政策也就应该从这种基本分析中订出来。自然,就全国来说,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今天还未打倒,今天主要的矛盾还是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被这第一个矛盾掩盖着。等到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取得上海和内地省份,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解决,民主革命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封建势力没有了,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官僚资本也没

有了,人民与这些东西的对立和矛盾也就没有了,这时候,主要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就解放区来说,今天对外还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但另一方面,如果把其它因素除外,在解放区内部,主要的矛盾则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列宁讲过,二月革命后的斗争性质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了。在解放区搞经济工作,除对外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外,就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政权也可能变,那就再需要一次流血革命。因此,和平转变,今天还只是极大的可能性,并未最后确定,并没有解决,如犯重大错误,还是可以失败的。所谓和平转变,是指无须经过政权的推翻而完成一个革命,并不是不要斗争,而要进行各方面的斗争竞争。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毛主席插话: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现在还要联合它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联合它发展生产,所以是又联合又斗争,斗争是限制它不利于我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毛主席插话:这就是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去年下半年有些地方是失去这种领导权的,但尚可恢

复，而且已经恢复了。如何恢复？就是向小生产者承认错误。）小生产者是动摇的，可以跟着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采取谨慎的政策，巩固地团结他们，领导他们。如何去团结他们？主要的形式就是合作社。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办得好不好，就是决定的关键。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否则，领导权仍不能巩固。

有了合作社，还有一个经营合作社和经营国营经济的路线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组织广泛的合作社网，建立合作社的系统，训练干部，搞好合作社，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去经营合作社。如果不按照新民主主义路线去经营合作社，而按照蒋、宋、孔、陈^①一样去经营，按照日本人的合作社一样去经营，按照延安妇女合作社一样去经营，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毛主席插话：这是带着共产党员番号的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党内很有一批人是这样的。南汉宸说他自己是做资本主义工作的。贸易公司总不愿起调剂市场的作用，不愿作解放区人民对内对外货物交流的桥梁，为人民服务，而是总想赚人民的钱。这就叫做带着共产党员番号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工作中，在这一点上完全清醒的干部是很少很少的，可以说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个问题搞不清，没有清醒的头脑，就是打倒蒋介石，也还是空的，也不能胜利。

（毛主席插话：单讲与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有益于国民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要发展。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条件之下，就是说，有些企业部门是国家没有经营的，或者是国家虽然也经营了，但尚

^① 蒋、宋、孔、陈，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

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者,也可以帮助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之发展,现在这里还有很大的真空。但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发生矛盾。我们共产党人要高瞻远瞩,看到前途。我们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有清醒的头脑,自暂时合作之日起,就要认清总有一天要消灭它,就应时刻注意到资产阶级之叛变,好象抗战初期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一样,我们才不会上当。(毛主席插话: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资本主义是分散的,只有国营经济,银行、铁路、矿山等等,才是集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地方性,这是很可以利用以发展生产的。)只有与资产阶级暂时合作之开始,即认清前途,才能够在各方面的实际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主席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胜利的条件是具备的,国家政权、国家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巩固的工农联盟,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但另一方面也有困难:文化落后,分散的小生产,国营经济数量很小,党员干部不善于经营经济事业,理论水平不高,有些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分子钻进党内来,还有国际资产阶级的影响。如果糊涂盲目,犯重大错误,未能成功地争取小生产者,那就要失败。

因此,和平转变有极大可能性,但也有困难条件,仍须经过艰苦的工作,才能取得胜利,如果盲目糊涂,犯重大错误,则仍有失败之可能。

今天提出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研究,找出具体办法,那是很值得的。有些并且应该广泛宣传,解释清楚,免得在这个问题上又糊涂起来。但也有些不宜过早宣传,以免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利用,而不利于打倒蒋介石。

一次重要的战略决策会议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介绍

陈 恩 惠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以下简称“中央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抗战胜利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刘少奇等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工作，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决策，并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规定了党在一个时期的各项工作任务。

中央九月会议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并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会议提出的许多思想和主张，在4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仍不失其夺目的光彩。

中央九月会议前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形势

以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当时，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还得到美国全面支持。我军则处于劣势。但是

正如毛泽东向全党指出的那样，“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有充分的信心。”^①在战争的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我军实行“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②的正确战略方针，在各个战场上沉重打击进犯之敌，取得了歼敌112万人的战绩，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到了战争的第二年（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总计歼敌264万余人，使国民党军队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央九月会议前夕，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对我更加有利的重大变化。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③，而且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寥寥无几。在国民党营垒内部，由于战争连连失利，政治腐败，互相倾轧，矛盾更加尖锐，经济危机更加严重，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更加不得人心。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1缩小到1.3:1。虽然在敌我总兵力的对比上我军仍属劣势，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大大超过敌军，全军的武器装备大为改善，战斗力大为增强。各大解放区日益

①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第1183页。

② 参见《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第1377页。

③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39、231页。

巩固、发展、壮大，面积已扩展到 235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已达 1.6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我党领导大约 1 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努力发展生产，踊跃参军支前。解放区的工业生产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我党七大路线正确，全党更加团结。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中央九月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中央九月会议的议程和议题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会前，从 8 月 28 日至 9 月 7 日，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这次会议的有关事项，草拟文件，为会议作准备。正式会议于 9 月 8 日下午三时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举行，由刘少奇主持，听取毛泽东的报告。9 月 9 日至 13 日，与会同志讨论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会议文件，最后毛泽东作会议的结论。这次会议原计划开三天，实际开了六天。出席中央九月会议共 31 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 7 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彭真；中央委员 10 人：徐向前、饶漱石、贺龙、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候补中央委员 4 人：廖承志、陈伯达、邓颖超、刘澜涛；重要工作人员 10 人：罗迈、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

毛泽东的报告，是中央九月会议的主要议题。贯穿毛泽东这篇报告的主导思想，是如何实现我党同国民党斗争的胜利，并提出胜利后我党准备实行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与会同志围绕这个主导思想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一致同意这个报告。

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和《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中央九月会议讨论决定的主要问题

中央九月会议，依据毛泽东在报告中对于关系到中国命运、前途的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作出的正确估计和提出的党在下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任务，讨论决定了下列问题：

（一）会议对于全国解放战争几年胜利和发展前途的估计问题作了商讨和部署。

我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逐步深化的。解放战争初期，我党曾估计大打、中打、小打三个前途，结果仗越打越大。战争进行了一年以后，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我军在战争第一年歼敌112万人的伟大战绩。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当战争进入第三年（1948年7月）以后，形势已经明朗，我党对国民党斗争的统盘计划已经成熟。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战略决策是稳健的、谨慎的、实际的，反映了饱受长期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国家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完全能够实现

的。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军事胜利是决定性环节，可以在党内，在人民面前宣布毛主席的估计和计划，以兴奋、鼓舞人民群众。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发言中，都分析了提前胜利的可能性问题。他们认为，我们的估计应该是稳健的，但也要估计到最好的可能性。从战争的第三年起，我军对蒋介石的打击将愈来愈严重，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我们的胜利来得快些。

会议提出，为了实现五年胜利，在党内外都要强调我们现在是为统一全中国而斗争，这个统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统一。为了实现五年胜利，要在主要将领中树立起打带决战性的攻坚战和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兵团的大会战的思想。对这个问题，朱德发言认为，将来我军同国民党军战略决战性的大会战，有最大的可能在徐州进行。为了实现五年胜利，要充分估计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会议认真讨论了克服各种困难的对策和措施，指出在大发展、打出去、打开了局面的情况下，全党全军要防止骄傲，重视困难，准备克服困难。会议认为，每年歼敌正规军 100 个旅左右，是保证五年胜利的关键。因此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东、东北作战，以歼灭国民党部署在上述地区的占其现有全部军事力量 365 万人中百分之七十的第一线部队。

（二）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会议研究决定了加强纪律性、扩大党内民主生活问题。

中央九月会议高度重视并认真讨论了党的思想建设问题，在要求全党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与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又强调扩大和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认为这是完成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两个不可缺一的相辅相成的重要环节。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严格的组织纪

律。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处于敌人分割和游击战争环境之下，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组织和军事机关保持很大的自治权，这对于发挥各地党组织和军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渡过长期严重的困难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而且这些错误倾向比抗日战争时期又有发展，损害了革命事业。会议认为，为适应目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全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错误倾向，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中，加强纪律性极端重要，是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环；而加强纪律性与发展党内民主又是相连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上级、在区党委、在党的高级干部。薄一波发言认为，加强纪律性是个战略性的问题，全党要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毛泽东指出，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全党全军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以团结全国人民，迅速驱逐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会议同时指出，在我们党内，由于战争环境或处在地下状况，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党的七大党章规定了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后，这种情形仍然没有改变。同时，为了适应过去的特殊环境和斗争的需要，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不能不有所限制。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中产生了某些严重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党内某些错误的主张和不正当的宗派主义作风和无纪律状态，得以暗中流传和滋长，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以许多损失。会议认为，革命不久将要取得全国胜利，形势需要而且也有条件改变过去时期党内

民主生活不足的状况，以提高党的政治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

会议专门讨论通过的《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和会后毛泽东在9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等历史文献，当时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队的迅速传达贯彻实行，提高了全党全军执行纪律的自觉性，有效地克服了无纪律与无政府状态，以及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了在党中央领导下的集中统一。

（三）为了迎接革命的胜利，会议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问题。

鉴于中国革命将要取得全国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将要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将要面临着新的经济建设的任务，中央九月会议对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基本经济政策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探索。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已经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来了，但我党具体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是从中央九月会议开始的，刘少奇作了系统发言。这次讨论和探索，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必要的准备。

会议经过分析讨论，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四种形态构成。

刘少奇在发言中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解决，民主革命阶段结束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把国家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斗争中，决定性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背向。毛泽东插话指出：这就是要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刘少奇还明确地指出：必须严格地说一句，在中国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紧接着，毛泽东插话提出：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革命胜利后还要 15 年。

中央九月会议认为，提出上述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研究，对于避免在新情况下、新问题上又糊涂起来，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是十分必要的和有益的。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说，少奇同志讲的这些观点，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可作宣传。至于经济性质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用。

（四）中央九月会议还讨论了军队建设问题；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支援战争问题；准备占领全国的各方面工作干部问题；准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等。

中央九月会议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 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中央九月会议规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人民解放战争在更大的规模上展开了。从 1948 年 8 月至 1949 年 1 月，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大规模的伟大战略决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 年 11 月初，继济南战役之后，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有优势。据此，毛泽东对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他在 11 月 11 日为祝贺辽沈战役胜利的电报中指出：“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 500 万，歼敌 500 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后来的时局发展和战争进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这个预见的正确性，同时也完全证明了刘少奇、周恩来关于解放战争有可能提前胜利的科学分析。

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文献选载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九五〇年一月)

编者按：这里登载一组关于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文献。围绕建国问题，我们党进行了成功的革命实践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反映这些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最重要的文献，例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著作，早已公开发表过。本刊选登的这组文献，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在建国过程中老一辈革命家所进行的部分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今天，读一读这些文献，是很有意义的。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

毛 泽 东

(甲) 目前的形势

(一) 军事方面，一年计划，半年超过。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歼敌正规军一百四十八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结束时，又将歼敌六十几个整师。上

述已歼及将歼两项共计二百一十个师以上，内有一百七十三个师以上是属于整师。一九四九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就只剩下一百六十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的，或者是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家^②。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可能动员五十万人左右，除补充已有各师外，将编成若干新师，但是毫无战斗力。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么，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二）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③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

① 这是毛泽东 1949 年 1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会议讨论后，经毛泽东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于 1 月 8 日在会上通过。1 月 10 日，毛泽东为中央下发这个文件起草了通知：“请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军分委、总前委、前委负责同志注意：此件应向地方地委以上、军队师委以上干部传达。在开高级干部会议时可交给到会干部阅读。但须注意收回，不得遗失，并不得在任何刊物上登载。”

② 马家，指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和宁夏回族军阀马鸿逵，他们的军队以封建的家族和宗教统治为特点。

③ 这里所说的自由资产阶级，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國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①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

(三) 到南方去作战的有利条件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在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以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高的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一九二七年以后数年的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到南方去作战的不利条件是:最广大区域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我党在那里的组织还不强大,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则将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这些都是不利条件。以上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我们均必须看到,并且必须明白地讲给准备到南方去的全体干部和战士们听,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能够好好地利用有利条件去克服不利条件,争取全国的胜利。

(四)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

① 指蒋介石 1949 年 1 月 1 日提出的愿意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

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五）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六）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①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为了保证胜利，一九四九年还要进行普遍的

① 毛泽东 1948 年 4 月 1 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说是“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的东西。就是“偏向已经纠正了”，并不等于说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偏向，或者将来也不会再发生偏向。现在党内还是存在着某些偏向，将来也还是会发生偏向的，我们还是必须随时地注意纠正党内的偏向。

(乙) 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 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二) 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征调和训练好。

(三) 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四) 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 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一九四八年确实地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

(六) 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

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

(七) 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八) 一九四九年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完成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在长江以南诸省,在三年至五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

(九) 一九四九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十) 一九四九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大学教育,各种专科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亦是如此。文学和艺术工作亦是如此。

(十一) 一九四九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

均应比一九四八年有更好的成绩。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 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十三) 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十四) 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四月份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亦须于四月办理完毕,五月交来中央。

(十五) 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

(十六) 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十七) 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

天津市委并告北平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一、天津解放后，你们派人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对于接收来的工厂、矿山、铁路、邮政、电报及银行等，如果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其他职员中没有逃跑并愿意继续服务者，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应令其担负原来职务，继续工作，军管会只派军事代表去监督其工作，而不应派人去代替他们当厂长、局长、监工等。如果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即从本企业职工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除非是无法提拔或我们派去的人完全是该企业的内行，能够无困难地管理该企业，才任命他们直接负责该企业的管理。对于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须要加以改良者，亦须等到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订办法，绝不是草率拟定办法或用老解放区企业中的制度去硬套所能改善的。只有如此，我们的接收人员才能保持主动，否则，他们将立即陷于被动。

二、我们派到各企业中的军事代表(即接收人员)，对于大企业除派一个负责的总代表外，并可在各工作部门(十分必要时可在各车间)、各站、各段派遣代表，受总代表之指挥，并可设立监督部或政治部。这种军事代表的任务应是：

甲、保障上级命令的实行；

- 乙、保障生产的进行或恢复；
- 丙、防止破坏或怠工，清查反动分子；
- 丁、防止偷盗、贪污及浪费；
- 戊、对职工进行政治教育与宣传，从职工中挑选干部；
- 己、协助职工组织工会及消费合作社等；
- 庚、了解企业中的情况，学习管理生产。

军事代表为了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应有权力监督企业中的一切活动，了解企业中的一切情形，要适当的人员向自己作报告，并在一切命令及指示上签字。生产的进行如有不好或发生破坏怠工等事，即应查明实情，追究责任，将进行破坏或怠工有据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企业中共共产党的支部及党员，应受军事代表领导，协助军事代表完善地完成上述各项任务。这就是说，军事代表不直接去管理生产，只监督原来的人员去管理生产，保障生产能照旧进行。这是比较轻而易举的。

三、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亦只能在经过改造后分别地加以任用，而不能不经改造地全套地加以任用。否则，就要犯原则的错误。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这是马克思列宁多次说过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照这样来做。有些地方的接收人员彻底打乱了原来的企业机构，是错误的，妨害了生产的，不应再犯这种错误。

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① 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认识，在我们好些司法干部中是错误的，或是模糊的。不仅有些学过旧法律的人，把它奉为神圣，强调它在解放区也能适用，甚至在较负责的政权干部中，也有人认为《六法全书》有些是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只有一部分而不是基本上是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东北印行的《怎样建设司法工作》中所提到的对《六法全书》的各种观点，不过是一部分明显的例证。

二、法律是统治阶级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法律和国家一样，只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掩盖阶级本质的形式出现，但是在实际上既然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当然也不能有超阶级的法律。《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所谓“人人在法律方面一律平等”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没有真正共同的利害，因而也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法权。因此，国民党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是镇压和束缚广大人民

① 即国民党政权的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六种法规的汇编，也是国民党政权反动法律的总称。国民党政权迁移到台湾后，该书进行过修订。

群众的武器。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元旦救死求和的哀鸣中,还要求保留伪宪法、伪法统,也就是要求保留国民党《六法全书》依然继续有效。因此,《六法全书》绝不能是蒋管区和解放区均能适用的法律。

三、任何反动法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是一样——不能不多少包括某些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这正和国家本身一样,恰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即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保障其基本的阶级利益(财产与政权)的安全起见,不能不在其法律的某些条文中,一方面照顾一下它的同盟者或它的试图争取的同盟者的部分利益,企图以此来巩固其阶级统治;另一方面,不能不敷衍一下它的根本敌人——劳动人民,企图以此来缓和反对它的阶级斗争。因此,不能因国民党《六法全书》有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便把它看作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在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在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

四、我们在抗日时期,在各根据地曾经个别地利用过国民党法律中有利于人民的条款来保护或实现人民的利益,在反动统治下我们也常常利用反动法律中个别有利于群众的条款来保护和争取群众的利益,并向群众揭露反动法律的本质上的反动性,无疑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不能把我们这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解释为我们在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或者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能够在基本上采用国民党的反动的旧法律。

五、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作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则应该以共

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作依据。在目前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政策。同时,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司法工作真正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司法干部的理论知识、政策知识与法律知识的水平和工作能力。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使他们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重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为人民服务,才能够和我们的新的革命司法干部和衷共济,消除所谓新旧司法干部不团结或旧司法人员炫耀《六法全书》、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

六、请你们和司法干部及政府干部讨论我们这些意见,并将讨论结果电告。

关于组织劳资发展生产问题复邓子恢电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

朱 德

子恢同志：

卯俭^①致中央电悉。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到城市，但各地在执行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上，曾经发生过并继续存在着若干偏向。偏向的表现有“左”的，也有右的，有的地方甚至“左”右两种偏向同时存在。“左”的表现，如分房屋，分店铺，过分提高工资和工资问题上的平均主义及农业社会主义倾向等，自去春以来经中央多次批评纠正，现已大体解决了，但并未完全根绝。平津解放后，党政负责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对私人工商业资本家冷淡不理，不向他们正面宣传解释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他们就惴惴不安，多所顾虑，对复工复业抱敷衍态度，对发展生产不积极，对职工的过分要求不敢据实解释，因而发生了部分私营小工业和手工业工人的工资超过了国营的大规模的现代工业工人的工资及东伙私自妥协把铺子分了的现像(天津分了几十家，北平也有)。又如，在公营企业中，工人与企业管理干部的对立以及一般地反对旧职员等等。右的表现，如站在资本家方面，禁止工人罢工。淮南煤矿接管后，三个月来对职员是实行原职原薪，对工人则每月仅发几十斤粮食的维持费，致引起工人怠工请愿；还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的经理(我们派去的干部)徇私人股东之情，开除党员工人，原因是该工人同志曾揭发私人股东

^① 指4月28日。

贪污舞弊；洛阳市的工作方针曾提出以资本家是否发财为检查洛阳市工作的标准，《洛阳日报》不敢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的声明^①登在第一版。又如，在发展生产上公私不分，工商不分，在宣传上重视资本家而忽视工人以及宣传工人感激资本家等等。

我在铁道部运输会议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两方面都要顾到，既不要“左”，也不要右。既要照顾到工人生活，也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既要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群众，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也要利用原有的资本家的组织（如同业公会、商会等）向资本家进行宣传，解释我们党的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消除资本家的顾虑，提高其复工复业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只有广大工人群众与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资本家都动员起来了，才能实现恢复与发展生产。单动员一方面是不行的，光资本家积极复工复业不行，光工人积极劳动生产也不行。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条件所需要的，这与二中全会所指出的依靠工人阶级还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与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路线是一致的。自然，我们所说的双方照顾是有重点有立场的，是依靠工人阶级，是从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争取团结工商资本家。至于说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与动员资本家积极复工复业发展生产的工作之先后次序，那是步骤问题，不是原则问题，可依当地具体情况分别进行。

朱 德
辰哥

① 指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2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 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①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刘 少 奇

(一) 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

(二)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三)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人数,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定之,其决议,由过半数到会委员之多数通过成立之,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停止或修改或废除其决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

① 这是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这份手稿上作过修改,毛泽东并写了批语:“此件很好。”此件印发内部讨论后,又作了若干次修改,最后是否形成了正式文件,目前尚未查清。

数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四)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下列各工作机关,在委员会及主任与副主任领导之下,分别地进行工作:

(1) 中央计划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审查与拟定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计划。局内设统计处、供应处、国家资源调查登记处、地质勘察处等,并得按各财政经济部门逐步设立若干计划组。

(2) 中央财经人事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财经领导干部、技术专家及一般职员和工人的训练、登记与调动等事务。

(3) 中央技术管理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有关新的技术之发明、采用与推广等事务,并得按各项技术性质逐步建立若干技术组。

(4) 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对于私营企业之指导事务,并得按各项私营企业部门逐步设立若干事务处和设立华侨经济事务处。

(5) 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对于合作社之指导与协助事务,并得设立消费合作事务处、农业合作事务处、手工业合作事务处、水利合作事务处等。

(6) 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负责管理关于外资企业的事务。

(7) 秘书处,负责管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内部的事务。

(五) 除开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机关而外,应即陆续建立下列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即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

(1) 中央财政处,负责管理有关税收、粮食、盐务、烟业、酒业、渔业及其他财政事务。

(2)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发行货币、代理国库、管理金融并进行其他银行业务。

(3) 海关总署,负责管理全国海关并管理港口、码头及边境

检查等事务。

(4) 中央商业处,负责管理有关对内与对外贸易及实物配售等事务。

(5) 中央铁道部,负责管理全国铁道之运输及铁道之修建事务。

(6) 中央交通处,负责管理邮政、电讯、船运、航空、公路等事务。

(7) 中央燃料处,负责管理有关煤炭、石油及电力等事务。

(8) 中央金属处,负责管理有关钢铁及有色金属与机械制造等事务,并管理军事工业与造船工业。有关基本化学工业及建筑材料工业之事务,亦归金属处管理之。

(9) 中央纺织处,负责管理有关棉、麻、毛、丝的纺织等事务。

(10) 中央工业处,负责管理除纺织工业以外的有关其他各种轻工业之事务。

(11) 中央农业处,负责管理有关农业、畜牧、垦务及农业试验场、国家农场等事务。

(12) 中央林业处,负责管理有关森林之采伐与培植并管理有关造纸工业的事务。

(13) 中央水利处,负责管理有关巨大水利工程的事务。

(六) 前条各处之组织条例,另行拟定。

(七) 除建立上述各中央财经机构外,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在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在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设立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其组织条例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拟定。

(八) 关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划分,国家企业之由中央直接经营或划归地方经营或委托地方经营等事,均由中央财政

经济委员会决定之。

(九) 重要国家企业或国家资源之出租给私人经营或开发，其年限相当长久者，其合同须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后，方为有效。

(十) 地方财政经济机关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执行以下各项任务：

- (1) 执行中央与上级机关指定之任务；
- (2) 管理当地财政工作和金融工作；
- (3) 恢复与发展当地人民经济；
- (4) 经营中央与上级机关划归地方或委托地方管理之国家企业；
- (5) 监督与协助由中央直接经营之当地国家企业。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①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陈 云

我才从东北来不久，军委会^②指定我参加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大纲草案^③已经发出去，但这是一个草案，是一种意见，让大家看一看，还要请大家讨论。

①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中央财经工作的统帅部，其紧急性不亚于军事问题。这是陈云在周恩来召集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及在北平的党政机关负责同志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当时陈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② 军委会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

③ 指1949年5月31日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

以往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为什么呢？解放军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也需要研究。例如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又如天津解放后，就有了西北地区通过天津进出口物资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的财经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初成立是带有临时性的，暂时属军委会管，时间也只是几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交给政府。这件事很大，需要党内外同志共同合作。财经委员会本身要合作。各部门之间，如工业、农业、交通等部门之间也要合作。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最早红军时代谈不上什么经济工作，就是有个把事务长，以后有了根据地，再后有了边区政府、人民政府，也有了供给机关、贸易公司等等，一步步地扩大。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①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整个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大纲草案，我不一一介绍了，这里只说明两个问题。

①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新中国成立前，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等职。30年代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

首先是组织机构问题。财经委员会本身有六局一处，下属十三个处、行、署、会^①。

有些事情还没有定。如盐务暂属财政，还有渔业、烟酒需要进一步考虑。这是一个草案，请大家讨论。

工业部门分得很多。在中国，过去曾经笼统叫过农工商部，然后分成交通部、实业部或工商部。现在除了铁道、交通之外，又分了燃料、金属、纺织及其他工业四个处。分得细的原因是在各有专职，因为工业重要。

这六局、十三处是否一天就建立起来？全国性计划是不是可以一天弄成？不成，这要逐步地来。我们的目的是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工作则是要一步一步地来。

其次，现在我们正在强调集中统一，而大纲的最后面，仍把地方经济放在必要的地位，各大区、各省及各大城市都有财经委员会，这岂非矛盾？我们的回答是，有矛盾。但是，因为现在是军事时期，同时中国地方太大，交通不便，需要地方机构与中央配合。统一集中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需要；二是有可能。两者缺一不可。比如火车现在已经统一管理。又如对外贸易，假若天津是一种规定，上海又是另一种规定，这就不行，必须统一。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事业不能集中或不能过分集中。最大的是三百多万军队，有两百多万在前方，给养能不能由后方统一供给？不行。这需要在各地买、借、征，就地解决。部队决不能饿饭，但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反了。比如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匹布做衣服，三百万人就要三百万匹布，只能由前方解决。这些事带有很大的地方性。野战军吃、穿、工作、打仗一起搞，这需要统一，但不能过分集中。这一段时间还不会短。要等打完仗，交通

^① 见刘少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铁道部沿用军委会铁道部名称，称部而不称处。

恢复以后，这些问题才能慢慢解决。有些事，中央现在管不了，只得让地方上先管着。如招商局^①现在由陈毅^②他们管着，中央一时管不到，先托他们管，所有权属中央，将来需要时，一个命令，全部由中央接过来就是了。

总之，这个财经机构是临时的，是党内外合作的。工作要慢慢地来，地方机构还保留相当的地位。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 与政权性质^③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刘 少 奇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二十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

① 招商局是1872年成立的中国轮船航运企业。1948年时共有船舶460余艘，约33万吨。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即招商局香港分公司）光荣起义，回归祖国怀抱。

②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③ 这是一份党内报告的节录。其中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些具体设想，后来又有一些变动。

士非常满意。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共产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在筹备委员会中另组织常务委员会,委员二十一人,同样可保障我党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十四个,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区代表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及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代表二百零六人,总共四十五个单位,五百一十个代表。代表中共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份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刘少奇与任弼时则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我们的了解如下: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它是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势力专政的。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

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份。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需要解释的。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这是由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及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产生的。正如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种伟大的进步，这是在不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在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①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邓 小 平

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

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的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四十五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七十万人）。四十五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大体上三十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

^① 这是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所作的报告的前一部分。渡江战役时，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

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到五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五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二十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五月二十七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

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一万只左右，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集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作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

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的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三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一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第二，各界人民支持。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

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二万万人口，但国民党四十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这是大势所趋，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司徒雷登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的凶焰收起来了。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我们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象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周 恩 来

这个组织法草案首先表明国家的制度是新民主主义,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大家所同意的。现在只须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国名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

①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的报告《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第三个问题。

既然国名重新定了,是重新纪元呢,还是采用公元纪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上没有讲到,这将在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决定。

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有四亿人以上;少数民族有蒙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夷族^①、高山族等,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当然,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首先是汉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如英帝国主义对西藏及新疆南部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及海南岛的阴谋。不错,这些地方是有少数民族的,但是他们一向是在中国领土之内。清朝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对满族以外的民族进行欺骗和屠杀。北洋军阀政府继续了这样的政策,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加深了这样的政策。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政策,把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分化。陈嘉庚^②先生这次到东北参观,同时也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回来后说现在内蒙的汉、蒙二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政策的成功。

① 夷通彝,即彝族。

② 陈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人。爱国华侨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积极支持国内的抗战事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曾到延安慰劳边区抗战军民。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今天到会的许多人是民族代表，我们特地向大家解释，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一次民族方面的代表的确是比较少，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原因是有好些少数民族的地方还没有得到解放，不容易找到代表来。内蒙古是解放了的，它便有了双重的代表，少数民族方面的代表和区域代表。

关于政权制度方面，大家已经同意采用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现在凡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出来的会，我们叫做大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通过协商方式产生的会，我们就叫做会议，例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和会议名称的区别就在这里。将来人民代表大会，是要经过普选方式来产生的。关于普选，本来应该做到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投票，但这对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许多不是普遍选举的现象，例如根据阶级、民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等给普选加以种种限制。这种选举我们不要，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普选，不分性别，不搞种族歧视，不分宗教信仰，不论财产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达到适当年龄，没有其他特别原因，便可参加普遍的选举。关于直接选举的问题，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直接选举目前实在不容易办到。至于平等这一项，假如按人口做比例也不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那么选出来的代表就会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情形还不能够适应于今天革命的形势和

要求。不记名的秘密投票方式,依照目前人民的文化程度来说,也是做不到的,许多地方只能用举手或投豆的方式。由于有上述种种的情况,我们只能强调提出普选一点,其他各项有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实现。单就普选一点,三年后能不能真正做到,还是一个难题。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只能逐步由客观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普选。

关于政府组织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①下面分设许多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分工的。这一点相信大家不会反对,而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只是便于剥削阶级政党间互相争夺、互相妥协、共同分赃的制度。他们幕后分侵略殖民地的赃,分剥削本国劳动人民所得的赃,争夺不休。而我们却是长期合作,不是彼此互相交替。辛亥革命后,袁世凯^②、曹锟^③、段祺瑞^④等都搞过议会制、总统制等方式,结果换来了封建买办

①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年10月1日成立。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选出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委员五十六人,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一人组成。至1954年9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是我国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②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成为北洋军阀首领。1911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投降卖国。1915年5月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12月称帝。1916年3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

③ 曹锟(1862—1938),天津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1912年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巡阅使等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控制了北京政府。次年10月,他以五千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被选为总统。

④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自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1926年,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等职,几度把持北京政府的实权。他对内镇压人民,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外出卖主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参加欧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借款,金额就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

的专政。这种痛苦的经验教训,在座的陈叔通^①老先生、沈钧儒^②老先生,都曾亲自体验过。到了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中国才找到一条好路,于是便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又不同了,那时,大家为民主拼命奔走,也仅仅得出了一个伪宪法^③,真正的民主是没有的。这是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经验教训。

现在,根据我们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系统,在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是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而对工作的经常指导,又是集中在由民主方式产生出来的主席身上。主席下面的组织,首先是政务院,其他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

政务院底下,设有三十个单位,这个数目看起来很不少。清朝只有六个部,后来又分为八九个部,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院,也只有八九个部,但每个部下面却设有许多机关,有些机关连部长也管不了,直接由最高当局来指挥,造成官场上互相冲突、互相牵制的现象。这种情形,我们新中国是不允许的,所以政

① 陈叔通(1876—1956),浙江杭州人。早年曾考中进士,为清末翰林。参加过反袁世凯的斗争。1927年后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抗日战争时期,支持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筹组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反蒋民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

② 沈钧儒(1875—1963),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曾考中清末进士。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后在上海任律师。抗战前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战期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③ 指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在1946年11月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反共反人民的《中华民国宪法》。

务院下设三十个单位。事实上苏联今天有六十个部，比我们更多，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模仿苏联，一切还是由本身的需要出发。

政务院不可能经常领导这三十个单位，所以下面设四个委员会协助办理。这四个委员会是：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其次是文化教育。这样做法会不会降低工作效率呢？根据过去解放区政权建设的经验来说，是不会的，而且还可以把工作推行得既快又好。政务院下面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监察制度，监察行政部门，如公务人员是否执行了政府的决议和政策，是否有贪污腐化等情形。

军事方面，我们估计国内解放战争还要打一年左右，才能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反动派。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要继续存在，同时将来也要领导巩固国防的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这不用多做解释。

至于地方的统一制度，目前因为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它的组织如何，只好留给将来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

新 中 国 的 外 交^①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

周 恩 来

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则还没有开始。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做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惟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整理，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今天整个世界还有阶级存在，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国家机器在今天还必须重用，这就是阶级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国家机器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一个民族或是多民族的国家里，总有一个阶级掌握领导权。我们是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现在联合其他阶级来掌握国家这个机器，对内统治反动派，统

① 这是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治过去压迫和剥削我们的阶级，反对地主压迫农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工人；对外联合各兄弟国家，联合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反对敌视我们的国家。所以国家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武器。

国家这个统治武器，最主要的是军队和监狱。这些东西表面上看来同外交并无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外交的后盾。军队是保卫我们的，要有备，才能无患。今天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还需要军队，全国解放了，军队经过整编，还得作为捍卫国家的力量。在没有发生战争和破坏之前，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内就不说了，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

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就联合这方面说，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对立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

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先说对帝国主义，刘少奇同志在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引用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在黄河以西打游击时说过的话：我们对帝国主义在全盘战略上应该藐视它，但在具体战斗的战术上应该重视它。这两句话是非常合乎科学的。我们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应当藐视。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打倒了三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被打倒了三个，削弱了两个，使美帝国主义陷于孤立，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壮大起来，在东欧也产生了各人民民主国家。事实说明了真理，从两个世界对照来看，难道我们还不能肯定说帝国主义终将死亡吗？读一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在三十多年前已

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三四十年来，就看到了这种情势，帝国主义正在走向死亡。美国表面上强大，实际上是纸老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物质上的损失是不大的，但战后在政治上的损失非常之大。一九四六年起，美国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很快地衰落下去了。美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战后不到四五年，在国内外的威信就很快地降低了，所以我们说它是纸老虎，我们有理由藐视它。

拿五四运动到现在的三十年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七十九年相比是短的。再拿日本投降以后的四年同前两段时间来比更是短的。这说明我们的革命愈接近胜利，就发展得愈快。从一八四三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到一九〇三年，经过六十年产生了列宁主义。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仅十四年的功夫，列宁主义在苏联就胜利了。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三十二年，中国革命就胜利了。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从“五四”到现在三十年来，我们的星星之火已经成了燎原之势，烧遍了全中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看到全世界帝国主义正在走向死亡，这是战略的一方面。

不过从战术上来讲，我们要促使帝国主义死亡，就不能轻视它。我们在外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仗。二十二年前，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井冈山建军的时候，就有胜利的信心，但是要达到使敌人死亡的目的，是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的。这条路并不简单，外交斗争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有病，它是想尽方法要活的，因为身体内尚有未衰的因素，有新生的血球存在，它必定要挣扎，所以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时，必须要留意，要仔细，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

劲,它就处处威胁你。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他们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他们对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对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义和团的民族热情是可贵的,然而它的领导者造成了盲目排外情绪则是错误的。我们要善于掌握这种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尤其是我们的年轻同志,往往最容易轻视敌人。我们打硬仗,必须要仔细,不要害怕。工作是做出来的,经验是积累而成的,必须磨练自己。对外必须要一致,一切事情在一定组织范围内都可提出来讨论,想问题,提意见,纠正工作上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不断进步,才能打胜仗。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

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更应该加倍谨慎。

另外，联合一方面，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国家承认我们，加上阿尔巴尼亚，共有十个国家。除此而外，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要来承认我们。加上印尼、越南等，便要有十几个国家了。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乐观是应当的，但对这些国家也要注意联合中的某些技术问题。“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与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这个联合工作是不容易的，做得不好，就会引起误会。误会是思想上没有沟通的结果。我们应当研究如何改善关系，不要因为是兄弟国家，就随随便便。

我们要轻视帝国主义，但不轻视具体斗争；要联合兄弟朋友，但不要马虎。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交形式出现。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大家要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团结，才能把外交工作搞好。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一再告诉我们，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不光用军队把敌人打败 还要用军队把中国建设起来^①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朱 德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胜利年，全国只剩下了西藏、台湾、海南岛没有解放。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统一。今年我们要向西藏进军。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道路远，地面大，少数民族多，需要很好地努力。西藏虽然生产不发达，但物产丰富，所以久为帝国主义所垂涎，我们必须解放它。我们还要解放台湾、海南岛。

除此之外，在全国范围，其他各地都已平静，将要开展大生产，特别是铁道的建设。农业、工业生产也都要恢复。我们有很大的军队，除一部分部队担负战斗任务外，要用一部分力量参加生产，最好是用在修铁道上。这样，铁道部的任务不仅可以完成，并且可以超额完成。

一九四九年我们抢修铁路的成绩很大，把津浦、陇海、粤汉、平汉等路修通了。敌人估计我们非十年八年不能修通，我们一年就把它修起来了，总计修了八千二百七十八公里铁路。军队和人民很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出的“打到哪里，修到哪里”的口号兑现了，保证了军事运输，又完成了货运、客运任务。这是铁路

^① 这是朱德在全国铁路工程计划联席会议、全国铁路政工会议、全国铁路青年团分团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

职工、铁道兵团的成绩。

各级党组织、地方政府也出了很大的力,他们送物资、运材料,把道木、铁轨送到路上。铁路职工包括工程师都出了很大的力,又很好地团结起来了。过去各路都有派别,互不通气,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家共同努力做事。特别是我们组织了铁道兵团,几个月以后,解放军战士就成了熟练的工人,不但战时能用,平时也能用。将来要扩大这个组织。铁道兵团的指战员和作战一样,积极、勇敢、拼命地干,以顽强战斗的精神完成抢修任务。所以铁道兵团对解放战争与经济建设事业的贡献很大。我们不光用军队把敌人打败,还要用军队把中国建设起来。我们的军队是一支强有力的人民军队,与旧军队大大不同,他们把自己的一切无代价地贡献给国家和人民。

去年,因遭到战争的破坏,又因中国铁路过去多是帝国主义修的,规格不统一,行车也不快。经过去年的修补,把铁路正规化了。今年要做得更好,要求提高行车速度和密度,至少要赶上敌伪时代,并且应超过它。工厂要多修制车皮。

我曾参观了好几个修车厂,规模都很大,他们开工不足,这是很可惜的。今年我们要有计划地买点马口铁,帮助他们开工。目前中国的家务中铁路是很大的,要很好发展这个家务,去帮助建设别的家务。

为了完成今后铁道建设任务,我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要学会经济核算。过去我们是只求完成任务,不计工也不算帐,今后不成了。施工中要做到节省工料,降低成本。这一项去年我们已初步做到了,今年应该继续努力,想各种办法降低成本,把铁道建设起来,给国家建立家务,为国家打算,不浪费一点人力物力。

第二,依靠工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团结其他阶级,

虚心学习技术。工人、铁道兵团的士兵们,要很好地去团结技术人员,要向工程师、专家们学习技术,掌握技术,提高自己。因为在新的时代里,技术将决定一切,技术高就做得快,差一点就不能解决问题。

第三,工程师、专家到现场去指导工作,并向群众学习。资本主义时代,工程师不能和工人搞在一起,而今天我们把它打破了。工程师、专家亲自到现场去领着工人干,效率就高,不合规格的马上改正,避免发生错误。同时,也可在工人群众中学到新的东西,使自己学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就提高了理论,充实了自己。

第四,向苏联学习。苏联的工程师、专家有很多是工人出身,他们不仅有三十多年的实际技术经验,而且有丰富的专门知识,我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

如果把这四件事情做好,今年的任务就能顺利完成。大家要很好地团结起来,把全国的铁路建设好。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建立

乔 东 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为创建新中国所作出的贡献，是举世瞩目和令人缅怀的。

—

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就摆在全国人民和革命者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历史告诉人们，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都挽救不了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才有了正确航向。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所指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只能是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第一步，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发展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候，共商建国大计，制定建国方略，建立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又一个严峻课题。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在组织人民解放军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同时，积

极研究制定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筹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下面仅就毛泽东关于建国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的制定和实施，作一番回顾。

二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10月，毛泽东代表中央发表宣言，简明地提出我党基本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133页）这个纲领被同年的中央12月会议审议通过。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创建新型国家政权的时机逐渐成熟。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向全国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月1日，毛泽东致电李济深、沈钧儒，提出一切反对美帝、反对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其他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这一号召迅速地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8月1日，毛泽东电复响应号召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郭沫若等，征求他们对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的意见。在他们同意后，中央邀请并迎接他们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地进入解放区，与共产党一起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0月8日，中央向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发出了《关于召开新

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电报,请他们就草案中的各项问题正式征求沈钧儒、谭平山等七人的意见。在高岗、李富春与爱国民主人士商讨取得意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11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复电,进一步要求高岗、李富春同他们恳谈,征得他们对新政协各项问题的同意,并由他们提出参加会议的名单。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中央经过研究后均一一给予了答复。

由于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原先决定在哈尔滨召开的会议,这时经过大家商量,决定改在北平召开。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信宋庆龄,祈望她命驾北来,参加将在华北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请她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因当时有病,暂时不能动身。次日,中央还致电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等人,请他们立即邀请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途经香港北上。毛泽东另致电侨居海外的司徒美堂、陈嘉庚,请他们早日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由于环境的原因,他们一时都未能成行北上。随后,先期到达东北等地的许多爱国民主人士陆续抵达北平。

3月25日,党中央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认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准备在解放军攻占南京后开会,并定都北平。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并在全会总结中就将要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选发表了意见,指出这些人选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须同各界民主人士商量。此时,中央已经准备好新政协会议的有关文件,包括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在周恩来的组织安排下,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会晤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无党派的知名人士,有的同志还同他们一起座谈。

毛泽东在会见爱国民主人士时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就要垮台了。这个时候假如我们还不建立新政府，在中国就会出现无政府的状态。因此，抓紧建立人民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会见时，紧紧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认识终于实现了。现在全国即将解放，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他说，你不要对我们说夸奖的话，应该给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在会见年过七旬的沈钧儒时，毛泽东谦逊地说，沈老先生，我们要向你请教。现在打败了蒋介石，要建立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人民的法律，还要请你多出力呀。沈钧儒感慨地回答，蒋介石政府践踏法律，草菅人命，实行独裁的反动统治，人民活不下去了，必然会起来反对他。这是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您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我很高兴，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6月15日，在全国胜利在望的形势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先后发表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这次筹备会的任务。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历时5天，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并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常务委员会。

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姐妹篇，它们总结了我国进行民主革命的经验，分析批评了在建立人民政权问题上的各种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

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可能出现各种问题，阐明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性质及对内对外方针政策。这两篇文章为即将举行的新政协会议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奠定了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9月17日，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文件，正式决定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对共同纲领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等89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并担任主席团常务委员。在大会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议案和《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会上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全体委员，毛泽东任主席。其后，毛泽东当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开国大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从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国家政权，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三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和毛泽东就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工作，探讨新民主主义时期指导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1940年1月，毛

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内部经济关系作了原则的概述。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在阐述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时，重申了我党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将由国家经济、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三部分组成。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明确地概括为三条，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在这个基础上构成的新中国的经济成分则为：(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

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农村个体经济、城市私人经济三部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尽管它量小，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后面两种经济虽然量大，但不起决定作用。毛泽东还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我们要利用它来发展生产。我们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性质的分析，毛泽东请刘少奇继续考虑，并草拟文件，以待七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讨论用。

9月政治局会议前不久，中央东北局在8月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张闻天在总结发言的第三部分，即《我们在城市中的阶级路线》中指出，东北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之后，存在着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经济等六种经济成分。会后，他根据大家的意见，将这部分发言加以充实，

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把经济成分中的“公营经济”改为“国营经济”，“秋林经济”改为“秋林式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提纲经东北局通过，于9月15日报中央。毛泽东阅后作了多处修改，其中有：（1）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私人商业资本主义经济，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2）不能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不能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3）使合作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时期艰苦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之后，刘少奇也作了详细修改。毛泽东10月26日看后，称赞刘少奇修改得很好，并提议由中央批准这个提纲，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毛泽东提出，将提纲内的“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话，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原因是，“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6页）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建国后应采取的经济政策：

（1）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一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

的领导成分。对这一点不能忽视，忽视了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2) 对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够改变它分散的和个体的性质,但是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其办法是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3)对占现代工业经济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和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所决定的。我们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又绝不是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它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诸方面受到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

9月,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将创造各种条件,采取多种办法,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五种经济成分,使它们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国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所构想的建国经济纲领。这个经济纲领不仅在当时对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而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着深远的历

史意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的文献选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编者按：这里发表毛泽东、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文电 14 件。建国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曾是人民政府密切联系各界人民的纽带，成为党和政府团结各界人民的极重要的组织形式，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在着手人民政权建设时，就要求全党把组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作一件大事去办”。这组文电对于我们研究在人民政权建设初期就十分重视发扬人民民主的历史经验，是有价值的。

应读者要求，我们准备围绕某些专题，比较系统地刊发社会主义时期的党的历史文献。这是其中的一组。读者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文献选载”这个栏目有何意见和要求，请告诉我们。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 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据石家庄、洛阳、济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经验，我在这些城市的工作中的中心弱点，是与广大群众联系不够。虽然我已掌握

了政权，但还没找到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我派往这些城市的工作干部愈多，就使城市工作机关堆积的干部愈多，也就愈加阻塞我在城市的领导机关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和接触，各领导机关每日所接触的所传达的都是在外面派来的这些干部中打圈子，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又常常主观得很，与人民生活中的实际和群众中的真正舆论相距甚远。有些城市，如石家庄，领导机关一去，也想先将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人民政权的支柱和党的耳目，但执行的时候，却毫无准备而冒失地召开工厂的职工大会，城市贫民大会，马上成立各厂工会和街道的贫民组织。结果被国民党特务钻进来。另一种组织形式，就是在城市刚解放后，我们为建立革命秩序，维持人民治安，需要召开各界或各业座谈会，报告我们的政策并征询大家的意见，但这是临时性质，不能解决经常与群众联系的问题。有的城市，已成立临时参议会。但这一组织形式，容易给人以国民党统治时代召开过的参议会的不良印象，而在成分上，因是聘请作参议，很容易偏重旧社会的上层分子，在职权上，因为是咨议机关，对群众的联系也就不会密切。因此，为纠正上述这些缺点，便于联系群众，特规定成立各界代表会的办法如下：

一、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的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当城市初解放后，即使党在该城市原来有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但究因是地下党的关系，不可能有广大群众的联系，故不仅正式的人民代表会议一时不易召开，即成立人民团体，例如工会、学生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也须根据我们原来工作的有无好坏，分别先后进行，不能一下组织好。而各界代表会，则可根据我们在该城市原有的或可能动员的力量，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临时市政府出面首先邀请若干人为各界代表，组成各界代表会，成为军管会和临

临时市人民政府在军管初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

二、各界代表会的人数不拘，但每个代表应具有团体的代表性，如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卫戍部队，大者各出一、二人，小者共出一、二人，各革命团体如秘密的工会、学生会和妇女、青年组织，各民主党派（如在未解放前受反动压迫的各党派），均可出代表一、二人；旧有的商会或其他有代表性的团体如非反动者，亦可容许其出一、二人。这些代表，均为聘请，并须在我军入城前后，经过调查研究，方能确定人选，其中应以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占多数，但必须尽可能的多请原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代表，切忌尽请一些从外边派去工作的干部。如查明某人系属反动分子，即使有某一为我承认之合法团体推荐，亦可拒绝，如已聘请，亦得撤销。在某些团体或商店、作坊和贫民的街道组织尚未组成或尚未健全的时候，可以暂缓聘请其中的人为代表。在各人民团体，首先是工会、学生会的组织，已经健全起来的时候，他们的代表可以经过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的群众大会推选，然后加以聘请，以增强其代表性。

三、各界代表会的职权，是由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赋予的。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及一切市政设施，均可向各界代表会征询意见，并经过其讨论和建议，再由军管会和市政府作出最后决定，付诸实施。各界代表会并可向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提出各项市政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各界代表须负责向其所代表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街道组织的群众报告和解释这些政策和实施的内容，并向各界代表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在必要时，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亦得派代表直接向上述各单位的群众大会做报告。在各界代表会开始时，得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允许，可邀请有代表出席的团体单位派人旁听，以观察其代表是否尽职。

四、各界代表会的开会日期,在城市初解放时,应根据需要酌量多开,在开会时,军管会和市政府须有负责人出席参加领导。

五、各界代表会可选出主席、副主席,并组织秘书处以执行日常事务。各界代表会为市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的临时政府的协议机关,故无对政府约束之权。但我们如能运用得好,则我党的一切决议和主张,均可经过他们的协助,吸收广大人民的意见,取得广大人民拥护,并保持军管会和市临时人民政府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使我们能够听到群众的呼声,探知群众的要求,并取得群众的协助来解决各项困难问题,例如解决煤粮缺乏问题及煤粮配给办法等,均可经各界代表会讨论来获得解决。因此,我在各单位的党的组织和工作人员应力争取得群众信用,使党能经过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聘请我们同志为代表,并从而培养将来当选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条件,使党在群众中能树立起坚强的领导作用。

六、各城市解放后,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开,须视军管期间、我党各项政策实施效果及人民群众组织情况而定,但最主要地还要看我们运用各界代表会这一组织形式的成效如何。考验我们能否管理好城市的决定力量是党的政策掌握了群众,也就是说群众拥护了党的政策。要使这一决定力量形成,党所领导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的组织武器,而各界代表会则可看做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自然配合这一组织形式联系群众、传达党的政策、反映群众意见的,尚有党所领导的工会、青年团、学生会等人民团体与党的报纸和广播及其在群众中的通讯员等等,但最直接而又最广泛的,还是这一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前身——各界代表会的政权和半政权的组织形式,望各地根据这一规定善为运用,并创造出新的经验,随时电告中央。

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各中央局、分局：

(一) 凡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两个月至迟三个月后，即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党与政府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 自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以后，为时已久，除太原、石家庄、西安等少数城市以外，各地均尚未召集此项会议，这是不好的。各中央局、分局必须指示所属各城市党的组织，经过市政府，迅速召集此项会议，并以开会情形报告我们。

(三) 关于各老解放区，应当召开乡的、县的、省的及全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亦望遵照中央早已发出的决议从速办理，不要推延。党内干部中有一种不愿召开此类会议听受批评及建议的倾向，必须克服。

(四) 关于各解放区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一事，必须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一事配合举行，不可再推迟。

(五) 兹将北平市委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召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及党的代表会议给中央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作参考。

中 央

午世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可执行 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①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毛 泽 东

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以北平的情况来说，大约几个月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

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召开 各界代表会议的规定^②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分局：

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极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兹规定：（一）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二）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三）每次解

① 这是毛泽东修改审定新华社报道他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上发表讲演的新闻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②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电报。

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四)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六个月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加。(五)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六)此指示转达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勿误。(七)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中 央

八月十九日

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 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①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华东局并告各局、各野前委:

未敬^②电悉。(一)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除将你们电报转知各局各野外,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

^①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电报。

^② 指8月24日。

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后,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二)各县要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办法照中央最近致华中局并告各局的电报^①办理。要各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领导办理,一改过去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此项全县各界人民会议,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新区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无须待乡村农会建立然后举行。举行此项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经过此种会议去发动农民群众。(三)上述两项请东北局、华北局、山东分局、西北局、华中局、华南分局一律遵照办理。各野前委注意研究和协助。

中 央

八月二十六日

^① 指中共中央1949年8月25日致华中局并告各局的电报。电报指出:县各界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可以选择若干开明绅士参加,讨论全县的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两天至三天开完。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①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刘 少 奇

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以后的国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这个制度是肯定的。人民代表会议怎样形成，看人民积极性，看工农劳动群众积极性，以及中小资本家的积极性，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把人民代表选举出来，但是没有群众的积极性，也是假的。问题在于人民善于运用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不是根据政府组织大纲，不是公民登记如何。人民代表会议是接近苏维埃制，人民代表会议要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区别开，资产阶级旧的民主主义议会制和这个不同，今天人民代表会议与过去参议会(议会制)根本不同，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不同。形式上资产阶级采取公民登记、大家选举、议会制，这是形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民主，工农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我们人民代表会议是工农劳动人民真正有自由，不是形式，因为它的专政是靠群众积极性，靠保护群众利益，来把群众积极性发扬起来，去解决它自己切身的问题，所以不要着重形式，不要着重选举。那些事情可以不可以搞呢？可以搞。但是要保证内容，如果流于形式主义就不好，登记不登记、选举不选举是次要问题。这些代表哪怕是推举的，只要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行。因此在土改中的农民代表会

^① 这是刘少奇 1949 年 8 月 28 日在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的第四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议，那是很实际的，在代表会议上讨论很热烈，所以过去农民代表会议实质上是人民代表会议。过去参议会选举的方法是人民投豆或者举手，投完以后就完事，那是形式主义，那样做法不对。如果一个村子来一个代表，大的来两个，这些代表能够代表人民，没有反动派或者是个别的，大多数人是好这就是好，代表会开得活泼，一个月开一次，一次解决一两个问题，比如过去存在的伙子问题不公，负担问题不公，经过代表会议公道一些，这样大家就会很积极的参加这个会。比如对于军属、烈属代耕制有毛病，提到大会讨论，人们就很关心，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代表会。如果这个村子负担公粮很重，人民代表会议也不讨论，实际上是没有解决问题。资产阶级人民议会装样子，我们不是装样子，而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经过人民代表会议启发人民积极性，教育群众。所以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府和人民联系的最好形式。那么公民登记、选举是不是可以做呢？如果不妨碍会议内容可以做。比如有一个村子有八百人来一个代表，另一个村子有三百人也来一个代表，让那个大村子多派一个人他说是负担，本来他可以有二个代表，但是他要牺牲一个，我们说他增加一个代表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自己觉得是一个负担，这是因为人民群众觉悟程度不高。在会议上讨论问题、行使表决权，有关他们村子问题，应该有两个选举权，但是他只一个票，他知道代表人数多少有关系，下次他就会多派来一个。有关人民群众的问题，这次不知道下次就知道了，所以要注意这个实际。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与苏维埃制度接近，但是也不完全一样，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苏联是苏维埃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只是接近。总之，人民代表会议是保护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利益的，这个和资产阶级国家不同。他们不可能做到这点。

党代表会议也一样，有些人觉得没有党代表会议就方便一些，他情愿开干部会议，而不愿意开党代表会议，如果开党代表会议，大家平等，就会对他有批评；如果干部会议就可能不批评。如果在党代表会议上发现一个干部不好，不仅仅批评，甚至于还可以提议撤他的职。所以为了个人方便就不实行这种国家制度，我们不把国家最重要制度好好做，这是没有原则性。我们要拥护真理，不要只想为自己方便，要撤职就撤职，还是实行制度。所以东北局一级机关和省市，我们要经常开党代表会议，上面开下面就效仿。要建立这样政权、这样形式，人民民主专政才算完全。如果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建立起来，所有问题不是经过人民代表会议解决，名字是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没有完全做到。我们不仅要基本上做到，同时形式上也要建立完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内容，有它的形式，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表示不出来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代表会才能充分表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

人民代表会议各地都开起来！又能发扬民主，又能集中，又能掌握政策。会不会发生毛病呢？也可能。但是一切人选、决议要上级政府批准。你决议的东西，上级不批准，还可以取消，人选不适当还可以撤职。所以可能发生毛病，但是不怕，我们可以纠正。现在我们应该放手，真正把制度建立起来，这个制度不是议会制度，而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毛 泽 东

饶漱石^①同志：

陈云^②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易迁移，不轻易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办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象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积极利用城市的各界代

①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② 陈云，当时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人。

表会议及各县的全县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此种会议，党员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总共超过二分之一，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够，以便团结大批的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必须拉拢的右翼分子，使他们向我们靠拢。此种会议，城市最好每月开会一次或三月开会两次，各县似以两月开会一次为宜。新区各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考虑选择上海附近一二个县亲自领导，开一二次会试试。以上各点，请以你的意见告我为盼。

毛 泽 东

申江

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必须反对形式主义^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前委：

（一）华北局转来察哈尔省委末世^②电，报告该省各界代表会的经验，很值得注意，请加研究。

（二）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

（三）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

①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电报。

② 指8月31日。

威信。

(四)在新解放区,各界代表会的开始若干次,代表的产生可以推派和聘请为主,由可靠民众团体的民主选举为辅。以后,即可改为由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推派和聘请为辅。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

(五)二万以上、不足三万人的城镇,亦可开各界代表会。

(六)尚未彻底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三级均开各级代表会议,乡村开农民代表会议,而以县的各界代表会为中心。

(七)已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乡四级,均开人民代表大会。但在开始若干次,亦可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过渡。

(八)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九)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能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则更好,但不要每次都如此。

(十)此电请转发各市,各县,各军师。

中 央
九月四日

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有益无害^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

八月三十日电悉。同意你们所提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并将此电转发各局、各野研究照办。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问题，自西北局提议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有益无害。而不召开各界代表会，要等到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复电^②（载在《政策汇编》）那样，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县的许多大政方针，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行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过。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可让其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以便孤立反

①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电报。

② 指中共中央 1948 年 12 月 2 日关于新区暂不成立县、区、乡三级人民代表会议问题给中原局的复电。这个电报说：在减租减息阶段，新区县、区、乡三级皆不应过早建立有开明士绅参加的人民代表会议，而应先建立农协，并由农协及其所召集的农民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待群众业已发动起来时，再召集人民代表会议。

动派，利于政令的推行和群众的发动，且可发现问题及发现积极分子。省委、区党委和地委，必须积极帮助各县县委，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布置和领导此种会议。这是全县性的会议，县城及各区各乡及县一级机构，均应有代表，在县委领导下，由县政府召开。这是县的会议，至于区乡，则照你们意见召开区的及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其余均照你们意见办理。此种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们注意收集经验，指导各地，并告诉我们。此电请你们及各中央局转发至县一级为盼。

中 央

九月七日

必须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在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律应当召开，在新解放区的县也应一律召开全县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人民政府与各界人民群众发生密切联系的机关，其重要性和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样的。区与乡则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老解放区，凡属条件成熟的地区，则应召开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凡属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亦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过渡。总之，不论是过渡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是全权的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召开。召开是正确的，不召开是不许可的。

^①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社论《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加写的一段话。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东北局：

申删^①电悉。

(一) 你们来电所提问题，有些提得不妥。在方解放的城市，可用指定和邀请的办法召开各界代表会，等到城市人民团体已经组织起来或原来就有组织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就主要是由各人民团体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与有无名义上的军管无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会议之间，也不应再行划分什么区别。但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在职权上及代表选举方法上则应有区别，人民代表大会是全权的，其代表主要应由人民直接选举或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而不是由各人民团体选举。因在东北还没有经验，目前还不宜普遍召开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暂时召开几次人民代表会议，逐渐扩大代表会议的权力，待有了经验之后，再召开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

(二) 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废除、修改或令其停止执行的权力。而不要规定一律须经上级政府批准。下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人民政府，须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

中 央
九月二十三日

^① 指9月15日。

在各地推广松江县召开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

毛 泽 东

漱石同志：

酉真^①电悉。(一)松江会议成功，极为欣慰。俟各项文件收到后，即由新华总社广播各地。我已将你的来电转发各中央局负责同志，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华东局所属则请你通令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全国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群众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请你抓住松江经验，要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席若干县，取得经验，以利推广。(二)内部总结报告，不需要了。

毛 泽 东

十月十三日

必须将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 团结各界人民的重要工具^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林彪同志，江西省委，湖南省委及华东

^① 指10月11日。

^②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电报。

局,西北局:

十一月二十五日电悉。(一)同意你们所提广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分配及议事日程。(二)你们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

不开或开得很少，请为政务院准备一个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工作的指示，总结过去经验并规定以后的工作。责成各级民政部门经常注意各级代表会议召开的情况并加以督促和向上级作报告。因为上级不加督促，许多政府人员是不大想多开代表会议的，故上级加紧督促甚为必要。

现在就请内务部向中央作一次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工作的报告，要说明哪些地方未开代表会议或开得太少。以便加以批评督促。

刘 少 奇

十二月五日

毛泽东把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张 积 毅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9月4日在《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必须反对形式主义》一文中郑重地指出，要把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作一件大事去办”。他不仅以此要求各级党组织，而且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1949年8至12月间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文电，我们见到的即有19篇之多，前面发表的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毛泽东的这些文电不仅说明他是如何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召开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而且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民主建政工作的进程和成就。这是很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

（一）

毛泽东在1949年8至12月间为什么要狠抓召开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呢？

这是因为当时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既很需要，又有可能。从1948年冬季开始，中国革命战争已经面临着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国民党政权正处于迅速崩溃之中，我军不断解放新的城市和农村，新解放的地区都有艰巨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进行民主改革等项任务。这就需要群策群力，广泛听取人民意见，组织群众参加政权建设，协助党和政府克服困

难,搞好工作。新解放的城市,党和政府开始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但都不能适应需要。比如,有些城市曾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介绍党和政府的政策,征询大家的意见,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这是临时性质,不能解决经常与群众的联系问题。有的城市召开了临时参议会,但它有以下缺陷:一是这种组织形式易于使人联想起国民党统治时代召开的参议会而产生不良的印象;二是在成份上因是聘请参议,容易偏重于原来旧社会的上层人士,难以做到代表的广泛性;三是在职权上因是咨议机关,不可能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而且,这两种形式都不能很好解决民主建政问题。当时解放不久的城市,一时又不具备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只有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最合适的。所以,中共中央于1948年11月30日发出了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指出:“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的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但这个指示发出后到1949年7月,只有少数城市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大都没有召开;有的城市虽已召开,但由于准备不足,使会议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年7月1日发表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这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从中央到地方都越来越需要建立和健全同形势相适应的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扬民主的组织形式。因此,这个时候党中央在准备召开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同时,又于1949年7月31日给各中央局、分局发出了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

毛泽东就是在上述情况下,为了加强地方政权的民主建设,逐步健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把召开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的。

(二)

毛泽东 1949 年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电,反映了当时他在这方面的实践和思想。1949 年 8 月 13 日,他亲自到北平市参加各界代表会,发表了重要讲话。8 月 19 日至 12 月 29 日,他以中央或个人名义发出许多电报,督促各地尽快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并报告开会的情况;批复和批转不少地区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推广开会的经验。从毛泽东 10 月 30 日处理当时华北局书记薄一波 10 月 29 日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可以看出他对推广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抓得是很紧的。他接到这个报告后,当即批转各中央局、分局和野战军前委,指出“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要求他们“认真研究”,“并且印发全党干部研究”,以引起全党干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注意。1949 年 9 月,他还审阅修改了新华社《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社论。毛泽东在指导各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指导思想,主要的是:

第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前身,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初期组织形式。毛泽东在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文电中,多处谈到这一会议的性质。他指出:利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一些施政中的重大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代表们的意见。通过召开此种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当地的最高权力机

关,选举政府。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与人民代表大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各界代表会议,在初期是地方人民政府传达政策,报告工作,征求人民群众意见的协议机关,属于半政权机关性质;当条件具备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时,即成为地方的政权机关。成为政权机关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还有不同,它不是在普选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地方性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和准备,是人民参加管理政权的组织形式。

第二,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这个会议是团结各界人民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对召开这一会议的作用和意义,有许多论述。他说: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是一项重大问题,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对于教育党内外干部,都是极重要的。当地的许多大政方针,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的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不开这种会,长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要以召开这种会议,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将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这些论述说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和意义,在于教育干部,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团结人民,加强政权的民主建设,推动各项任务的完成。

毛泽东在一些文电中,一再强调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经验证明,凡是未注意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处于被动,走了弯路,使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要严催各地迅速召开这种会议,不但城市

要开,农村的县也要开;召开是正确的,不召开是不许可的,要一改过去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

第三,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对如何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他指出:“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他很重视代表的广泛性,提出的代表成份包括各方面人士,一再强调代表中的党员不要太多,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毛泽东对如何开好各界代表会议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充分发扬民主;会议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三)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 1949 年狠抓召开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在建国前后推进政权的民主建设,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第一,推动了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加快了民主建政的进程。1949 年 7 月以后,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许多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各地都迅速召开这一会议。为了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发挥作用,1949 年 9 月 29 日政协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同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分别颁布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到1949年底，全国大部地区都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北京、天津、唐山等市并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了市人民政府。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普遍召开，特别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组织通则的规定，建立了定期召开此会的制度，这是人民行使权力管理国家政权的重要步骤，标志着民主建设的新发展。人民大团结不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渐趋完备。

第二，较好地发挥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教育干部、团结人民、完成各项任务方面的作用。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政府的领导人向代表报告工作，提出今后的任务，充分听取代表意见，条件具备的还选举人民政府，这样就使代表们能很好了解和领会党的主张和政策，亲身感到人民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大大提高了主人翁责任感和工作积极性。

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会议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深深感到，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更好地使各阶层人民了解、拥护和支持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团结各界人民，努力参加各项建设事业；更好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倾听他们的批评，集中他们的意见，充实和改进领导。

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陆续召开，密切了党和政府同各界人民的关系，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从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后，在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发展文教事业等方面出现了新面貌。天

津、上海、武汉、长沙、太原等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在解决劳资关系、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市政建设、房租房权、收税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地方的各界代表会议，促进了城乡贸易、物资交流、生产救灾、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工作任务的完成。

第三，积累了在政权建设中贯彻民主原则、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思想的经验。各地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过程中，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指示。许多地区把坚持代表的广泛性，看成是开好各界代表会议的首要问题。他们尽量把会议的圈子拉大，使各界代表会议既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有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等方面的代表，并特别注意吸收非党人士参加会议。有些地区还注意吸收在本地具有特殊性的代表，如华侨、盐民、渔民，通过劳动改变成份的地主、富农等代表参加会议。

各地把充分发扬民主当成开好各界代表会议的关键。地方党政领导不仅在会上的报告和讲话中注意树立虚心、诚恳、请教的态度，而且采取具体措施，保证代表畅所欲言。

不少领导同志还把正确对待批评，认真处理代表提案，努力解决实际问题，看成是保证会议效果的重要环节。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对一封匿名信的处理，就反映了正确对待群众意见的精神。毛泽东在会上把一封匿名市民写给他的信，交给会议处理，希望代表能够答复这个市民，乃至北平市所有市民的问题。这封信提出的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失业多。代表们对信中所说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大会主席彭真归纳了大家的意见，指出了目前处在一个困难时期，这位市民的信也反映了这种困难，分析了困难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全体代表听了彭真的总结意见，掌声雷动，一致赞成。有的

代表说,中共态度这样真诚,“我实在感动得没有话说了,一定要同中共和人民政府一致努力,克服一切困难”。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人民代表大会相比,两者有原则区别;但后者是从前者发展而来的。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结的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基本经验,在今天的政权建设中仍是值得借鉴的,特别是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加强民主建设这一精神,现在还是要认真贯彻的。

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 文献选载^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九五〇年九月)

**我们的情况是：有困难的，
有办法的，有希望的^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

毛主席继起讲话。他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毛主席举例说到，概算草案中关于养活所有旧军队和旧公教人员的问题，他指出：这就是政策问题。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毛主席谆谆告诫大家说，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

① 这组文电是按时间次序编排的。

② 这是1949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这次讲话的新闻稿。标题是编者加的。

—— — — — —
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陈 云

(一) 目前许多地区是新解放区,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管理的基本统一,在工作进度上是带跃进性的,一定有许多困难。但从客观情况看来,如不作基本统一,则困难程度、危害之烈将更大。其理由如下:

(甲) 支出方面,五六百万主力部队与大行政区直属部队是必须按月由中央(通过大行政区)开支的,其开支到今天为止主要靠货币发行。

(乙) 收入方面,公粮、税收均在县、市、省的手里,收入的多寡迟早,中央无法确实掌握。而公粮变卖及现金税收,又恰恰是今后按月按季回笼货币的主要手段。

(丙) 关内币制已统一,汇兑、交通已畅通,一遇金融、物价风潮,必然牵动全国,除东北外无一地区能自保。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小;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困难大,为害亦大。因此,应该克服统一中可能出现的小困难,避免由于不统一而产生的物价混乱等大困难。

(二) 实行财政经济基本统一管理时,下级的同志可能产

^① 这是陈云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复华东财委的电报,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委。

生一时不关心收入,只伸手向上要的情况,你们预见此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只要我们反复说明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者的责任,并保证下级的开支,那末,预防和克服下级消极情绪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迫切希望你们在这次华东财政会议上,说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权利,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渡难局。

(三) 在上述方针下,对于华东与所属地方的财政关系,我们主张对公粮不实行比例提成,地方税不采取分成办法。具体意见如下:

(甲) 税收中,除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外,划一部分归地方收是好的,但地方征收的各项税款均要计算数字,规定任务,并与地方经费开支加以比较,多则上解若干,不足则由中央补助若干。超收部分,地方可提成 50 % 至 70 %。

(乙) 公粮收入,除经中央或各大行政区批准之地方附加归地方支配外,其余全由中央或大行政区支配。中央或大行政区根据省市全年或半年需要吃粮之预算,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分给地方管理使用。但吃粮以外,另拨粮食作财政开支时,大行政区须先与中央商定。粮食不能随便分散使用,必须集中使用于各大区之间,使用于各大城市的调剂,并且作为今后货币回笼的一个主要手段。属于中央掌握的粮食,由中央统一调度,地方负责保管。管理上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这样就不会在公粮管理上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丙) 军队供给是否由军委后勤部统一,现正由后勤会议研究。未确定前,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先统归军区后勤部,向大行政区报销。

(丁) 大项目的投资(如铁路、工业、水利等)属于中央各部直接掌握者,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属于大行政区掌握者,由大行政区管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

各级党委同志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已于三月三日发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认为政务院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和适时的，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方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

中共中央认为过去各解放区被分割的状态已经完全改变，全国在地域、交通及物资交流与币制等等方面已经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不作统一的管理和有计划的使用，则非但不利于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工作，且将严重地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与妨害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各地同志对于财政经济工作，在过去长时期内是习惯于被分割状态下的各自分散处理的，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并且获得了巨大成绩。但是，现在必须切实地加以转变，如果不加转变，则要犯严重的错误。望各级党委对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向每个党员充分地加以解释，使他们都能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从旧的分散的管理方法变为统一的管理时，各地在财政和物资上的征收、调度与支领等等方面要发生若干困难，是难免的。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在军政、财经各部门工作的党员和非党人员进行解释，准备承受一时的部分的困难，保证政务院决定的迅速全部实现，以便共同努力来克服国家财政上的困难，避免金融物价的大

波动，以利人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中共中央认为完成今年的税收预定计划，是克服财政困难和实现一九五〇年概算的重要环节，因此责成各级党委务必立即从全国每一市、县党委中各抽一个现任部长职务的干部，担任各该市、县的税务工作，克服干部思想上存在着的轻视税务工作的错误观点，以保证今年税收计划的全部完成。宁使其他各部缺少一个部长，而不要让税收机关成为一个弱的工作机关。

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党员必须是遵守国家法令的模范。如有共产党员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有虚报人数、贪污腐化、破坏制度等等违法行为，则除开受到国家法律的严重处罚外，同时还将受到党的纪律的严重制裁。

调整工商业，争取财经情况根本好转^①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毛泽东主席就陈云主任的报告讲话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过去6个月在整理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财经委员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应当注意改正。毛主席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

^① 这是经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新闻稿中转述的毛泽东的讲话。

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毛主席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①,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致 陈 毅 电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毛 泽 东

陈毅同志:

四月二十一日电悉,方针是正确的,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节录)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刘 少 奇

现在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已经统一,国家的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不久可能完全平衡,金融物价已趋向稳定。这是全国最

^① 此段引文不全,参见《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

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是除开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上的胜利以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为人民所做的一件最大的工作。中国的财政经济，在历史上是没有统一过的。国家财政收支，在过去数十年中也没有平衡过，反动政府每年必须发行巨额的钞票和举借巨额的内外债才能过日子。中国的金融物价也是十二年来没有稳定过的，人民必须在通货膨胀的损失中付出巨额的资金。但是人民政府在战争尚未结束与发生灾荒及帝国主义封锁等情况之下，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实现了这些重大的措施，并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是任何反动政府都不能做到的，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做到。这就证明：我们统一中国的口号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其严格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内容的。这是我们国家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在这种进步之下，就为一切正当的工商业及其他生产事业创造了一个恢复和发展的条件，使资本不致用于投机事业或损失于通货膨胀，而用在正当的工商业及其他生产事业上去。

继续稳定金融物价^①

（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

陈 云

三、四月份物价平定之后，货币流速大为降低，贸易回笼大为减少（三月只完成原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四月只完成百分之二十），银行存款则大为增加，计五万亿元左右，其中私人存款占百分之二十。用这些存款收兑了相当数量的美金，并大部贷给贸易公司。三、四两个月金融活动的特点之一，是银行存款对财政

^① 这是陈云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发的一份财经简报。

贸易周转起了大作用。银行存款增多,这很可能是好现象,但由于我们对这一方面历来没有经验,不能不从坏的方面着想,预先防止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在于,物价如有幅度较大的上涨,则存户立即提存。由于银行已将这些存款贷给贸易公司或收兑了美金,为了支付存户提款,就只能大量增加发行,以应急需。因存户提款增加发行,市场抢购物资,其结果,物价又可能发生更大的波动。对此危险,必须预筹对策,力争物价平稳。这不仅关联到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且关联到中央人民政府的信誉。我们必须预先防止这种危险性的另一原因,是目前人民币阵地尚未有很大的扩展(虽然华北赶集农民已要人民币了),多数人对物价平稳尚未相信。经过十二年通货膨胀之后,也决不能希望两三个月人心即变。为了预防危险,我们拟行下列办法:

一、掌握足够数量的纱布。现在,纱布依然是我们物资中的弱点。公粮是一两次就征起的,因此我们手内存粮多。纱布则全年虽够,但那是逐月纺织为成品的,应付门售后,余纱余布也是逐月积累的。如我纱布尚未积到较大数量而发生金融物价风潮,游资又集中攻击纱布,则纱布防线有被冲破之险。因此决定对内对外适当增购棉花,扩大委托上海私营纱厂代纺的数量,力求在短时期内增加纱布实力。现中贸部、纺织部手内共有四百万匹布,十一万件纱,价值一万四千多亿元,拟将成品增至二万亿至二万五千亿元。究竟能购多少棉花,增加多少代纺,待计算后通知华东、上海。如能实现,对国家,对上海私营纱厂的劳资双方,都是有利的。

二、扩大人民币的流通面积。目前货币流通市场虽在扩大,但事实证明流通面积仍是不大的。除国家银行库存以外,实际上市场周转的货币在四万亿元左右。四月份从财政和收购放出去

的货币,又迅速转为国家银行的存款。这就证明,流通面积的扩大还很有限,人民币主要浮在若干大中城市。设法扩大货币流通面积,是预防金融物价发生风潮的办法之一。因此,请求新区各省党政领导同志,指导并协助国营贸易机构,在若干县内,各选择其重要市镇,利用已有的合作社,或找寻代理店,或设立国营商店,售货照贸易公司的统一牌价专收人民币。只要在许多市镇上有了按统一牌价专收人民币的合作社或商店,则扩大货币阵地和稳定物价,就能迅速而有保证。

三、吸收定期存款。现时定期存款只占全部存款额的七分之一。人民银行总行正在研究利息和其他方面的办法,以便多吸收两、三个月及更长时间的定期存款。只要这种定期存款占了相当的比重,则金融物价波动的风潮即令到来时,定期存款者不能随时提取,就可减少一部分压力。因为今后金融物价波动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估计只要有一两个回合应付过去,风波即可平息。

四、如果金融物价风潮来势猛烈,单靠上述办法还有危险时,我们最后一着,就是把军政经费迟发半月二十天,同时限制一切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在银行存款的提取数量,把大部存款作短期冻结(那时公营企业可以向职工请求迟发半月或二十天的工资)。这是一种力量最大的短期通货紧缩的方法。这一点非到危机时决不轻用。当采用时也要分别轻重缓急,而决不能千篇一律。这是一种预想的办法,照现状看来,最近一两月内,还不会有危机,因此也不必采取这一着。但请求中央和各地同志,在万一危机到来时,允许我们行此最后一着。

只要在税收方面纠正存在着的某些错误偏向,而又能逐渐制止贪污偷漏,继续保持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加上上述各项办法能够实行,虽然我们还没有经验,必须继续兢兢业业地前进,但

大体说来,危险是可能避免的。

我们估计了金融物价波动的危险,预筹了防备的办法,同时还必须注视在物价继续平衡之下可能产生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即物价猛跌。我们定于五月五日召开以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稍后还要召集各省工商厅长会议,研究办法,调整公私关系。同时还在准备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和定购数量,并适当地放出货币,收购农产和上海私商的纱布。依靠我们的收购,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物价跌势,基本上已停止。但今年麦子如果丰收、麦价下跌将难避免。我们可以放出一部分粗粮、百货,换回麦子。也可少量收买一些麦子,不使麦价过低。估计麦子上市量大,收购力小,因此难于保持麦价不下降。如果国家大量增发钞票,收买麦子,虽然粮食方面的准备是充足的,但钞票大量增多的结果,游资对我们的进攻之点,很可能是纱布而不是粮食。增发钞票后,纱布的准备就相对减少,成为我们的弱点。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经工作^①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日)

毛 泽 东

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① 节录自毛泽东致饶漱石并告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高岗的电报。标题是编者加的。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 稳定金融物价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各大区财委,华北五省二市财委并报中央:

杜鲁门于本月 27 日发表对整个亚洲人民的挑战的声明,我们估计,在总的方面是会更加加强我国的团结、更促进我们解放台湾的决心,但在某一小部分人中间很可能发生动摇,反映在经济方面,很有可能发生抢购物资抬高物价的风潮和逃避资金等现象。昨今两日天津股票市场甚波动,开滦、启新股票均跌落 28% 到 30%。上海纱价从 530 万元涨至 545 万元,我们的对策是放手抛售物资,对一切投机捣乱分子给以打击,把这一可能到来的金融物价风潮打下去,继续稳定物价。

除应依照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的讲话及周外长声明进行广泛宣传外,并作如下指示:

(一) 各地贸易公司合作社应按照中央贸易部规定的牌价放手抛售一切存货,不得惜售,不得抬价。

(二) 中央贸易部应迅速但是稳当而有步骤地购买国内市场上所缺乏的各种进口品,如五金器材、电料、化学药品等,以保证进口品价格的平稳。必要时可从人民银行再拨付一笔外汇,专供购买此类物品。各地应即清理仓库中已经清出的五金器材、药品、染料,除酌量保留我们自己两个月的需用量(两个月可进口)外,应尽量抛售;同时各公营企业应在一个月内尽量减少当下非十分必要的入口器材的收购。

(三) 人民银行应对外汇牌价作适当调整(在一礼拜内准备

调整到 3.5 万)使之有利于进口,并对私人供汇尺度适当放宽。请各大行政区财委就本区需要外汇情况,通盘作一估计,在有计划地入口的条件下,银行应满足各地的外汇要求。

(四) 禁止黄金银元买卖的地区,应加强管理,防止高抬黄金银元价格、捣乱市场的不法行为。

(五) 各大区财委、各大城市的市政府市财委对于可能发生的物价波动应严密注意,物价若有波动,应组织力量坚决击退之,予投机者以沉重的打击。

以上各点请讨论执行,并将三日来市场动态电告。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调整 国家仓库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党委,各军区、各野战军并各财委、各后勤:

(一) 今年全国各地,多反映因仓库缺乏,使粮食等物资遭受严重损失。仓库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现有仓库的使用极不合理。由于各地解放时各部门按原国民党系统仓库接收之后,没有根据实际需要重新调整,以致发生许多不合理的占有现象。某些部门,占有仓库超过实际需要,将多余仓库出租、出借、空闲、放置废物或改作他用;而缺乏仓库的部门,则被迫将许多贵重物资,露天存放,听任风耗雨蚀。某些部门与部门之间,为争用仓库发生纠纷,影响团结,以及仓库糟塌损坏无人负责等现象,亦严重存在。

据中财委协同苏联专家检查报告称,北京市公家粮食,露天

存放 2 亿斤,装卸、翻仓、包装等费用超过正常库存10倍以上(该项费用相当于存量的 7.5%),霉坏、损耗尚不在内,而规模巨大的丰台西仓库中,不少库房放了些废料、烂铁;满清时建筑的储粮仓库,被几个部门割裂使用,有空闲的,有改为汽车修理厂的;其他仓库亦有空闲者。这些仓库如加以合理调整,腾挤出容粮 2 亿至 3 亿斤的仓库,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在北京明年就可以不建筑新的仓库,为国家节省建仓费 4000 万至 6000 万斤小米。

根据许多反映,各地仓库占有情况,亦大都与北京相似。特别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大城市,仓库占有不合理的现象是严重的。这些城市的仓库,如加以统一调整,使每一仓库都被合理利用,仓库不够用的现象是可以大大改变的。

(二) 目前国家财政尚处在困难状况中,军政费开支还很大,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亦很多;现有仓库如经过合理调整,可以节省许多新建仓库的费用。因此,中央完全同意中财委的提议,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将现有仓库按照各单位实际需要,统一作一次合理的调整。仓库有多余的单位,腾让一些出来,库存不重要物资者,应迅速设法处理。只有重新调整之后,确有不足时,始可考虑建筑若干新的仓库。

(三) 中央已责成政务院党组加以讨论,拟定调整办法,并在中央及各大、中城市组织仓库调整委员会,统一进行。此项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关键在于各级党委是否重视,及各拥有仓库单位的负责同志能否克服本位思想,照顾整体。因此,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及各级党委及军队党委,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重视这一问题。在军队后勤部门、各财经部门及其他与仓库有关部门的党的组织中,结合整风,进行思想教育及组织动员工作,克服只顾自己方便、不顾整体的本位主义思想。

彻底检查清理自己的仓库,将可以挤出来的仓库,主动上报,请求调整。并在调整委员会决定之后,克服一切困难,严格执行。各大、中城市党委,应留书记或副书记负责主持此事。争取各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各大城市,今明两年内,基本上不进行新仓库的建筑。

建国初期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

户 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迅速扩大，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全部获得解放，由于战争而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终于连成了一片。适应这种形势，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就成了必然的要求。同时，统一管理财经工作的时机也日趋成熟。实现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制止了12年来的通货膨胀，为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是建国初期所取得的一项伟大成绩。

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什么要统一

由于战争的原因，各解放区在财政经济工作上，除政策由中央统一制订外，在经营上、收支上完全是分散的，连货币也是独立的。东北解放区流通东北币，中原解放区由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中州币，还有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均发行自己的货币。货币有北海币、冀南币、华中币、西北农民币、陕甘宁边币等等。即便在一个解放区，由于分散等原因，也发行多种货币。如华中解放区就有淮南币、淮海币、淮上币、江南币、江淮币、大江币、华中币、北海币等多种货币。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适应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是取得了极大成绩的。

随着解放区连成一片，财政经济工作逐步在解放战争胜利

推进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统一。1948年12月1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券(即人民币)，成为华东、华北、西北三大解放区的流通货币。其后，相继收兑中原币等，在建国前便统一了关内各解放区的货币。

但仅是货币统一还不够，就财经工作的全部来说，基本上仍是分散的，这不适应全国大陆解放的形势。财政经济工作必须统一，理由还在于：

第一，当时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全国军费猛增，五六百万主力部队和各地地方部队的开支，均由中央财政按月支出，而为了保证部队的供给，又必须靠大量地发行货币，这样，势必给中央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第二，建国之初对被战争破坏的铁路、交通、重要企业等必须迅速恢复，这也须国家财政加以负担。加上我们对国民党旧政府人员采取基本上包下来的政策，开支不能减下来，这使已经困难的国家财政进一步增加了困难程度。

第三，相反的，中央财政在收入上无法确实地掌握和控制。因为当时公粮、税收均在县、市、省的手里，收入的多寡迟早，中央不能事先知道。这样，中央财政只统一了支出，却没有统一收入，造成只能增加货币发行的被动局面。

第四，除东北仍流通东北币(东北币到1951年4月1日才收兑)外，全国大陆币制的统一，使金融、物价风潮一经掀起便波及全国。而建国前后，全国物价先后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动，而以1949年10月至11月的物价上涨为尤甚，1950年1月至2月又上涨了一次。我国人民已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必须使金融物价稳定下来，才符合人民的殷切期望。

因此，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势在必行，只有这样做，才能维持尚未结束的战争的需要，才能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困

难，才能符合人民稳定物价的希望，才能恢复国家的经济，才能为国家全面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也才能保证我们对市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有效地打击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

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步骤和内容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要求在建国之前就逐步提出来了。当然，要解决财政经济困难，首先要抓住生产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发动全国人民努力恢复生产。中共中央和政务院重点抓了交通、农业和水利的恢复，疏通了城乡经济交流，安顿了人民生活。其次加强了金融管理和市场管理，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来稳定金融与物价，国家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地、大量地抛售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的粮食和纱布，以此打击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控制了物价的上涨。

在抓好重点恢复经济和稳定金融及物价的同时，在财经管理上决定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统一财政经济工作，早在建国前便已经部分实现。1948年12月发行人民币后，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就统一使用人民币，同年12月24日，华北、中原两区达成《华北中原统一货币方案》的协议，规定中原解放区自1949年2月25日（实际为3月10日）起正式流通人民币。这样，除了东北，关内各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基本完成。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工作。3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便对整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的领导。7月27日至8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财经会议，陈云在8月8日和15日作了两

次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要统一管理”等意见。12月28日，陈云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复华东财委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委的电报中，提出了“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认为“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管理的基本统一”，是一项极其迫切的工作，不统一危害很大。

1950年2月13日到25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全国财政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财经工作统一的决定》的报告。会议提出，在统一财经工作方面要做到：财政收支统一集中到中央；公粮统一，除5—15%作为地方附加外，均由中央统一掌握；税收统一，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统一集中到中央，每月结算解缴国库；统一编制，改变编制庞大、人浮于事的状况；贸易统一，各地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地方不能干预；银行统一，现金的调动统一于银行。这次全国财政会议为在三月间颁布政务院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奠定了基础，提出了统一财经工作的比较全面和完整的意见。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文件也是由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起草的。《决定》有十个方面的内容，略谓：（一），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制订各级编制，人员统一调配使用。（二），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统一调度所有库存物资，合理使用，以减少财政支出及向国外订货。（三），厉行节约。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四），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五），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

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六)，为了调节国内供求，组织对外贸易，有计划地供售物资和回笼货币，各地国营贸易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和物资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负责。(七)，划分企业归属。(八)，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九)，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开支及恢复人民经济所必需的投资。(十)，必须严格地完全地执行以上九项规定。

这十条决定，是克服国家财政经济困难，控制通货膨胀，保证国家财政开支的重要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点：一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在此之前，中央在财政上只统一支出，而未统一收入。公粮、税收等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均在省、市、县中，而支出则大部分由国家财政开支。二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这样，便于国家调节市场，控制需求，对投机资本进行斗争。三是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决定》规定一切军政机关和国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并且规定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这样就减少了市场上货币流通数量，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运用和控制的资金。

为保证政务院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于同日发出《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通知》指出，“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不作统一的管理和有计划的使用，则非但不利于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工作，且将严重地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与妨害国家的恢复和建设。”《通知》保证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迅速统一。

其后政务院又接着颁布了《关于统一管理 1950 年度财政收

支的决定》、《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央金库条例》等，对全国的财经工作实行了统一的管理。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起草的题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社论重申了《决定》的精神，指出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直接效果之一，就在制止通货膨胀。社论分析了在统一财经工作的过程中发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困难，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同日，政务院还通过了《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这样，就从财经工作的各个方面，保证了贯彻集中统一的原则。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作用和意义

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扭转了建国初期极其险恶的经济形势、取得了新中国经济战线上第一个巨大的胜利，这对于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巩固，对于渡过建国后的第一个险滩，起了极大作用。毛泽东说，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的胜利，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刘少奇说：“中国的财政经济，在历史上是没有统一过的。国家财政收支，在过去数十年中也没有平衡过，反动政府每年必须发行巨额的钞票和举借巨额的内外债才能过日子。中国的金融物价也是12年来没有稳定过的，人民必须在通货膨胀的损失中付出巨额的资金。但是人民政府在战争尚未结束与发生灾荒及帝国主义封锁等情况之下，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实现了这些重大的措施，并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是我们国家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①具体地说，统一全

^① 刘少奇：《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1950年4月29日）。

国财政经济起到了如下作用：

第一，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使财政经济状况开始走向好转。由于掌握了全国的主要财政收入，资金与物资也集中在国家手中，中央掌握财源的结果是使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为此，国家就无须再增发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

第二，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1950年3月政务院颁发《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从4月份起，物价即停止上涨。以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同年12月下降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结束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已的局面。陈云指出：物价平稳，“这不仅关联到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且关联到中央人民政府的信誉”^①。

第三，建立了人民币的信誉。由于制住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抛售物资，回笼货币，以及打击银元等政策的实施，人民币在流通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4月份开始的物价下降趋势，使人民币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加强。195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总额比1949年12月猛增16倍以上。人民币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了威信。

第四、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为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为不失时机地开展经济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毛泽东1950年4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曾指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过去6个月在整理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财经委员会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

^① 陈云：《继续稳定金融物价》（1950年5月5日）。

总之，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建国初期那样分散混乱的状况下，将财政经济工作集中统一起来，是完全必要和适时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建国后的头三年中的重大事件之一。

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文献选载^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九五一年九月)

中共中央对平稳物价的几项建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财委会及财办：

人民银行新币发行，适值平津、淮海两大会战，太原尚未攻下，战争供给空前巨大，货币发行突然增加，以致关内物价剧烈上涨。加以事前准备未周、宣传不够，使我货币供给及物价掌握更感困难。目前各地均苦货币不够，要求大量供给；同时又怕物价剧烈上涨，要求紧缩货币，平稳物价。因之一面感到票面过大，刺激物价上涨，一面又苦印刷力量不够，竟印大票。如此矛盾状态，必须迅谋解决。现在人民票既已发行，不管情况如何，各地必须以全力支持，而战争供给亦须各地共同负担，如因而引起物价波动，亦须各地分担平稳物价之责，方能渡过一时困难，走向胜利发展。必须教育干部，尤其是财经部门干部加强整体观念，克服地方主义思想。为此，特向各地提出下列各项建议：

一、各地均应负责采取各种有效办法支持人民票，平稳物价。现在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平津战役亦将胜利结束，战争胜利，地区扩大，各地应妥慎掌握货币发行，严禁投机抢购，并适

① 这组文电和讲话按时间先后编发。

当抛出物资,特别是国营工厂的物资,如煤炭、铁、纱、布、盐、粮食、纸、烟、酒等等,使物价渐趋平稳,否则物价再涨,增发货币仍然不能解决困难。

二、中央已令东北赶印小票,并正谋利用平、津的材料及工厂赶印小票,在此物价波动尚未平息时期,各地希勿多发大票,少发一百元券,不发二百元券;多发十元券及二十元券,即因此而引起若干困难,亦宜暂时忍受。

三、货币既已固定比价,一地物价波动难免不波及邻区,且有些波动因受战争影响,不能完全避免,只能尽力减少其波动的程度,不准再作人为的恐慌,而加重波动。对于战争所引起的物价波动,各地必须互相支持,这不但是为支持邻区,而且是为支持战争,即因此而受到某些损失,不应过分计算。

以上各点希即研究执行。

中 央

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关于公债及其发行问题给 中共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

陈 云

中央:

未寒^①电悉,谨复如下:

^① 未寒,指8月14日。

(一) 迄未灰^①华东发行已达 1,300 亿^②, 八至十二月全国财政赤字(收入估计约 1,800 亿除外)为 5,800 亿, 现正当□新区收入^③, 但一时难以骤增, 因解放区日在扩大, 人员继续增加, 修铁路, 建海、空军等原因, 开支不能减少, 减则对战争不利; 秋后收购棉花及出口物资需现钞 3,500 亿(物资抵 1,000 余亿除外), 为保证纺织, 保证农业副产的继续生产(目前茶、丝、桐油、烟叶等物, 农民销不出, 公家不买, 无出路), 收购物资款项亦不可少, 两项合计为 9,300 亿元。目前江南农村及小城镇人民币并未占领市场, 因物价波动, 交换类多以大米计价, 目前大米价格突出, 与战前物价比较, 大米价格超过工业品价格一倍左右, 此种情况如不改变则对工业生产十分不利。改变的办法在于随着秋谷登场, 争取物价的相对平稳, 货币下乡, 改变大米计价为货币计价, 缩小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倒剪刀形差额, 可是发行 9,300 亿就不可能争取这种情况, 发行公债 2,400 亿, 只占货币发行额的四分之一, 但对金融上所起的作用则很大。其利如下: 甲、弥补赤字四分之一; 乙、减少物价波动; 丙、易于收购土产; 丁、帮助货币下乡。

(二) 华中两次来电, 要求华中一地分两期发行 8,000 万至 10,000 万银元(合人民币 1,600 亿至 2,000 亿)之公债, 要求数字超过会议分配数很大。会议中大家也拟过三个方案: 八千、一亿、一亿二千(银)。最后大家意见按一亿二准备, 因京、沪、杭三角地区殷户普存美钞黄金, 公债目的虽在收回人民币以减少发行, 但事实上势难完全拒收金钞, 故在华东拟在公债中接收 300 亿价值之金钞。另外如在收公债中银根过紧而不利于工商业时,

① 未灰, 指 8 月 10 日。

② 指旧币。1955 年 3 月 1 日旧币以 10000:1 折成新币。

③ □内字不清。

则我们准备延长缴款期限，并准备减为 2,000 亿至 1,600 亿。目前之所以债额定为 2,400 亿，而不定为 2,000 亿或 1,600 亿的原因是，因为八、九、十三个月的财政收购发行数字共约 6,000 亿，而公债收回之数半除金钞外只 2,100 亿，在放多收少中银根不致过紧，但如过紧时则准备实行延长缴款或减少推销数字两个步骤。

(三) 公债以劝购派购形式推销(事前做调查)，因此工商业家内心中不会拥护，但公开积极反对者估计也只有少数(有政治背景或对人民政府不满的人)。把发行公债的好处对工商业家讲清楚，并采取各大城市代表会形式加以讨论通过，工人劳动者及舆论方面赞助购债，则工业家亦会承受，但派他们的数字大了，也会叫。总之，工商业家对发行公债不会积极拥护，但积极反对者为数也不会多，发行公债对资本家说比起工商业的利润是小，资本家短期内是有一些牺牲，但便于渡过这五个月的财政困难。发行 2,400 亿工商业会不会垮呢？我们考虑不会，大中城市游资很多，2,400 亿为数不大。另方面，债币下乡有利于物资交流，又可刺激工业的恢复，这种影响对于工商业特别是工业资本家是有利的。公债会不会失败呢？我们考虑发出多少问题，掌握发行时的资本家情绪及金融状况，如银根紧，在时间上可以放松，在数字上可以减少，适可而止，是不会失败的。

(四) 公债用折实办法，利率四厘相当于半年定期折实储蓄利率。现在上海有许多工商业家要求折实储蓄(因其他处于半停滞状态，又不好作投机事业，但又不愿作长期储蓄)，利率四厘适合于正常储蓄利率。

(五) 解决财政收入的办法，一般国家均用征税、借债、发行钞票三种办法，我们因长期处于农村，对公债办法用得很少，在货币收入不足货币支出(多年来事实上是如此)的情况下，今后

适当应用公债的办法,比单纯发行钞票好,短借短还目的在树立债信(会议中有人主张半年还一次,大家考虑到明年五六月还有困难),必要时与第一次还债同时可发行第二次公债,明年秋后还三分之一,因正在秋粮登场、市场需要筹码多的时候,估计国家确能偿还。

(六) 以上各节为华东及各地同志研究后的意见,当否请中央指示。

陈 云

删^①

中共中央关于邀请工商业界代表 人物分批座谈财经问题 致陈云并华东局电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

转陈云同志并华东局:

据陈树通来谈,你在上海并未公开,有关财经问题,尚未与民族工商业家会谈,不知实情是否如此? 请你考虑在动身前分出两三天时间,专门邀集上海工商业界代表性人物分批座谈有关财经各项主要问题,并多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回平商决公债及其他有关问题,能得到更多的把握。在他们所提意见中,如有显而易见的对美幻想、畏惧封锁及反对土改等等,必须当场予以教育,批判其错误观点及错误想法;如确有好的或不完全好的建议及批评,我们应予以考虑,使他们敢于言、尽其言并能得到

^① 删,指15日。

应有的结果。

中 央

八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 铁路财政统一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各地财委并报中央：

自解放以来，铁路的修复与业务开展是有很大成绩的，惟铁道财政制度尚未完全统一，致影响机车车辆的调度、保养及运输效率的提高，致各路运价率不一致，国家运价政策难以掌握和贯彻。经我们研究，并已征得各区财委同意，认为铁路财政目前已具备统一的条件，兹作如下决定：

一、除东北铁路本年度生产财务计划(预算)仍按原计划执行并随时报告外，关内各铁路管理局之营业收支自十二月份起统一归铁道部直接掌握，实行统收统支，统一调度，各大行政区及省市府不再贴补赤字或抽提盈余。

二、关内各铁路管理局财政统一于铁道部后，在经营上总的要求应由收支平衡逐渐达到收入富裕，开支上须有严格核算制度，及定期(月、季、年度)营业收支的预算和决算，经铁道部核准并统一调剂。铁道部应将收支对照表每月汇报本会一次。

三、关内各铁路管理局之修复工程，补强线路，增加设备，修建工厂等需国家投资之事业费，须事先拟具详细计划及预算报铁道部审核，并经本会核准后统一筹拨。完工后，须有工程总结报告及财务材料的报销决算。新建路线及更大投资，须经本

会提请政务院批准后实行。

四、铁道部须加强对车辆周转与材料工作的领导与精密计算，工厂经营上应更严格执行企业化，建立经常的报告和检查制度，克服经济工作上的无政府状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五、各地区财委会对此决定，不能认为减轻对铁道监督的责任，必须注意就近指导，监督并保证铁路财政统一的贯彻执行。对财政统一前各地补贴或调拨的款项物资，直接与各该路局清结，并将结果报告本会。

中财委

在全国财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朱 德

一、财政统一问题

这次财政会议，主要是解决全国财政统一问题。财政统一，是我们多年来争取的事，会议上大家都赞成通过了。今后，我们必须统一的基础上来建设全国财政。

自我们有了军队和政权以来，一般的制度都是由下而上建立的。这样就造成了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和跟上面讲价钱的现象。现在情况相反，许多事必须由中央统一，许多收入也必须归国家，再不能各自为政了。因为，国家要支付各方面的开支。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的统一，解决台湾、西藏的问题。这对全国的生产有很大的保障和发展，必须由国家去支持，希

望同志们回去先从统一着手。过去各打各的主意,很不好,那样会妨碍国家的统一。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党中央已有指示^①,政务院已作决定^②。因此,就需要大家来宣传和贯彻。

现在军事上已取得胜利,消灭了军阀割据,交通也恢复了,统一的条件完全成熟。统一起来建设国家是必要的。

过去的国家是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他们虽然也要求统一,但为的是便利剥夺,大肥私人腰包。现在我们要求统一,为的是替人民大众做更多的事。目前,我们要打仗,要救灾,要解决九百万人的生活,同时还准备下半年能有更多的人转入生产,这都是大事。至于将来,更需要统一,这样生产才能发展,收入才可以增加。我们的国家从未真正统一过,现在统一了,许多事业都可以得到发展。这样大的家务,这么多的人口,统一起来力量就大了。

如何统一?中央和地方要有分工。现在各大行政区是中央的代办机关,是中央级的机关,将来中央有条件能指挥全国时,就不一定需要它了。所以,将来是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在老区,各省县的财政制度已经建立,但分工还不够明确。新区的制度还未建立。现在各省、县的附加税不一致,区、乡也不统一。根据苏联的经验,有些税是归地方所有,因此我们必须规定一定的地方附加税,这样才能使分工明确。

过去游击时期,一揽子的办法曾有过效果。今天情况不同了,不能采用这个办法了。首先军队已经统一,它的开支要由国家负担。因此,各地必须服从中央,不能闹独立性。否则就不可

① 指《中共中央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该通知于1950年3月3日正式发布。

② 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该决定于1950年3月3日正式发布。

能统一。中央划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收入，而且支持地方在这个范围内把工作做好，如果仍旧把中央的东西抓在手里，是不合法的，对党员来说是党性不强。

同志们回去，必须把思想打通，要真心爱国家，顾大局，大家务必须建立在中央。因为我们的中央，已不是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中央，而是为大家办事的中央，否则，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and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区别在哪里呢？因此，大家务集中在中央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二、编制核算问题

目前，编制最大的是军队，总共有五百万人，必须加以整顿。有的地区已结束了战争，有的仍在继续。不打仗的编余人员，就必须整顿一下，使他们能转入生产。战争是纯粹的消费，如果能把消费变为生产，不仅减少了开支，而且能增加收入。打仗的人总想把兵编得愈多愈好。所以，整顿编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编制机构，部队里虽然也有做人事工作的，但还没有由上而下的建立起一套机构，来统一管理编制。因此，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编制委员会。

今年是一个难关。不打仗的军队要转入生产，但也是有限的。例如从事一些农业水利建设，它的收入并不大，可是却奠定了明后年转入生产的基础。如果五百万军队，有二百万能转入生产，收入就很可观了。国民党部队留下来的那部分人，有的是抓来的，他们想回家，可以让他们走。有的人如果没出路，是会去当土匪的。因此，这样的人必须由国家来管，这也是编制委员会的任务。此外，必须教育官兵去参加劳动。编制委员会必须按照编制好好掌握。毛主席说，我们必须管每个人，现在

只能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来吃。

由消费转入生产，是各地机关都要注意的事。不管留下来的是什么人，我们都要去管，而且设法使他们转入生产。这是编制委员会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不同的地方。

过去我们的经验，人们参加了劳动，就会知道钱来得不易。因此，部队转入生产的另一个好处，是使他们知道了节省开支。中国的社会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已失去了常态，一部分人终日昏昏醉醉，不知创造财富的艰难，生活十分奢侈。我们入城之后，改变了社会风气，这个转变是好的。但是，我们也有些同志在进城之后，慢慢学会讲究。所以，我说人只有在生产中才能知道物质来源的艰难。社会的改造也不是无条件的，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重要的是把消费转入生产。我们这样做，即使今年成绩不大，但是社会风气多少也可以改变一些，而且也为以后发展生产奠定了基础。

过去苏联组织有合作社，我们的机关、部队人员都很穷，可以说过的都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但是工作人员生活必须要有保障，家庭也要有适当照顾。因此，机关内部能建立自己的小家务，有很大好处。但是，按过去的经验，它的坏处在于各机关只顾自己赚钱，就会有乱抓乱花的现象。因此，各机关组织合作社，搞生产，建立自己的小家务，也是编制委员会应注意的事。

编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虚报人数，必须按照需要切实办事。据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机关，比国民党时期大上七倍。当然，我们做事是依靠组织的，需要的人多，不能象国民党时期一个县几十万人口，只有一个县长。不过人用的太多了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中国人向来就会使唤人，随随便便就可以雇上几个“下人”。现在，机关的勤杂人员很多，我的意见，机关里

的职员，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可以自己动手，自己可以洗衣、扫地、打水，做这些事也是锻炼。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打破面子，做些“小人之事”。以前大家都说没时间做，现在八小时工作制了，时间一定会有。因此，关于勤杂人员的配备，必须尽量减少。

编制是一件大事，将来机关工作是要靠它做基础的。

许多学校和脱离生产的机关的编制，可以暂时紧缩，当然生产机关必须增加些人。此外，银行、税务机关的人员也要加强。过去我们有许多事，只要别人一反对就不做了，以后决定了的事必须坚决贯彻。

三、清理仓库问题

清理家务，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次决定清理仓库意义重大。现在我们到底有多少厂子？多少物资？必须去弄清。

财委本来要有一个供应局，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没有人就没有建立。因此，我们到底有多少财产，还不清楚。如果将全国的仓库清理出来，我说不用现金，用物资即可投资。

清理仓库，投资工业，发展生产是重要的事。

建立家务，还必须依靠组织力量，将来我们有七百万人去搞生产。组织群众去搞合作社是十分重要的事。这样的事业不用我们花很多钱，只要很好地使用干部，就可以了。

劳动力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国私人的生产力比公家的多，因此必须了解资本家的家底，要好好管理，要抓好税收工作。

清理家务包括国家的、合作社的和私人资本家的。需要一年到五年的时间，在我们做国家计划之前，必须在各方面建立起家务、清理好家务才行。这样，生产才有基础，才有依靠。

四、健全税收机关

过去尽管我们懂得税收可以增加国家收入，也知道这是件重要的事，但工作上总有毛病，怕人说税重啦，怕与国民党比啦，等等。因此，就有了轻税和所谓“仁政”观点。经过多年的斗争，使大家知道不靠税收，国家开支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的政府又不是神仙，没有钱一样办不了事。现在大家思想真是通了，但困难的问题是没有人去做。国民党时期的税收人员绝大部分都贪污。现在不同了，为了把税收工作做好，要有十分可靠的人员。过去我们县里的工作，除了县长之外，就是做组织、宣传的人，现在必须把税务局长提到重要的地位。税务人员的数量要多，质量要好。这样税收工作才有基础，才有保证。中国历史上的税吏大都是贪官，因此，人人瞧不起。现在，我们不是剥削搜刮人民，而是依照国家规章收税，增加国家收入。这样的税收人员，应受到大家的尊敬。

公正的税收可以消除轻税和所谓“仁政”观点。税收人员如果自己再捞一把，大家的负担自然就重了，国家的收入也被他们中饱。因此，我们在财政上必须实行监督。过去国民党的税收，繁而且重。因为其中70%都到了私人的腰包。我们的税收是公道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做税收工作的人也是非常廉洁的。

为了建设国家和发展生产，每个人都有纳税的义务，我们政府工作人员，要缴所得税。合作社、国家贸易机关和国营工厂也都要纳税。这样，可以使每个人每个企业在做每一件事上，都要想到是否对国家有贡献。所谓爱国家的具体表现，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我们公营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纳了多少税。

资本家对国家纳税，常常喜欢作弊，我们也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财政上最重要的是做到收支平衡。靠发票子来维持财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想从发票子中解决财政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尽量少发票子，要增加税收，用税收来保持财政平衡，才能巩固。苏联的交易税占整个税收中的三分之一，这里面可能因为苏联商品流通得快，交易额多的缘故。我们必须增加交易税，因为货物交易充斥在全国范围，交易税在每个人身上占的比重也不大。所以，实行交易税后，既可以使货币下乡，又可以使货币回笼。

征收公粮，在今天固然很重要，但在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运费大，搬运也不方便。因此，将来可以在产棉区征棉，产茶区征茶。多征收工业原料，对国家是有益的，既可以减少搬运上的困难，还可用货币与粮食调剂。在这些东西的征收上，也可以使用现金折合的办法，这样可以使货币下乡。

现在，我们的货币还不能充分流通，要使货币充分流通，必须稳定币值，使人民相信。这需要我们一二年的努力。

所以，我们的财政靠发票子是不行的。人民币是靠实物保本的，只要在粮、布上掌握不好就会受到损失，粮价上涨，布一定也涨，投机商就起来了。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大胆一点，适应正常的涨落规律，但也不要过分；另一方面，要掌握大批的物资，用抛售和法令来稳定货币。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储备一定数目的票子。今天的纸币数目固然很大，但等到全国打通了，人民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就更大了，对币值的稳定就有了好处。

五、贸易问题

在贸易上，过去有大公和小公的矛盾，现在又加上了公与私的矛盾。最近，各地区都有了大的斗争，但是不管怎样，财政必须统一。

贸易统一了，才能促进发展生产，刺激公私经济，使全国的经济活起来，并与世界经济取得联系。例如我国的特种矿产钨、锑、锡等，因为战争停止外销，生产便滞减了。现在把它们统一起来，与苏联等国家进行贸易，就大大发展了生产。我们统一的与世界做生意，就可以按照国家的需要，从苏联等国家买回机器。

要发展我国的农副业、手工业(如制茶)，也必须依靠贸易。贸易是为了发展生产，贸易统一了，各种事业都会有发展。一切生产不管资金有多大困难，只要找到销路，有了市场，就可以得到发展。贸易的统一就在于搞活全国工农业生产。

要建设中国的几项基本工业，要在今后的五年计划中才能实现。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货物去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交换机器，一点一点的交换，直到有了基础。今天要建立强大的工业，非用农副产品、矿砂等来保证投资不可，样样都用现金就会延迟我们的建设。

要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做大生意。从长远打算，还要与世界各国往来。只要对国家建设有好处，我们都要干。因此，贸易统一，是非常必要的事，这样才不致亏本。如果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都动员起来，就可以做得很好。

现在，我国的经济私人成份占了很大比重，尤其是农业更是如此。因此，必须组织好合作社，减除中间剥削和私商的投机倒

把。有了合作社和贸易公司,可以减少私人资金的周转,支持我们的票子。现在南方的私人资本不仅要和我们对抗,而且时时想整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固然一方面要用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就必须组织合作社,来占领阵地。目前合作社有好有坏,坏的也不可怕,只要它是人民的公家的,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改造。没有一件事一下子就可以搞好的,有了组织,事情就好办了。

合作社与贸易公司之间会有矛盾。有些贸易公司相信私商而不相信合作社。因此,必须组织好合作社,慢慢地使贸易公司能通过合作社进行贸易,共同与不法私商作斗争。

争取多出口,必须发展运输。运输部门和贸易部门之间要签订合同。不要彼此争夺利润。因为都是公家机关,赚的钱都是国家的。贸易公司必须向国家纳税,多费些手续,不要怕麻烦。必须在发展贸易中发展运输事业。过去的运输,都是因为军事需要才发展的,现在首先要保证贸易。中国经济上最大的困难是运输问题,许多地方出产丰富,但是运不出来,必须建设铁路、公路、航运,为财经工作打下基础。

六、银行金融问题

过去我们也有银行机构,但没有很好利用,只是发点票子。银行应做投资业务和监督生产。以前,我们的许多贷款和投资都白花了,等于作了救济金。现在投资,银行必须实行监督。这个办法过去也是懂得的,只是怕麻烦,没有好好做。前一二年,石家庄金融上的一切都通过银行,既可了解情况,控制私人资本,又可监督生产。因此,全国要广泛建立银行网,银行必须负起更大的责任,来掌握资金,监督生产。过去,国营企业的账目常常不清楚,私人资本的情况也不了解。将来,必须做到国家所

有的开支都要经过银行。财委要通过银行来掌握家务，使它成为国家的总会计。银行不只是一个发票子的机关，国家的投资都要成为银行的贷款。因此，银行要普遍地设立，加强干部，开展业务，而且要长期做下去。

将来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银行，银行必须起监督作用，如果发现哪个部门有挪用款项的事，就要进行检查，报告上级。银行发放贷款要有计划，过去发贷款的缺点一是货币贬值，一是贷而不还。今后，所有贷款必须收回。

七、节约非生产性开支

非生产部门应该节省，生产部门的开支要适当增加。今天我们国家对生产事业的投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开支最大的数目在军队方面。目前，财政原则还是先前方后后方，这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国家基本统一了，交通也恢复了，因此各地各机关都必须有预决算，军队里如果执行这个制度，就可以减少许多浪费现象。这件事也可由银行去做，各地各机关的每月决算有多余的钱，必须全部上交国库，下期的经费国家再按新预算发下，二者是不能混淆的。

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有三个月的难关。过去的都要缴公了。预决算制度，必须准备在三月初实行，中央每月要查下面的账。因此，各地各部门必须实实在在去清理，过了这三个月，事情就好办了。

过去我们还有一个毛病，好挪用款项，许多钱都胡花了。以前我们依靠党性，现在还必须加一条要依靠制度。例如每个伙食单位一定要在规定的费用内把伙食搞好，不能挪用其他的款项。每个党政机关都要执行这个决定。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政务院已作出决定^①。这个决定对建立家务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同志还没有信心，但是到了下半年，税收有了，交通恢复了，土匪也肃清了，情况就会好转。所以，大家必须放心大胆地接受任务，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过去有错误，今天可以改正。我们财政上的办法，不是杀鸡取蛋，而是养鸡下蛋。以前我们过的是苦日子，再饿肚子也饿不了几天了。但必须打破享福观念，新民主主义是享不了福的，只有到社会主义，大家的生活才可以提高。如果我们都要求过资本家、地主的生活，就会同样地被赶跑。

最后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检查贪污腐化。国家有检查机关，如果不去检查，不仅大家的生活不可能过好，而且还影响国家建设。在党内，一定要拥护政府的决定，这样才能打破旧的财政制度，建立起新的财政制度，很快地建立我们的家务。斯大林同志曾对毛主席说，中国建设达到苏联现在水平的速度，会比苏联快得多。同志们，我们要有信心，中国有勤劳的人民，物产丰富，又有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帮助，事情一定可以办好，而且会比苏联建设得更快。

向毛泽东并中央转报邮电部党组 关于全国电信会议的综合报告

（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日）

陈 云 薄一波

毛主席并中央：

^① 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该决定于1950年3月3日正式发布。

兹将邮电部党组关于全国电信会议的综合报告转报如下：

为实现统一全国各地电信局之管理领导与制定本年度之生产计划任务，经财委会批准，于1月25日召开全国电信会议，历时共16日。到会者为各区与主要城市之局长、工会主任、重要的工程师及财务负责人。正式代表87名，共产党员占66%强。

(一) 关于统一问题。除业务领导组织工作，在去年六月成立电信总局即已基本统一外，尚需实现以下的几项统一。

第一、组织上。在邮电部电信总局领导下，各区成立电信总局。其组织形式应与各大行政区之划分相适应；并明确规定各级组织之职权关系。

第二、实现总金库制与统一财务调度。一切营收由邮电部电信总局统一掌握调度，凡有人民银行之处，均当存入银行；统一核定工程建设专款，并不准移作他项开支；且拟于本年五月召开财务专业会议，研订开支标准。

第三、统一机材调度，充分合理使用于重点恢复建设工程与必要的日常维护消耗，以减少国库支出；除大宗急要线路器材可先提用外，其余要经定量、定质与定规程入手，使一切库存机材，均能合理作价，转为建设投资；各区所接管之电信仓库，各区只有清理保管权而无动用权。

第四、统一人事调度。适应全国业务要求，统一调度技术人才；按目前与今后业务情形重新调剂人力，克服部分人浮于事现象(全国范围约多余6,000人之多)；除专家与国立大学电信系毕业生可吸收外，均不许自由增添新人。今后吸收新人员仍应限制，应照顾到军队技术通信人员之转业问题(同时调剂各电信局政治质量)与提高工作效能、相对缩小人员定额量。

第五、为实现统一，要克服几种思想障碍。这是由两方面

的历史传统而来——国民党的人事派系传统以及我解放区的山头主义倾向。十余年的战争分割与困难是加深了这一影响的。主要解决的有两个问题：

1. 解决营收富余与接收器材人才较多之局与整体的矛盾。这类局子是统一的财力、物力、人力的物质条件，但又是统一思想的障碍。

2. 正确解决我解放区领导同志中统一思想问题，具体表现在规定各级组织的职权关系(缩小了职权、不舒服、不好办事)、一方面要说服其实现更高的集中性、统一性，又要保持其积极性，成为保证实现统一的中坚作用。

以上两个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尤在全国财政统一决定之后，起了决定的保障作用。

(二) 1950年的生产建设计划。由于1949年大陆先后解放后经济上的困难，且大部线路材料多应先仅铁道重建与抢修；加上区域分割的不统一性，直到现在为止，主要靠无线通信，于保密与确实均不利，似乎已不能适应高度集中统一国家之要求。且由于领导中心在北京的根本转移，华北的线路又在战争中破坏最大，这次建设计划重心放在沟通以北京为中心的有线干线建设，使中央与各区及主要省转到用有线电话与有线电报，使中央能利用电话与各区领导中心用电话开会；与苏联能以可靠的有线电通信。建设北京国际电台与整理北京市[电]话。其次，应估计到空中威胁与海上封锁的解除，为恢复水上航运设置通信；配合军事边防要求赶修若干次要线路。工程经济概算如下：

第一、关内主要干线工程建设(包括：津宁、京汉、京秦、京绥、石太、陇海(包括西兰)、胶济、西蓉、西渝等线)共须立杆3,086公里，设线8,283对公里，整修2,093公里，电话机件除上

海至南京设置 12 路载波机外,其他各电路均用 3 路载波机 (以下都是 3 路载波)。关内主要工程建设概算为 84,625,000 斤小米。

第二、关外电话线路:(包括沈哈、哈—满—赤塔,哈—绥—海参崴等线)共须立杆换杆 969 公里,设线 3,424 对公里,整修 1,023 公里。关外主要工程建设预算为 42,157,000 斤小米。

第三、关内各区次要长途线路工程:(包括:京承、同蒲、陇海、沿海、沿江、汉西、沪杭、浙赣、兰溪—温州、建榕、西蓉、杭宁、张博等线)共须立杆换杆 2,766 公里,设线 4,471 对公里,整修 279 公里。次要工程修建预算为 50,000,000 斤小米。

第四、建立首都的国际无线电台:与邻近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直接的电信联系,并争取于今年内完成北京、上海、莫斯科间的无线电传真设备。预算为 46,000,000 斤小米。

第五、今年上半年内恢复与加强江岸海岸电台,解决沿海及内河航运的通信联络问题。预算为 9,600,000 斤小米。

第六、整理与加强首都的市内电话设备,预算为 16,000,000 斤小米。

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各大行政区内的主要线路。

以上各项总计总预算为 248,382,000 斤小米。此外为了保证工作,必需储备一年的经常消耗器材,预计为 92,353,860 斤小米。即是今年总的投资数应为 340,735,860 斤小米。

根据去年各地解放后不完全的营业统计资料加以预计,大概今年国内电信营收为: 611,986,481 斤小米。国际电信营收为: 158,448,486 斤小米。加上营业外收入: 6,163,478 斤小米。则总收入将为: 776,598,445 斤小米。全国开支机线维护费,业务管理费,薪资等总数为: 594,335,128 斤小米。收支

相抵全年可盈余(折旧不在内)182,263,317 斤 小米。因此要完成今年恢复建设工作,将营收都投进去尚不足: 158,472,543 斤小米。按政府能投资160,600,000斤小米,当可完成此建设任务。

实现上述计划任务,除依靠政府增加投资、与由营收毛利转入投资外,要以华北为重建重心,东北应加强干线;要以统一调度库存线料与保证营收之统一调度为仅先完成干线建设之重要条件。

陈 云 薄一波

四月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失业救济问题 的总结及指示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省委、市委及区党委:

(一) 自 1950 年 4 月间中央发出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后,全国各地已开始注意这个工作,并作出了一些成绩。截至九月底止,根据各地不完整的统计,全国失业工人共有1,220,231人,失业知识分子188,261人,共计1,408,492人。此外,尚有半失业者255,769人,将失业者120,472人。已采用各种救济办法给予救济的,计有:以工代赈78,955人,生产自救74,798人,还乡生产者62,922人,发放救济金405,775人,转业训练23,157人,介绍就业81,458人,共计726,635人,即有半数以上的失业工人,已经得到救济。在救济金方面,由各地工人捐助者,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共有28,700,009,200余万元,业已分别

拨交各大城市总工会,作为紧急救济失业工人之用。由中央拨给各地的救济粮,已有200,003,700多万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尚未用完。

(二) 实施救济以后,初步解决了失业工人生活上暂时的困难,逐渐消除了失业工人的不满,使他们转而相信人民政府,认识到“今天人民政府真正爱护工人”(上海),“只有人民政府才能办这样的好事,过去反动派只顾自己贪污、享受,哪里会管工人死活”(重庆)。同时在紧急救济募捐运动当中及以后救济工作当中,一般地发挥了工人阶级友爱互助的精神,消除了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之间的对立现象,工会的威信也就随着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收获。同时也就证明了救济失业工人工作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把它做好。不注意或不重视这个工作(如长沙),必然会引起工人不满,甚至为匪特利用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失。

(三) 各地在救济失业工人工作中取得了不少经验,值得今后注意推广的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登记和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必须依靠工会组织去做,这样才容易把失业工人组织在工会的周围(如上海)易于进行各种救济与教育的工作,如不依靠工会组织,而依靠公安局派出所去进行此项工作时,容易使逃亡地主、无业流氓等钻空子,使真正失业工人,反得不到应有的救济。

第二、救济失业工人工作,应配备少数得力干部,掌握领导,其余各种工作,均应尽量使用失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去做。因失业工人了解情况,较易做到公平合理,取得群众的信任,使救济工作能比较顺利进行。同时应召开各工厂企业的及全市的失业工人代表会议,邀请在业工人参加,尽可能用民主方法,解决各种问题,是团结和教育失业工人的最好方法之一。此外如

武汉发动在业工人组织慰问团,慰问以工代赈的失业工人,对于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团结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方面起了相当作用。

第三、在开始举办失业救济工作时,要登记与救济同时进行,即一面登记,一面就施行紧急救济,才能打破失业工人怀疑观望心理与匪特造谣破坏。登记的手续要简便,登记后即应按照自愿参加的救济种类,分别编组,迅速处理。拖延处理,便会使失业工人发生不满。

第四、救济失业工人要与加强失业工人的政治教育,提高失业工人的觉悟及组织性相结合(开办各种学习班和讲演会等),要使失业工人了解现在的救济与过去的慈善事业不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团结互助,是人民政府保护劳动者的政策。这样通过失业救济来密切工人群众与人民政府的关系,提高对工会的信仰,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

(四)在各地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中,也发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个别城市,在救济工作的领导上不够重视,组织不够健全,缺少具体计划,采取突击工作方式,不登记,不组织,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有粮乱发,使不应救济的得到了救济,而真正失业工人反得不到应有的救济,结果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第二、关于救济金的使用,掌握不严,造成浪费,如天津没有研究实际情况,花了六千万元搭了几座席棚,作为失业工人临时居住之用,因靠近臭水沟蚊子又多,结果无人去住,反须派人看管。有的把修造房的材料费用也在以工代赈的救济费内开支,有的为了以工代赈,作了一些没有必要的工程。更有个别城市把救济粮放在仓库里发不出去,以至发生腐烂,这些都是不应有的浪费。

第三、以工代赈有些地方订得太高,不实行计件工资办法,不分工作的轻重及劳动强度的大小,一律平均按日发给工资,形成“干不干、六斤半”的磨洋工现象。

第四、遣送失业工人还乡生产,大都未与还乡地区政府取得联系,致使失业工人还乡后生活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去而复返,甚至携带更多的人回返城市。

第五、有些地方举办生产自救,不是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搞生产,而是个别的发给不同数量的救济金,结果不是搞生产而摆摊贩,或吃光了又要要救济金。有的虽然组织起来,但不加以领导与检查,而在产销方面没有很好的考虑当地工商业的具体情况,盲目生产,以致垮台的多,成功的少。

第六、有些城市为了争取多领救济粮,将失业工人的数字以少报多,所作的各种救济计划也不切合实际,这就使中央在审核预算及掌握失业工人情况上发生困难。

上述这些缺点和偏差,都使救济工作遭受了不少损失,今后应注意改正,避免重复这些错误。

(五) 今后注意的问题:

第一,国家经济情况未基本好转之前,救济失业工人是个较长期的工作,这个工作的好坏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因此,各地党委必须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总结经验。并须于十二月底以前,作一次详细的讨论,定出明年的救济工作计划与预算,报告中央,以便中央定出全盘计划和预算。

第二,救济范围原定以解放后失业者为限,使一些解放以前失业的工人,因得不到救济而发生不满。现在决定改变这一点,即现在所有失业的工人职员,及失业知识分子,除特务分子及反动有据者外,不问从什么时候起失业,均一律予以救济。

第三,除应普遍加强对失业工人的政治教育外,应注意对

失业工人的转业训练，根据各地区生产建设部门不同的需要，分别予以不同的技术训练，使无技术的得到技术，已有技术的提高一步，以便把每个失业工人分别陆续输送到各地需要工人的工厂企业中去。同时，在对失业工人的教育上，要注意打破熟土难离的地域观念，以及仍搞原来工作的保守思想。

第四，加强劳动介绍所的组织和工作，逐步做到国营私营企业招雇职工时，应尽先在失业工人中统一选用，并经过职业介绍所统一介绍。

第五，要按照政务院发布的指示，切实向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及在业工人征收失业救济金，纠正过去有些城市在这个问题上的放任态度及专门依靠中央拨发救济粮的错误想法。

各地接到本指示后，应即提到党委会作切实的讨论，并将讨论情形和意见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一九五一年 总收支预算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和军区党委：

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经过全国财政会议的商榷，各大行政区财委的同意，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座谈，业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并得到批准。

这个财政收支总概算，标志了一九五一年全国工作的总方针及其重点所在，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

志要为保证这个总概算的实施而加倍努力。

制订这个财政收支总概算是根据于这样情况,即:一、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的胜利,证明美帝侵略军不可能进攻大陆,但在朝鲜,它那无甚补充希望的兵力,如不再受严重的打击和损伤,也不会轻易撤出。解放台湾,需要准备严重的战斗。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和轰炸,帝国主义间有着严重的分歧意见,即在美国也顾虑苏联是中国后盾。二、因此,设想中的一九五一年中国情况是:没有大战,援朝战争继续,敌机轰炸沿海城市仍有可能,但我们防空力量在增长中;解放西藏,初步准备解放台湾,并准备应付台匪可能的登陆;大陆土匪肃清,土改在新区一万万三千万人口中完成,农业增产,工业重点建设,海上部分封锁,但这将促进国内市场发展;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形成反帝新高潮,将进一步肃清美帝在中国的经济、文化侵略影响,并巩固地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三、这样,在收入方面,今年农业税收,依率计征既已超过原估计数,而各地收成又好,故提高农业税附加比率至百分之三十,一般是可能的;一般税收在轰炸不大情况下,可较今年略增,但应一方面承认剪刀差的存在,另一方面准备某些税收可能的减少;国营企业收入准备从贸易上努力争取超过今年收入;清理仓库和结余,必须严格执行。在支出方面,国防经费不仅居第一位,而且大大超过我们预计;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行政业务,一方面需要继续供给制和低薪制,另一方面要求尽可能不扩大非十分急要的业务。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确定一九五一年概算的总方针是:既要顾到国防开支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如此,方能使前方胜利与后方巩固得以结合起来,稳步前进。本此要求,收入概算,乃主要依靠于税收,国营企业收入和清理仓

库结余,而不依靠于赤字贷款。预算赤字较一九五〇年为少,列入公债,发行与否将视银行透支情况需否货币回笼而定,支出概算,国防经费加预备费已超过总数百分之五十,而经济文化建设及行政业务经费合共只占百分之四十二,已不可能再少。但必须注意:国防经费中人数是以少于五百万人计算,国防建设,兵工生产及作战费合共只一百三十亿斤预算。为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继续稳定,一九五一年度各项收支只能照此谨慎规定,方不致落空,亦不致影响物价波动过大。且国防力量的加强虽为迫切需要,但必须估计到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力量,决不能一跃而成,而只能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加速我们国防建设。因之,量入为出,成为制订一九五一年财政收支总概算的主要原则。

为保证这个总概算的实施,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及军队党委切实执行下列各项规定:

一、各项收入,各地必须负责完成,并求依率计征,能超过原来预定的数目。如沿海不受轰炸,则一般税收及国营企业收入更有增加可能。

二、清理仓库和结余,各地必须保证做到。一九五〇年的决算不论军队地方,应无例外地结转到一九五一年。若各地有需要,应另提预算计划,不得自由调用结余。仓库不分政府军队,均应进行清理,限期完成。

三、各地扩大人数,不论动员新兵、民伕、地方武装或组织新的部队,不论增加中央或地方编制,均须取得中央或军委批准后方得实行。如未经批准,即行动员增加,其开支不得报销。

四、一切有关国防建设事业(如机场、公路、港口、炮台、仓库、油库、营房、射击场、医院、学校、防空设备等),均须遵照军委规定的计划和命令执行,并须定出工务计划和财务计划送有关

上级审核：各地不得未经军委许可或因各特种兵下级司令部的请求径行建造；如违，其开支不得报销。

五、作战费由军委规定范围并授权前线司令部或军区司令部负责开支报销；超出范围者须得军委批准。

六、一切经济文化建设及各种行政事业费，均须按预算行事，超出者须事先批准，违犯者不得报销。

七、一九五一年的任务重大，预算经费有限，务望各级党委及军队党委严守财政纪律，注意节约，力戒浪费。

八、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及其附件，将由中财委密送各中央局、分局，你们收到这些文件后，根据本指示原则，望在适当会议上进行口头传达并下达。

执行情况望报。

中 央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 一九五一年银行工作 方针与计划的决定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并各大区及华北五省二市财委：

中央同意中财委关于1951年银行工作方针与计划的决定，现特转发你们，望加研究，并照此领导和检查各地的银行工作。

中 央

二月三日

1951 年工作方针是：“稳定金融市场，开展货币管理工作”。在此总方针下，实行如下工作。

(一) 逐步推行全面货币管理，使银行成为国家总的帐务会计机关，为国家管钱、管帐、管用。这是国家企业管理制度和信贷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制实现计划经济不可缺少的环节。但应有计划地由上而下，由点到面逐步推行。中央一级先取消贸易、财政、交通、工业等部门间的商业信用，由各级银行共同执行对各部直属企业机构的结算工作。地方亦先从贸易、财政、工业等部门开始。凡资金固定、会计独立、生产经营有计划的企业，均应订立合同，由银行集中信贷，办理结算。对机关部队、团体来往户及未取消商业信用的企业及合作社，继续加强现金管理，编制收支计划，推行划拨清算。对机关团体领用经费单位结合财政金库支拨，加强管理。掌握收支计划为全面货币管理的中心环节，各级财委应抓紧审查与督促。

各野战军建立随军银行，统一管理部队的现金，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责成交通银行办理拨付并予监督。对国家企业机关实行强制保险。在取消商业信用，银行信贷扩大后，公营利率，原则上应逐渐降低，利差酌予缩小。

(二) 普遍开展私人业务，大量集中私人资金，对职工、农民、个人普遍开展储蓄。农村赊购及以货易货由银行举办单一折实储蓄，以便利贸易收购并开展银行在农村中的信用。全年争取储蓄户由现在 100 万户增至 1,000 万户。对私营企业广泛建立联系，组织指导其资金运用，有条件地予以必要的扶助。国家银行对私人利率采取存放两高(接近市场利率)原则，利差应再缩小，全年争取由现在 10 万户增加到与 30 万工商户发生联系。加强对公私合营银行的领导，建立联合的管理机构，并准备必要时接受其他银行参加。

对私人金融业继续贯彻领导、运用、改造的方针。目前因美帝冻结资金,及我对外贸易路线转变,行庄业务减少,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原来亏空很大,又不精简节约、不整顿内部者,很可能倒闭,我须预先指出方向,鼓励劳资协商自力更生。对既不扶助工商业,只是坐吃山空的私营行庄,一般地不予贷金支持。

(三) 大力扶助城乡内外交流。有重点的扶助农、工、矿、交通事业。集中银行资金,大部支持国营贸易和财政周转;加强国际清算工作,协助对外贸易路线及方式的转变,集中外汇和国际贸易的清算;增加地方放款至 35,000 万万元,以扶助供销合作;发放农林、水利贷款,扶助私商经营土产;增设特产区及县、大集镇机构,推进货币下乡,提倡私人信贷自由;设置农业合作银行,以扶助农业生产及合作事业;禁止银元流通,老区完全肃清,新区适当收兑;少数民族地区暂准流通逐渐减少;肃清华南外币,禁止人民币出入国境。

(四) 1951 年业务计划:公营存款 395,000 万万元,私营存款 66,000 万万元,(内工商业 17,000 万万元,储蓄 39,000 万万元,金融业 10,000 万万元),保险收入 12,000 万万元,带动私人长期投资生产建设 2,000 万万元,共计集中资金在 470,000 万万元以上。国营贸易放款 220,000 万万元,财政借款 60,000 万万元,外汇用款 20,000 万万元,农贷 11,000 万万元,合作 5,000 万万元,水利 3,000 万万元,地方工商业放款 15,000 万万元。根据存款情况,随时增加各种放款,预计年底资金运用总额将达 400,000 万万元。

全年损益计算除解决银行本身开支外,并上缴财政任务 6,300 万万元,自给印制费 4,000 万万元,共盈余 10,000 万万元。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稳定 沈阳物价通报的批语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区、市党委及各该级财委:

兹将东北局 9 月 11 日关于稳定沈阳物价的通报转发如下。请参阅。东北物价发生波动后,中央即指令中央贸易部尽力协助平抑,中央贸易部即决定,除关内与东北进行正常交易外,再从关内运东北价值 10,000 亿元的物资以回笼货币,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中财委应督促中央贸易部实现上列计划。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物价波动基本上并不是由于我物资储备不足,而是由于:

(一) 私商发展比国营发展更快,私人商业利润高于工业利润,加之,国营的零售店不够,通过合作社扩大零售也不够,因此发生漏洞。

(二) 军事定货难于做计划,对军事汇款缺乏掌握和控制,也是使市场发生紊乱的原因之一。

(三) 当然发行稍多也是一个原因。东北局对稳定物价已作出决定,估计波动很快会平息下去。现时令已入旺季,各地是否会发生同样情形,请各级党委密切注意并经常掌握市场情况为要。

中 央
九月二十三日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张 辑 哲

1949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和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年时间的艰苦奋斗,使我国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并使其在恢复的同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此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事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通常将这一时期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一、建国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

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是在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上进行的。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压榨,又加之长期的战争破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统治,致使本来就很落后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1949年时,仅占全国经济总量10%左右的工业总产值比历史最好年份减少50%。其中重工业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煤炭产量由6,188万吨减至3,243万吨,下降47.6%;钢产量由92万吨减至15万吨,下降83.7%;农业和手工业也大大萎缩。1949年的粮食产量比起历史最好年份下降24.5%,由15,000万吨降至11,320万吨;棉花下降47.6%,由84.9万吨降至44.5万吨。而1949年又遭受严重水灾,农田受灾面积达1.2亿亩,灾民约4000余万,其中重灾区农田面积2800万亩,约有700万重灾民急待救济。在工农业严重受损的

同时,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交通运输也受到严重破坏,铁路有上万公里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遭到严重破坏。津浦、京汉、粤汉、陇海等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到1949年底仍有原线路总长的五分之一不能使用。海运方面,华北的海轮全部被国民党劫走,上海留下的可供行驶的船只仅有14.5万吨。空运的人员、设备等被劫往香港。全国货物运输总量只有229.6亿吨公里,仅及战前最高水平的42.7%。

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凋敝衰败,在流通领域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更为惊人。由于物资长期匮乏、战乱不已,致使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黑市猖獗、投机盛行。自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间,国民党政府通货发行量(换算成“法币”)增长了1400多亿倍,同期的物价上涨了8500多亿倍。社会上出现了大批追逐暴利的投机商人和专门从事投机活动的银行钱庄。上海的这类投机者多达20至30万人,平津两市200家行庄中,有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许多工商业家也拿出大量的资本和精力进行囤积居奇,贪图暴利。从而使整个市场动荡不安。仅在1949年的1月、4月、7月、11月全国就先后刮起了四次涨价风潮,物价水平扶摇直上。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则达5376。这样的物价飞涨,极大地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城市中有大约400万失业者和难以数计的半失业者。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在这样虚弱的经济条件下,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依然要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开支,国家财政十分困难。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我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使刚刚有所减少的军费开支又猛增至整个财政支出的二分之一。加之帝

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国内残余的反动势力仍很猖獗,不断在经济领域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这就更加加重了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困难程度。因此,当时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国内资产阶级,大都认为中国的财政经济困难是无法克服的,认为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经济上却不行,无力扭转如此险恶混乱的经济局面。中国共产党和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是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领导全国人民,毅然担负起了医治创伤、重建家园、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重任。

二、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和重要措施

建国初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实际上担负着双重任务:既要使遭受破坏、极度衰弱的国民经济恢复元气,又要在经济领域进行变革,建立新型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夺取政权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确立了党在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要点可概括为:①没收官僚资本;②进行土地改革;③保护、利用民族工商业并加以引导和必要的限制;④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⑤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所缔结的一切卖国条约;⑥改革海关、统一外贸;⑦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国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正是在这些方针政策指导下进行的,并在实践中有了新的发展,制定了新的策略,采用了许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总起来看,三年恢复时期,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对恢复国民经济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工作:

(一)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旧中国,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资本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的三分之二,

在工业、交通的固定资产总额中占 80 %，控制了全国钢铁产量的 90 %、煤的 33 %、电力的 67 %、水泥的 45 %、石油和有色金属的 100 %，形成了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地位。它们对外与帝国主义势力狼狈为奸，对内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损害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将其没收归国家所有，就将从总体上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基本铲除经济生活中的腐败势力，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是随解放战争的胜利逐步进行的。早在 1946 年哈尔滨解放时，就开始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三大战役后，基本接管了长江以北的官僚资本企业。到 1950 年初，全国除台湾省外的官僚资本企业均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合计共有工矿企业 2,858 个，金融企业 2,400 多家。在 1949 年全国大型工业产值中，国营企业所占比重已达 40 %。占煤产量的 68 %，电力的 58 %，生铁的 92 %，钢的 97 %。全部控制了全国的铁路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这就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和交通业，准备了较雄厚的物质力量。

（二）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和多余的房屋、粮食等，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消灭封建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建国以前，在老解放区已有 1.2 亿农业人口（约占全国农业人口的 26.7 %）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1949 年冬至 1950 年春在华北的城市郊区及河南部分地区进行了土改。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改运动开始在全国全面铺开。华东、中南约 1 亿农业人口 300 多个县在 1950 年秋进行。其余（主要是西南、中南）1.6 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分别于 1951、1952 年完成土改。只有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有计划地向后推迟。至 1952 年下半年，全国范围的土改运动基本结束。全国约有 3 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共分得 4600 多万公顷的土地。完成土改的

农业人口约占全国农业人口的 96 % 以上。土地改革的完成,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 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在市场上与投机势力作斗争, 稳定市场, 稳定物价。建国前后混乱动荡的市场和金融业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不解决它, 整个经济就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早在 1948 年 11 月, 就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12 月 1 日开始发行人民币(旧币)作为关内统一货币。1949 年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禁止金、银、外币流通, 并组织动员群众, 打击投机资本, 取缔专事投机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 惩办首恶分子。同时对市场进行整顿, 实行工商登记, 管理市场价格和大宗物资的交易。在 1949 年 11 月物价上涨的浪潮中, 中财委组织起国营贸易机构和银行, 经过周密部署, 发动了一场紧缩通货、稳定物价的总体战, 获得了成功, 在市场上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权。

1950 年 10 月以后, 因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影响, 社会上又出现了抢购风潮, 对市场和物价的稳定构成很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首先下令冻结机关、部队、团体等“小公家”的银行存款, 对抢购风潮实行釜底抽薪。接着又决定对最抢手的棉纱、棉布实行统购, 并调动一切力量, 沟通城乡贸易, 打击投机活动, 保证城乡人民的供应。这不仅避免了市场动乱, 而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繁荣。市场、物价的渐趋稳定, 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 统一财经工作, 平衡国家财政收支, 从根本上稳定金融物价。1950 年 3 月 3 日, 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开始对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财经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①统一财政收入。②统一财政支出。

③统一贸易和物资调用。④统一现金管理。这些统一的措施实行后，很快扭转了国家财政困难和市场混乱的局面。1950年3月市场物价即开始下降，5月比3月就下降了30%，6月以后趋于稳定。1951年就实现了财政平衡并略有节余。统一财经是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所采取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五）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稳定经济。全国统一财经工作后，市场上虚假购买力消失，物价稳中有降，商品出现滞销，私营工业生产锐减。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困难重重。许多资本家开始消极经营，甚至解雇职工、关门歇业。1950年四五月间，在14个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关门，在16个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针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调整，以帮助其渡过难关，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调整工作从1950年5月开始，主要围绕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进行。在公私关系方面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与价格，对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并连续两次降低利率，合理调整税收以减轻私营工商业的税务负担。在劳资关系方面确立“劳资两利”的原则，协商解决劳资矛盾。在产销关系方面力求产销平衡，以销定产，并召开各种专业会议商定产销计划，合理分配生产任务。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不仅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渡过了难关，而且还有了一定的发展。1952年与1949年相比，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产值大约增长了54%，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大约增长了20%。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六）抓紧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环节，量力而行地进行基本建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确立了把恢复和发展生产

作为中心工作的指导方针。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中，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了这一方针，狠抓了各行各业生产的恢复和建设，尤其突出了水利和铁路交通这两个重点。三年中国家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共约 7 亿元，占预算内基建投资的 10 % 以上。参加水利建设的总人数达 2,000 万人，完成土方 17 亿以上，相当于巴拿马运河的 10 倍或苏伊士运河的 23 倍。全国总计 4.2 万公里的堤防，绝大部分得到了整修，并对水灾较严重的河流进行了全面的治理。三年中用于交通运输的经费共 17.7 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 26.7 %。1950 年初即基本修复了全国的铁路网，下半年则开始了新线路的修建。主要完成了来 陆 线(广西来宾到 陆南关，403 公里)、成渝线(四川成都到重庆，505 公里)、天兰线(甘肃天水到兰州，355 公里)三条线路。新建公路三年共达 3,846 公里。除水利和交通外，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旨在恢复生产、增强经济实力的工作。三年中全国基建总投资达 66.27 亿元，占整个财政收入的 17.3 %。其中用于重工业的投资达 21.6 亿元，除主要用于恢复和改造原有企业外，新建企业约 3,300 多个，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除以上六项大的工作外，党和人民政府还在其他方面进行许多大大小小的工作，力图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重建家园。如在外贸战线，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发展新型的对外贸易，并在国内针锋相对地清除或管制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和财产；在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界开展“五反”运动；等等。这些都对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三年恢复时期的成就是巨大的。到 1952 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都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2 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77.5 %,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145 %,农业总产值增长 48.5 %,工农业各主要产品产量也大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国家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并略有结余。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70 %左右,农民收入增长了 30 %以上。

国营经济力量大大增强。国营工业企业的资产总值由 1949 年的 68.9 亿元增长到 108.4 亿元。1952 年时国营工业企业已达 9,500 多个,职工 510 多万人。国营工业产值三年增长 287 %,平均每年递增 57 %。国营商业在 1952 年底已有职工 57.7 万人,商店已发展到 3 万多个,比 1950 年增加 3 倍。1952 年比 1950 年的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 284.6 %,在商品批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由 1950 年的 23.2 %增至 60.5 %。基本控制了市场。国家银行到 1952 年已掌握了全国 99 % 的银行存放款,完全控制了金融业。1952 年国营企业上缴税利已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 58.1 %。国营经济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地位。

在国营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其他各种经济成份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适当调整,并产生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逐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文教、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也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三年恢复时期巨大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调整，采用了许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从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这个历史的经验对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 “三大战役”

周 太 和

编者按：建国初期，陈云同志主管我国的财经工作，本文作者曾任他的秘书。这篇文章是作者根据当时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所见所闻撰写而成的，比较具体地反映了1949年至1956年我国经济战线上“三大战役”的历史进程。

陈云同志从1949年至1956年写的文稿和讲话稿，已经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1949年至1956年，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经济崩溃的一片废墟上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变革时期。认真学习和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对今天进行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现在介绍一些当时政治和经济的背景材料，提供给研究者参考。《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后记中提到，当时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除了没收和改造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以外，在经济上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即（一）统一财政金融，稳定物价；（二）实行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战役”，对于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初期的经济基础，起了重要作用。第一战役结束，毛泽东主席即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下面

就这“三大战役”的过程、解决的问题和它的现实意义作些说明。

一、统一财政金融，稳定物价

1949年1月底北京解放后，党中央即移驻北京市，准备全国解放和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4月下旬中央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过长江，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宣布蒋家王朝的覆灭，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中外一些反对派人士评论：“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究竟如何统一治理几亿人口的大国，恢复和整顿经济，是一个大的问题。3月初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进城后的经济工作方针。会后决定陈云同志主管中央财经工作，并决定统一全国的财政和金融。陈云同志从东北进关，当时财政经济十分混乱，面临严重的困难。有人问陈，“进关以后怎么办”？他说：“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怎么办？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他当时考虑的是“军队向前进”，要支援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正如陈云同志在《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一文中所说的：“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而根本的解决财政经济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当时摆在财政经济工作面前的任务，一是支援战争，二是解决新解放区内城市人民生活和生产问题。究竟怎么办？能不能搬用过去的经验或引用外国的经验？陈云同志肯定地认为不能照搬照套。他过去管理过财经工作，从1944年在延安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时就开始组织和领导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在上改完成后又主持一段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他认为过去两个时期的财经工作，在抗战时期是以农村为主，在根据地分割

状态中搞财经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东北是以中等城市（如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领导广大农村的战时财经工作。与全国解放后以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为中心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大不一样了。对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既不熟悉，也不能套用。所以陈云同志到了北京以后立即去上海，到上海研究、整顿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方案。

7月，正在人民解放军向华南和西南、西北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军，敌机还在铁路沿线轰炸的时候，他到了上海，主持统一财经工作会议。一方面了解国民党留下的支离破碎的乱摊子的情况，一方面研究支援大军，稳定市场，安定民心的方案。在上海蹲了两个月，工作很有成效。现在介绍以下几件大事：

1. 统一财政金融

关于上海财经会议

为什么到上海去研究统一财经工作？为什么去上海开会？这是因为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是旧中国外国资本及官僚资本的基地，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基地，上海经济稳定下来，可以稳定全国经济。加上上海领导干部了解全国的情况多，有全局观点，上海支援全国，全国各省支援上海，则全国经济就可以统一，就可以稳定下来。

陈云同志于1949年7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北五个地区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财经工作会议。主要是调查了解上海和各地财经情况，研究恢复经济和整顿全国财经工作的意见。

从当时的上海看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恶性膨胀，使物价飞涨。从1937年到1948年发行金圆券为止，11年间物价上涨了几十万倍几百万倍。金圆券发行不到一年，几乎成了废纸。国民经济遭受

极大的破坏，生产萎缩或停顿，城乡交通阻塞，人民生活岌岌可危。由于几百万大军前进，都是在新解放区，后勤保障也是严重的负担，加上接收的旧人员有几百万人要包下来，包袱很重。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在财政经济上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还要看到有利条件。那就是全国即将解放，除少数边远省区和台湾外，全国即将统一。老解放区从各方面支援和帮助新解放区，加上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政策的贯彻执行。当时的主要任务，一是支援大军前进，迅速解放全中国；二是安定民心，使广大人民感到“天下定了”，共产党政府稳了；三是恢复破坏了的经济。为此，必须做到财政统一，金融和物价稳定，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2年恶性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危局转变过来。

当时已经解放的老解放区虽已连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统一以外，财经管理工作完全处于分散状态，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解放区之间只能做到少数军用品和少数物资可以进行调拨，这是远远不能适应支持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的要求的。所以在上海会议上着重地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统一财政收支；二是统一金融管理；三是统一重要物资的调拨。这三件事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有的问题请示中央后即开始实行，有一些事还需要做许多协商说服和组织准备工作。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因此实施有先有后，实施的程度也有不同。

关于统一货币

统一财政，首先要统一支出，在支出上加以集中控制。统一支出，要以统一货币为前提。当时，除东北外，决定以人民币作为全国的通货。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财政支出大大增加。靠老解放区的

物资支援毕竟有限。新解放区仅有一部分开始征收公粮。而且铁路交通尚未修复,城乡交流也未打通,城市税收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入远远赶不上支出需要。支援战争,保证一千几百万人员和军政费用开支,就不能不主要靠发票子。因此,统一财政支出,就必须统一货币,统一货币发行,统一建立金库。对于东北,由于解放较早,又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为了给它创造一个稳定的条件,尽快恢复生产,更好地支援全国,所以东北仍保持原有货币。关内各地区则实行货币统一。用人民币为国家通货。由于主要靠发票子保证支出,当时货币印刷、发行是一件很繁重紧张的工作。而重要的是货币发行多少和物价波动的情况。当时,陈云同志几乎每天计算和掌握人民币的发行量并观察市场物价的反映。

各个解放区从多年各有货币、各管收支到统一货币、统一支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为了使这一工作顺利进行,陈云同志当时的作法是,先给各地区一部分人民币,作为周转金,保证各地支出的需要,然后才统一货币。这种周到的安排,使货币统一工作平稳地走过来了。

在新解放区,由于多年来人民遭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痛苦,所以一开始对人民币缺乏信任,人民币刚刚发出去,很快就回笼了。在新解放区农村,大多还实行以物易物或流通银元。当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指定人民币为国家唯一通行的货币,到处可用。控制发行数量,稳定物价,以粮、布作后盾,提高人民币的信誉,打击投机,使人民币逐步占领城乡市场。同时采取一些辅助和过渡的办法,稳定人民币的信用。在发行公债时,并采取了折实公债和发放工资采用工资分(工资与主要生活品物价指数挂钩)的办法,以稳定人民生活。

关于统一财政收支

上海会议提出统一财政,只是做到统一支出,并未规定统一收入的办法。因此财政收入当时还未集中统一。1949年底,陈云同志明确地提出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等主要经济手段的基本统一。过去公粮、税收均在省市县地方手里,收入多少、早迟,中央无法掌握,如果遇到金融物价风潮,手中无实力,危险很大。因此决定,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收入、税收中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即国民党时代的关盐统三税)及仓库物资的全部、^本国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付命令不能动支。同时规定了军政机关、学校、团体的编制、供给标准,全国贸易机构的资金,物资的运用调拨等集中于中央贸易部。一切军政机关、学校、团体和^本国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的部分以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对现金调度、贸易管理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

在统一财政收入时,向各地讲清楚了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者的责任要服从全局,当然也要保证地方的开支。有些收入采取分成或实行按比例提成的办法,预防和克服地方的局部观念、消极和抵触情绪。由于各地领导同志能以大局为重,积极支持,勇于负责,财权按规定上交,所以共同渡过了难关。

关于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

在上海会议期间,在一次少数领导人的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目前财政困难很大,但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上海是个好地方,但暂时是个包袱,进来的东西多,出去的东西少。当时运进的是“两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而上海因为生产没有恢复,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怎样稳住上海呢?陈云同志认为,“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在稳住上海、占领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的工作安排中,开始实行了全国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做到互通有无。

由于全国财政、金融、物资调拨的统一，中财委即可对各项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统一计划和管理。比如税种、税目、税率，国营工业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外汇使用；内地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路、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陆续作出了统一规定。之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支出相对减少，而且国家收入都集中到中央金库。整顿财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

2. 稳定物价的斗争

开国前后与私营工商业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斗争，几经反复，斗争激烈，才稳定下来。这场斗争，是关系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城市上亿人民的生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谁胜谁负的斗争。经过四波三稳四次较大的斗争，稳定物价才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1949年5月北京市场上的银元斗争。北京刚解放不久，当时财政收入很少，物资不足，主要靠货币发行。人民币开始发行（发行量按每人30斤小米计算），黄金、美钞、银元一齐出笼，不法私商手持银元，叮叮咣咣，自由买卖，扰乱市场。在北京特别是王府井、大栅栏一带，他们摆摊设站，招摇撞骗。宣传禁令不起作用，不法资本家化整为零，分散买卖。因此，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办法予以取缔，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不许流通。用行政命令作了第一次打击。

第二次，1949年7—10月的物价风潮。几个主要大城市物价猛涨，7月底到10月中旬，物价上涨一倍半，除上海、天津等因粮食、棉花影响外，根本原因是人民币发行大量增加，3个月增发5倍。其中有一部分是流通领域扩大，如工商业恢复、人民币下乡等。拿上海来讲，解放两个月，物价不但没有控制住，反而

一月、一周成倍的增长。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收支赤字大,货币发行量多,一方面是市场需要的物资调度不及时。当时为了制止物价涨风,发放工资按折实单位计算,每人每月相当一袋面粉,以保证工人的最低生活。陈云同志到上海后,认为能不能抑制上海物价的涨风,主要是靠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资本家手中的重要物资,除黄金、白银外,也是粮食和纱布。所以1949年底1950年初要打好粮食和纱布这两仗,这是稳定物价的关键。

当时在上海(天津也有类似情况),资本家看到粮食紧张,于是囤积居奇。据估计,当时上海存粮不到1亿斤,要保证在冬季以前存粮达到4亿斤,需要多方设法,一方面组织江苏、浙江、安徽运粮接济上海,一方面从东北、华中、四川赶运大米到上海。除此,为了对付上海的投机商,还安排在杭州、南京间(嘉兴至常州一带)集积6亿斤至8亿斤大米作为后备力量。实际上是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这样,我们就可以和粮食投机商争夺粮食阵地,掌握住粮价。上海刚解放时,我们手里只有两千万斤粮食,到1950年上半年,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最高达17亿斤,够一年半的周转。

这里还要提到的,当时从四川运粮到上海,运价等于粮价或者超过粮价。为了稳住上海的粮价,运费由国家负担,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是不可想象的事。

这种在粮食战线斗争中的周密调查、详尽的计算和安排,以及设三道防线的布置,在同一个时间抛售,打垮了大投机商,是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稳妥可靠的保证。

第三次,1950年春节前后,上海资本家估计我们掌握的纱

布不多,从而囤积了大量纱布,要同我们进行最后的较量。陈云同志在做了双方力量分析以后,作了紧急安排。隐蔽地从几个城市调进了相当数量的纱布。另外,他精确地计算了货币投放数量和物价上涨的指数,预测纱布可能上涨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以稳住。为了让资本家把纱布吐出来,先放后收。当物价涨到一定程度,估计资本家的钱抛出的已差不多了,他们手中只有物资没有什么钱了,于是我们就采取以下办法:一是收税,二是收公债,三是要他们发工人工资而不准关厂;四是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而且还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3%,陈云同志说,不这样,就天下大乱。这样资本家吃不住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吐出大量纱布。这时,我们再把纱布的价格压低下来,一直使物价水平跌到原来价格的一半以下,我们再把价格稳住。这一仗把资本家制服了。原来资本家嘲笑我们,说“共产党军事是一百分,政治是八十分,经济是零分。”经过这一次较量,他们不得不服输了。某大资本家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群众则大为赞赏,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信誉。

第四次,1950年5月,继续稳定物价。经过三四月份物价平稳之后,多数人对物价平稳还不相信,因为经过12年通货膨胀之后,也决不能希望几个月内人心即可转变。于是,陈云同志又作了进一步安排,继续保持稳定物价。所采取的办法是:(1)掌握足够数量的纱布,要求把掌握纱布的力量增加70%;(2)在金融上,扩大流通范围,吸收定期存款;(3)增加和抓紧税收;(4)推迟军政费用发放的时间(包括职工工资)。打了三仗,又采取财政、金融、税收及劳动工资紧缩的办法,陈云同志在当时估计,

今后金融、物价波动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了,估计只要再有一两个回合应付过去,物价风波即可平息。而实际情况是不到一年时间就把物价稳定下来了。据国家统计局计算,各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到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6.6,1952年12月为90.6。基本稳定下来,再没有上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领导和各地区支持下,精心细致的调查研究,摸清市场物价的内在规律,提出准确的针对性方案,加上各方面都能以全局为重,同心协力,步调一致,经过艰苦努力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件事牵涉千家万户,每天都要接触到的问题,对打击投机、安定民心,提高党的威信,与军事上重大战役的胜利,具有同等重要意义。

3. 初步调整私营工商业和打通城乡交流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财政收支基本平衡,金融物价基本稳定,但是私营工商业界发生了困难,由于商品滞销,引起了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并且由大城市波及到许多中小城市。据工商管理局统计,1950年上半年14个城市有2945家工厂关门,16个城市有9347家商店歇业。当时分析商品滞销和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12年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的迅速消失,加上人民购买力下降,通货紧缩,公债发行,银根抽紧了,资本家都叫起来。1950年下半年,开始工商业的调整,谓之“两统一调”。前面实行了“两统”,统得过头,还需要作一定的调整。调整工商业的实质,就是调整公私关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由国家给以适当的照顾和安排,使得五种经济成份各得其所。也就是树立起国营经济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可以增加生产,而且可以解决广大职工的就业问题。调整工商业采取的具体措

施,一方面放松银根,由银行给以贷款支持;一方面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品的办法。对私营商业,主要是调整经营范围和零批差价等,使其有利可图。当时私商有 275 万户,共有 2,000 多万人。陈云同志在 1952 年 10 月讲过,“资本家并不可怕,到实行社会主义时,最后一二年就可以解决,现在不必着急”。

在物价斗争中,由于资本家对物价波动估计过头,贪心太大,因而造成负债过日子,厂商周转不灵,叫苦连天。对上海的大资本家我们采取借款的办法收购商品,并用贷款的办法维持其资金周转,解救了上海工商界的危机。天津的商人在物价风潮中经过四波三稳,不敢过分冒险,因而他们的损失不大。

私营工商业困难解决了,还需要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市场繁荣。在这一段时期内,由于人民币下乡,逐步占领了阵地,并采取多种办法鼓励城乡交流,重点把农村土产品收运出来,供应城市需要,同时积极组织出口,这对活跃城乡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陈云同志说,扩大农村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群众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运转的结果,农村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

“两统一调”这一战役打胜了,在建国初期,对于提前恢复经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制起了重要的作用。陈云同志曾经说过,统一和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当然,这些工作中毛病还很多”(见 1950 年 6 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当时立即插话,说“第一条是功劳很大。”现在回顾一下这一段工作,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 从 1949 到 1952 年,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取缔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没收了官僚资本转为国营,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大大加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工业中,1949年国营工业的比重为26.3%,公私合营占1.6%,合作社工业为0.4%,私营工业为71.7%,到1952年,则变为国营工业占41.5%,公私合营工业占4.0%,合作社工业占3.2%,私营工业占51.3%。就是说国营工业的比重有大幅度提高,私营工业由70%降到50%。这是指全部工业(包括手工业)中的公私比重而言,如以现代工业来说,则1952年国营工业占61%,公私合营工业占6%,合作社工业占3%,私营工业占30%。在商业中,1952年国内市场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比重占34.4%,零售方面,京、津、沪等八大城市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和合作社约占32%。陈云同志一再提出五种经济成份要统筹兼顾。国家政权在我们手中,骨干工厂由我们管理,金融贸易机构都在我们手中,我们的力量强大,已经起了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不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兼顾其他,私营企业就要垮台,工人就会抱怨我们。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们一方面发挥多种经济成份各自的积极性,同时对当时的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试行有计划的领导,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运用价格政策,合理地掌握批零差价、地区差价。这些政策的决定和实施,显然都是正确的和有效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 实行集中统一财政金融,避免了两大危机,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建国以后,中央在财政经济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很差,还很脆弱,物资储存也很少。如果敌机窜扰,随时可以引起物价风潮。银行储备空虚,手中没有物资,平抑不了物价涨风,政治上很不利,而且会影响军事。当时最担心的是可能出现两种危机:一是财政危机,具体表现为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币失去信用,军需无法保证,工资津贴难以开支;二是粮食危机,搞不好,城市居民没有粮食吃,走上苏

联十月革命后配给黑面包实行余粮征集制的局面。1950年3月,中央下决心首先统一了货币,统一了财政,统一了物资调拨。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稳定,工商业得到了恢复,税收增加,市场物价稳定,工人不需要救济了,工商业家又喊“毛主席万岁”了,加以秋后农业丰收,农民的购买力也提高了。从而避免了两大危机,保证了两个900万人口(部队近900万,城市脱产人员900万)的供应,打垮了投机资本家的扰乱,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人心安定,社会稳定。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协力同心作出的巨大成果。

(三) 在战争中边稳边建,走上有计划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轨道。1949年、1950年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接着1950年10月下旬抗美援朝开始。这时必须首先考虑我们的财经基础如何承担战争的重担?研究财政工作放在什么基础上?财政工作的部署应该如何分别轻重加以安排?陈云同志当时担负全国财经工作重担,他从全局出发,支持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伟大战略决策。对财经工作安排的顺序第一是战费,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是稳定市场,求得金融物价的稳定。第三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边打、边稳、边建的三边方针。这三大任务同时承担,而且是在经济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进行,所以当时不少民主人士(包括一些党内干部)是摇头和抱怀疑态度的,但是实践结果,经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节衣缩食付出很大代价,不仅保证了战争胜利和市场的平稳,而且使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提前恢复、好转,使我们有可能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所以从1953年起,我们即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陈云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和周恩来、李富春同

志一起,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向苏联引进了 156 项重点项目,这都是大家知道的。陈云同志对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提出了英明的具体说明。他指出,“计划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农业生产”。“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部分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乎比例的。”当时他还提出,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工资,这三条必须量力而行,审慎从事。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都被党中央采纳了,因而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今天我们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粮食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问题。陈云同志自开国以来就抓紧处理粮食问题,稳定了市场物价,安定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保证了解放大军在全国的胜利。虽然做了许多有效的工作,避免了旧中国造成的粮食危机,但是在一个时期内粮食难以大量增产,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一直是紧张的。如果安排不好,分配不当,随时可能发生问题。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城市和工业对粮食的需要大量增加,农民生活也逐步改善,食用量增多,商品量减少,加之自由市场的存在和投机商的捣乱,反映到粮食供销方面,国家收购计划难以完成,而销售计划却大大超过,造成供销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市场供应紧张。1952 年,国家征购粮食 660 多亿斤,扣除返销部分只有 560 多亿斤,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

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问题的本质正如当时中央粮食决议中所指出的,它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所以,在粮食战线上,不从根本上找出办法,将会出现一个更加严重的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以致形成牵动全局的物价波动,将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把粮食供销放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上,陈云同志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反复深入地作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陈云同志认为要解决粮食问题,集中起来一定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和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最难处理的是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也就是与农村所有余粮户的关系;其次是国家同消费者的关系,也就是与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的关系。并且认为,如果解决好同农民的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只要收到粮食,分配就比较容易办了。但是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陈云同志将其比作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不从农民那里征购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甚至于打扁担,闹大乱子。两者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陈云同志反复考虑,提出八种方案,逐个比较。从改良主义想起,一直想到彻底解决的办法:(1) 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2) 只配不征,可能买不到粮食;(3) 只征不配,结果会边征边漏;(4) 原封不动,自由买卖,结果必乱无疑;(5) 临渴掘井,到最困难时才想办法,还不如现在下手好;(6) 动员认购,政府有明令,比强征好,没有把握;(7) 合同预购,有一个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今年来不及了;(8) 各

行其事,办法可以试一试,要考虑影响,考虑结果。权衡利弊得失,还是要用彻底办法,只能实行又征又配办法,其他办法都不可行。最后下了决心,向中央建议,一定要采取彻底的办法,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对城镇消费者实行粮食配售,即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从长远和总体来看,彻底解决办法利多害少。这个重大决策,当时即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许和中央的批准。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拍板定案,小平同志代中央起草决议,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实行。同时采取了四大措施:(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统购政策;(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统销政策,也就是实行适当的定量配售政策;(三)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经营粮食的政策;(四)实行在中央粮食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这四项政策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的。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深入农村和城市基层,把这项工作作为极端迫切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担当起来。这件事在我国经济战线上是继开国以来统一财政金融,稳定物价以后的第二个大战役。又一次严重地打击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扶植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力量,真正巩固了工农联盟,在一个方面把广大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轨道,同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经过宣传教育和实践,继粮食统购统销,又实行棉花、纱布、食油等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办法,并在农村实行了粮食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城市粮食定量供应办法也由粗到细,不断改善。但是这件事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改变他们的长期习惯和局部利益有抵触,加上社会上地主、富农和城市粮食投机商的捣乱和

破坏，到1955年春夏之间，粮食的供销情况又紧张起来，当时几乎是“人人谈粮食，家家谈统销”。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并不缺粮，却叫喊得很凶。有些心怀不满的人，乘机攻击党和人民政府，曲解和诬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个别地主、富农的代言人甚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捏造材料，散布谬论，恶意攻击，叫喊农村购了过头粮，逼死了人，城市供应不足，饿死了人。企图迫使停止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陈云同志亲自派人去有关地区作实地调查，经过全面的分析研究，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不能改变，停止统购统销政策是错误的。如果停止下来，不仅不能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影响对城镇消费者的供应，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对出售粮食的农民也是无利有害的。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作了严正的答复。指出这些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人中间有各种不同的情况，绝大多数是善意的人们，他们想不通，不理解，要加以教育，听取他们正确的意见，指出他们错误的看法，说明情况，弄清问题，以便共同努力，改进工作。对于地主、富农分子的叫嚣和报复行为，必须给以驳斥和制止。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则要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以揭露和打击。同时，提出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经过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使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得以继续贯彻实行。

粮食以及棉花、纱布和食油的统购统销，无论是从保障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或者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角度来看，都是正确和必要的，这是在我国农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政策措施。现在我国的粮食生产还没有过关，特别是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和经济作物的情况下，粮食的计划收购政策不能一下子完全改变，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还需

要坚持下去。陈云同志在1982年初的中央会议上指出：“农业经济是全国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农业经济必须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实行各种责任制以后，似乎农业中可以不要计划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只有农业以及牧副渔业全面发展，粮食供应比较充分，才能考虑改变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期，存在着五种不同的经济成份，即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1949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26.3%，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71.7%。在商业中，1950年国家经营的占6.9%，私人经营的占88.3%，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营的只占0.1%。1950年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农户占10.7%，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者只占0.5%。从建国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直到制定第一部宪法，都规定了对两种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对个体手工业及农业实行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改造。在三年恢复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953年规定资本家的利润实行“四马分肥”，所谓“四马”，即上交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基金和留给资本家的利润(包括股息和红利)。中这同又经过“五反”运动和粮食、棉花的统购统销，打击了资本家的不法活动，割断了他们与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经济联系等一系列的斗争。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一）两种改造形式：

在我国，对于官僚资本毫无疑问应当采取没收的办法。但是，对民族资本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呢？是“没收”还是“和平赎买”？在当时是一个议论的中心。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研究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在经济上也具有两重性。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并且指出：“在我国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因此，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执行这种政策，也就是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提出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于手工业和个体商业，既不能没收，也不能赎买，只有组织他们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逐步实行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开始搞合作小组，再发展到合作社，由低级社到高级社。并且把这部分个体经济与公私合营的工厂实行统筹兼顾，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对于商业，由于它比工业更复杂，商业中有批发商，有零售商，还有批零兼营的，因此采取了和工业不同的方式，一

般是实行经销代销的办法。对个体商户、夫妻老婆店,因为它遍布居民点,对群众生活有利,对社会经济也无损,因此允许保留一个长时期,同时加强市场管理,使它们遵守政府的法律和管理条例,逐步进行改造。

(二) 改造的两个步骤: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即第一步,由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第二步,再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又可以区分为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

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中主要的有加工、订货、统购和包销。在商业中,主要是经销、代销等形式。1954年以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的政策,由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发展到个别企业的合营。在这中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有时紧张,有时和缓。由于政府采取的办法适当,有紧有松,有进有退,因此始终没有发生公开的对抗。国营和私营工商业都得到发展。到1954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个体户的改造,采取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办法,并且和企业改造、企业改组互相结合,上下左右一齐动,造成普遍改造的浪潮。在这个时期,政府又宣布和平赎买的政策和办法,动员工商界头面人物、统战工作者、民主人士,召开各种形式的协商会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在各种行业、各条战线上规定具体的实施办法,进行广泛的有理有节的斗争,推着资本家走上改造的道路。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就讲过:“你们把肥肉吃光,把骨头剩下来,不干不行。”这些代表人物以后的观点都有了改变。经过这段时间,做了不少工作,才走到这个地步,看来,主要还是大势所趋,不能不改了。

对于手工业和个体商户的改造,是由各地根据情况逐步进

行联合改组的。由合作小组到合作大组,到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的合作社。对零售商业的经销代销,则由国营商业批给原料和适销商品。规定在中央商业部门统一领导下,加以管理。在改造的步骤上,对私营零售商尽量采取慎重的办法。对有些商品,由私营改为国营或合作社经营。国家根据当时情况采取有进有退,或者不进不退的办法,保持个体商户在市场中发挥辅助作用。

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到1955年冬,随着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一季度也出现了所谓高潮。由几个大城市首先是从北京开始,私营工商业者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宣布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1956年内,共有私营工业11.2万户,职工120万人,转变为公私合营工业;私营商业有40万户实行了公私合营,另外144万个个体商户组成合作小组。还有4.8万户个体手工业组成合作社或公私合营企业。据统计,1956年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54.5%,公私合营工业占27.2%,私营工厂已经所剩无几了。在批发商业中,国营、供销社经营和公私合营的比重达到97.2%,私营不到1%。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供销社经营和公私合营的占92.4%,私营的只余下7.6%。个体手工业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合作社手工业的产值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1.7%,个体的只占8.3%了。这一步由于准备不足,走得太快了,当时有的地方是形势所迫,有的地方是顺着潮流走,许多工作没有跟上去。陈云同志指出,这些工厂、商店很多是盲目合并,生产经营过分集中,有些小商贩合并太多、太快,很不妥当。尽管如此,不到半年时间,在1956年上半年全国已基本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任务,除了实行全行业合营外,手工业和小商贩都随着组织起来了。

（三）改造中三项重要政策的规定：

究竟如何对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进行逐步赎买政策？当时只有原则概念，没有具体内容，没有经验。为了摸索和探求具体的办法，当时集中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以及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干部、工人、工会领导人、资本家代理人、民主人士，分列各种专题，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争辩、磋商，提出了几项重要政策。

所谓赎买，是以一定的代价赎回生产资料。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无非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是工人无偿劳动创造出来的。党和政府采取赎买的政策，从政治上说，是工人阶级对于革命同盟者的照顾，为了换取革命的和平转变所付的代价；从经济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我们既然在一定时期内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争取他们和平转变，就应允许他们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已经转归国家使用，由国家统一调配。同时，国家对资本家进行了经济上的优待和政治上的安排，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核定股金——定股。首先要核定资本家的固定资产，进行清产核资。民族资本家中，中小的偏多，而且经过抗战，设备、厂房已经落后、破旧，很难按照原有固定资产核定他们的资金，只有采取评议的办法。而且“赎买”和“购买”意义是不同的，赎买的价值不完全决定于生产资料的价值，还决定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进程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定股以后，资本家保存了他的资产价值，这个资产所有权是资本家的，但是他不能买卖，只能拿定额利息。这样，工厂的实际权力就转到了国家手里。资方人员只能参加一部分即象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那样的管理，而不能象从前那样的身份来管理工厂和商店了。在评议股金的

过程中，资本家想方设法讨价还价，我们与之经过一场复杂的斗争才定下来。定股的数目，当时估算，全部资本家的资产为 34 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 25 亿元，商业 8 亿元，交通运输及其他 1 亿元。经过赎买之后，全部转移到国家固定资产中，从而改变了所有制。

(2) 定息。定息即每年根据资本家资产付给一定的利息。就是保持私营工商业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这件事在建国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时就实行过。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付给定额利息。在公私合营银行、电讯等行业，大都实行了定息的办法。上海有几家私营银行，仍挂原来的牌子，可以吸收侨汇，利润不采取分红的办法而实行定期付给定息。定息规定多少呢？一般讲要比银行利息略高一点，当时工商界有人提出，先定高一点，以后慢慢减下来。定息反正就是那么多，也可以先多后少。至于大的资本家利息很多，可以采取纳税的办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超过一定的限度为国家所得。这也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手段。定息共同商定年息为 5%，自 1956 年 1 月 1 日起算，国家全年为定息付出的资金为 1.65 亿元。先定七年，到时再议。用这些钱便把中国的资本家统统包下来了。这种光明正大、合情合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

(3)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安排。私营工商业者是包袱还是财富？可以说，除了一部分“五毒”之徒以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文化、有知识，能经营、会管理的有用之人。列宁就曾经说过要对那些“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最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所以我们当时采取的政策是把资本家（包括企业职工）全部包下来的办法，

人数约 114 万人。工资照旧保留。能当经理的还可以当经理，我们派公股监督。当时政府提出“双重改造”的政策，一是改造私营工商业，一是改造资本家。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技术、经验、能力等情况作适当的任用和安排。

陈云同志直接主持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除了动员经济管理部门、宣传教育部门以及私营工商业者中的进步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外，还十分重视资本家的家属工作。陈云同志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举了一个例子说，工商联座谈会上反映，好多资本家说“我们通了，但是老婆不通。”也有人讲“两位副总理讲了几个钟头，但是回去还不抵老婆一席话。”因此，陈云同志自己专门召集资本家的家属开会，向家属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使这场伟大的改造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是经济战线上一场广泛、复杂而又十分激烈的“战役”。我国用和平方法取得的成功，是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一个创举。马克思考虑过在革命成功后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办法，列宁提出过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我们党创造性地把这些设想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使其得到了实现。当然，在这一战役取得胜利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在统一计划下，生产的统一安排，企业内部的改造，改进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改善定股定息办法，组织专业公司等等，都有待进一步去完成。陈云同志在以后的多次讲话中，既肯定了当时的成就，也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弊病，如工厂、商店盲目合并，生产经营过分集中等等，以及其它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基本完成这一重大改造任务，确是一件大事，但应当有所分析。毕竟是操之过急，时间短，步子快，遗留问题多。如果按照原来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三大改造，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可能更有利于国民经

济的发展。这个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市场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工业商业部门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领导机关;城乡市场根据经营范围分工负责,城乡交流,互相支援;工商业内销和出口得到了统一安排;各级党委都加强了领导。所有这些,对以后稳定经济,调节市场,都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的这三大“战役”的胜利,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和建设的成功,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学习这一时期内成功的斗争经验,研究不足之处和存在问题,对于四化建设,振兴中华,是有很多借鉴之处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坚定不移地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辩证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正是依靠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国情出发,因而指导思想正确,能够慎重从事,力求在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用陈云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全面,比较,反复”和“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所谓全面,就是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但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比较,就是要作前后、左右异同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重要决策拟定以后,可以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的意见,也就是反复研究,弄清情况。全国解放后,陈云同志在主管财经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之所以能够运筹帷幄,就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处理每个问题时,总是进行大量的、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深刻分析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规律性。弄清楚合理的、有利的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界限,作为制定实施政策的科学依据。陈云同志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

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我认为今天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学习和研究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于切实执行党中央制订的四个现代化总目标和总任务及其方针、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建国初期土地改革 问题的文献选载

(一九五〇年二月——一九五一年九月)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尚有三亿多人口（其中有二亿多农业人口）的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党中央和毛泽东等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除少数民族地区暂缓进行外，从1950年冬开始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全国性的土地改革。为此，党和国家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进行了部署，并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院组织通则》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及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和他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中的有关部分等基本指导文件。这些文件都已公开发表。它们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明确规定了新区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这里选载的文电，除个别信件外，都没有公开发表过，反映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政策酝酿形成的过程，有助于研究建国初期土改政策的变化和特点。

关于新区土改问题致刘少奇电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七日)

毛泽东 周恩来

少奇同志：

关于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电收到。一般甚好，而且亟须适时发出。惟第四部分因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本身，可否暂缓发表。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故我们主张目前政务院只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的前三部分，而将第四部分留待我们归后讨论。如须修改，则可推迟至四月再行发表另一关于土改本身的文件。如同意，可向党外民主人士解释第四部分为今年秋后方始实行的政策，不妨从长计议，待毛主席归后再行决定及发表。

毛泽东 周恩来

二月十七日七时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 收公粮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 一 部 分

(一) 所有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新解放区,由于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与组织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决定在一九五零年秋收以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在一九五零年秋收以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九省,甘肃、宁夏、青海三省之汉人地区,凡是准备工作已经充足、群众的觉悟与组织已达应有水平之地区,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始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在以上各省,届时如有某些地区准备工作仍不充足,群众的觉悟与组织仍不充分,或有土匪骚扰者,亦得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在一九五零年秋收以后仍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待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再实行。

(二) 在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六省,决定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前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

(三) 在新疆及全国各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决定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前均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是否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另行决定。

第 二 部 分

(四) 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应一律实行减租。减租命令及减租条例由各省人民政府发布之。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地主依法实行减租后向农民收租,仍然是合法的,农民仍应向地主交租,而地主之土地仍归地主所有,但地主不得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出卖及以典当、抵押、赠送等方式分散土地。在当地解放以后,凡地主以土地出卖及以上述方式分散土地者,均应宣布无效。但农民相互之间的土地买卖不在禁止之列,因中农、贫农、雇农原有的土地,不论现在和将来,均归原来农民所有,一律不加没收和分配。

(五) 不许荒废土地,各地人民政府应保障一切耕种土地者收获的权利。如有荒废土地者,人民政府得给予处分,并得指定人去耕种无人耕种的土地,保障其收获所得。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恶霸分子的土地,无人管理的土地,均由当地人民政府代管,并由原来耕种的农民耕种之。

(六) 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各地人民政府应禁止一切破坏行为,例如:宰杀耕畜、破坏农具、砍伐树木等。对于确有这些破坏行为的分子,得依法严惩之。

第 三 部 分

(七) 目前在新解放区,有些地区的地主已经减租,另有些地区的地主尚未减租,再有些地区的农民根本不向地主交租,地主亦不敢收租。由于这些情况,以及由于最近一次新区征粮任务很重,征粮办法有缺点,有畸重畸轻现象,所以在征粮中发生

了不少严重问题,例如:有些地主须以其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来交公粮,还有地主须以其粮食收入的全部来交公粮,或者全部交了还有不够的。这是一种缺点和错误。对于这种缺点和错误,必须纠正和补救,否则,就要紊乱人民政府农村政策的步骤,就使人民政府在一九五零年秋收以前不实行分配土地、只实行减租政策的宣布,在实际的某种程度上变为无意义的举动,同时,也影响到政府的征粮任务至今在某些地区没有完成或没有全部完成。为了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并为了完成征粮任务,特决定下列各项:

(1) 中央人民政府所征收之公粮,在新区不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即国家征收公粮一百石,地方附加公粮不得超过十五石。各地人民政府有加重地方公粮者,应予纠正,超过者,应酌减至百分之十五。公粮任务分摊至各地以后,应经过详细的实地检查,如确有分摊过重者,应适当减轻。

(2) 应按照各户实际收入规定其公粮征收额。对地主征收额最高者不得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其有特殊情形者,亦不得超过百分之八十,超过者应适当减轻。如已全部征收者,应即退还一部。但地主在征收公粮之前将自己收入之粮食卖掉者,则不在此例。

(3) 公粮征收面,即负担人口,一般不得少于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4) 地主没有实行减租或已收预租者,该田亩应缴之公粮应完全由地主负担,佃农不负担。

(5) 地主已实行二五减租者,该田亩应缴之公粮除累进部分由地主负担外,其基本公粮部分由东佃双方负担,大体上应规定为东佃各负担一半。减租超过二五或不足二五者,东佃负担

基本公粮比例亦应依减租多少而改变。

(6) 地主完全收不到租,或佃农完全不缴租者,该田亩应缴之公粮即完全由佃农负担,地主不负担。

(7) 根据以上各项规定,各地原来规定之农业税累进征收办法与比例,应加以必要的适当的修正。

(八) 各地人民政府应根据以上各项,规定详细办法,并派人实地检查,对于以前没有征收公粮或征收不足以上规定额数之户,应视其具体情况补征之。对于征收公粮过多之户,应减征之,对于以前已征公粮过多过重致使其无法为生之户,应退还一部,或给予预征收据作为今年夏季或秋季所征之公粮,如愿以此作为购买公债者,亦应允许。

(九) 各地人民政府对于自己在征粮中所发生的缺点和错误,必须如此进行切实的纠正和补救,才能增进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才能安定农村以进行今年的春耕,否则,今年的春耕将受到严重损害。

第四部分

(十) 为了在一九五零年秋收以后或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在各新解放区能够顺利地进行分配土地的改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除颁发本指示外,将发布关于土地改革的若干法令,各新解放区的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应抓紧目前的时间,结合着春耕生产救灾备荒,迅速地紧张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就是:根据本指示及中央土地改革的法令规定各区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并派得力干部进行典型试验。大量地训练土地改革的干部,迅速组织农民协会,召开各级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农民委员会,并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彻底改造区乡

政权机关，并注意团结一切赞成土地改革的开明士绅等。

(十一) 某些地方土匪还未肃清者，应迅速肃清土匪，尚未减租者，应即进行减租。如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及反对农民运动、破坏土地改革的分子，省县人民政府应主动地适时地加以逮捕，送交人民法院或组织人民法庭依法审判，并处以应得之罪刑，不得怠慢。对于这些犯罪分子，应允许农民控告，但必须严格禁止乱打、乱杀、乱逮捕、乱处罚及戴高帽游行等行为。如果省县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不能主动地适时地去逮捕、审判和处分这些犯罪分子，则在群众运动起来以后，就很难避免这些混乱现象的发生。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法大纲中若干问题 征询各中央局的意见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陈赓、宋任穷并转各省委，并告东北局，华北局：

为准备秋收后在一些省区实行土地改革，拟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公布新的土地法及划分阶级的决定。在新的情况下，过去公布之土地法大纲及一九三三年文件，经我们研究后，有些地方已可做肯定的修改。有些问题则仍须征求各地意见，兹将拟征求各地意见的诸问题开列于后，望于研究后在二十天内答复。

(一) 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间隔不是几个月，而许是几年。在第一阶段内，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即是说只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

牲畜、农具、粮食、房屋，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二）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这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照此办法，连同没收地主之土地，加以分配后，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三）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规定：（1）对向来不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原则上一律不分给土地。（2）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工资待遇？

（四）假如富农的财产全部不动，而地主一般又没有多少耕畜、农具和存粮，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资金的困难有无办法解决，又如何解决？

（五）高利贷问题究应如何处理？能否规定出一个一般性的标准，作为高利和普通利息之间的界限，并规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以便使农民既能免除过去高利贷的盘剥，而今后农村借贷关系又不致搞死；还是在新的土地法中不提高利贷问题，还是只废除地主的债权，而其他一律不废？

（六）对南方的鱼塘、桑田、竹园、茶山等特殊土地，应注意哪些具体问题，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此外，还有哪些特殊土地问题，应该在新的土地法中加以规定？

（七）江、浙部分地区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权（即永久使用权，但与永佃权又有不同，因为田面权还可出租和买卖）问题，在分配土地时，对田面权特别是中、贫农的田面权应如何处理？其他地方是否也有此问题？

（八）在分配土地时对典当地应如何处理？

（九）分配土地的方法应如何规定？以乡（行政村）为单

位分配土地有无困难，分配土地的单位以如何规定为宜？

（十）县政府内可否成立吸收开明绅士参加的土地委员会负责处理土地改革事宜，还是即由农协办理？

（十一）南方富农的收入与剥削的情况比北方均较为复杂，在划分阶级，计算总收入与剥削收入时，是只按其在农业上的总收入与剥削收入计算为好，还是连同其在副业及其他方面的收入与剥削收入一起计算为好？这两种不同计算方法在实际上会产生何种不同的结果？

（十二）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

（十三）在分配土地时，有无留出一部“公共事业田”之必要？

（十四）东北、华北虽已完全实行或大部实行了分配土地，但对以上各项问题，仍望就你们的经验及所见电告。

中 央

关于转发邓子恢对富农问题的 意见致饶漱石

（一九五〇年四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饶漱石同志：

兹将邓子恢同志四月二十五日电转发给你，作为你们起草土改法令的参考。你的意见如何，盼告。

毛 泽 东

四月三十日

附：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

关于起草土改条例，我们已定五一召开会议研究。在会议以前，关于对富农出租地采何方针，须先行请示，经我们多方研究，有如下实际情况：

(一)江南各省土地集中情形，经过土地革命之震动，八年抗战之破坏，及国民党长期压榨结果，已不象大革命以前那样集中。如湘、鄂、赣三省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不及总土地百分之五十。地主富农出租地不及百分之四十。特别是老苏区及其周围，更加分散，地主富农土地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自己不劳动，单靠收租吃饭的地主很少。这种情况如湖北之黄麻，湖南之平江，江西之赣东北、瑞金、兴国、遂川、吉水等。我们经过地方党委调查，及许多老干部回家，从亲友无意闲谈中调查都是如此。虽然苏维埃失败后，地主复辟向农民倒算，但地主对反革命无信心，对革命畏惧，许多地主抓一把钱后，多转到城市作投机倒把，有许多地主则被杀或屈服，不敢再向农民进攻。因此，土地分散是很自然的，地主家属在破产后，多参加劳动，也是事理之常。

(二)根据上述情况，在土改中如连富农的出租地都不动，则雇贫农所得，比之按人口平分标准，要少百分之二十以上。据湖北调查要少百分之三十。同时，由于划阶级界限难明，估计许多中、小地主会混到富农、中农中来，更缩小了没收范围。而佃富农、佃中农又需要多少照顾一点(即多分一点)，如此，则雇贫农实际所得会更少。中央征求雇农不分地或少分地，其余阶层不分地的意见，我们认为不好。目前城市贫民及失业工人尚无法安置，如农村中再不吸收一批人，反把雇农挤出来，更要增加社会

混乱与不安。因此,在土改时,雇农、半手工业工人、及城市失业工人回家者,一般应与贫民平分土地;精减返乡之战士,勤务人员,亦须同样分得一份地;其他阶层如流氓、自由职业者、小商贩,也应酌量分配土地。

(三)因此,如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势必减少提供分配之土地。当然,让一些中、小地主混入富农阶层,缩小打击面,减少敌人,减少阻力,是好的。但应估计到,如可分土地太少,不能解决雇农土地要求,其结果会使贫、雇农积极性减低。有些地方甚至土改运动搞不起来。如五四指示初期在华中(山东也是如此)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当时农民对土改冷冷淡淡,大不如反奸清算的劲头,后来才知道下面过分强调照顾。一般贫农说,这样分我们所得太少(只加几分地),因这点小利益来使人倾家荡产,结下死冤仇人(?)。不过后来我们定出中间不动两头平方针,很快就动起来。当时照顾还只是不动富农自耕地,如今天连富农出租地也不动,是否会重复五四指示初期那种沉寂状态,很难确定。平、津近郊土改,民主人士叫好,农村不乱是好的。但农民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也应检查。如果经过土改而农民没有发动,则土改成为形式,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在将来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因为在中国这样靠人工经营、人工肥料、人工灌溉的具体条件下,如果占人口大多数而富有劳动力的雇贫农,耕地不多,积极性不高,则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要受到很大限制的。

(四)关于中立富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认为要使富农中立及保持富农生产情绪,单从经济上很难达到。因为我们在经济上,不能完全不侵犯富农利益,就使出租地及其他财产不动,但减租减息总不能不减,负担不能不重一些。此外,对雇工关系等等,总有许多纠纷。因此,要使富农中立并保持其生产情绪,除经济上适当照顾外,还应加上政治条件,如雇、贫农之充分

发动与中农之紧密团结,对恶霸地主之适当惩办等。如真正有了这个政治条件,再加上对富农财产与自耕地不动,则动其出租部分,使富农中立仍可做到。因为出租地并不是富农财产构成的主要部分,相反地,如果连出租地都不动,一方面雇贫农议论纷纷,另一方面富农也不会相信我们会始终保持其这种非分之财(因为地主与公堂出租地都分了),从而怀着不安情绪。这对中立富农反而有害。我记得一九二九年闽西按人口平均分地后(当时只分地不动浮财),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民,包括旧式富农、新式富农在内,都很满意。后来经过一九三零年反富农,社会上便引起纷乱。当时,最引起富农反对的倒不是因为没收富农出租地(这在一九二九年已经没收了),而是抽其自耕的好地,同时又动其耕牛,规定牛租,雇工加资,并派他的款子。这是我们应引为教训的。今天不动富农自耕地及其全部财产,是非常英明的,但出租地则可以动,动了并不妨碍中立富农。这点过去经验也已经证明过了。

(五)对富农出租地是否现在不动,一二年后再动;或者法令上不动,而让农民起来后再经调解来动。我认为这样亦不好,法令上不规定而让农民起来动,就容易乱。现在不动致农民分地不多,过一二年后动必须重分(不是个别调整,因数量很多),则将影响生产(中农也发生“割韭菜”的疑虑)。同时,法令上规定不动出租地,也要影响划阶级。容易因阶级划不清,而引起错误。如所有出租地都动,就使有些阶级划不清亦无妨碍,因为出租地都动,这对雇贫农已有保证,而所有农民自耕地都不动,则对中农绝无侵犯之虞。这是土改中的天然界限。上述各点,是根据江南实际情况,经过大家研究的一致意见,用敢直陈,是否有当,尚望明示。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给 邓子恢的复示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

毛 泽 东

子恢同志并告漱石：

四月二十五日电悉。

(一)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

(二)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由子恢同志于五月十五日以后中央开会时带来(子恢同志动身日期另外通知),在中央会议上作最后的讨论和决定。

(三)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毛 泽 东

五月一日

关于富农等问题致刘少奇信

(一九五〇年六月四日)

毛泽东

少奇同志：

此件^①看过，很好，很有用。有些修改，请再酌。说富农的部分长了，反而不清楚，有些则说得不大适当，故删去一大部。加上一九四六年以后一段经验^②，借以纠正一部分同志已经有了的一种错觉，说过去的“左”倾错误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土地法大纲上规定了没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原故。如果没有这段说明，则不能纠正此种错觉。

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房屋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质。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

① 指刘少奇 1950 年 6 月 14 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

② 指毛泽东在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案中加写的一段话。

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曾于一九四七年冬季叫乔木写了一个文件，题为《中国社会阶级及其待遇的规定》^①，其前面两章是我写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参看。

毛 泽 东

六月四日下午

关于土改报告中不写国际上土地 问题历史致刘少奇信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毛 泽 东

少奇同志：

此件^②已阅，于今日下午八时前送交乔木，连同土地法在明日发表。

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

① 这个文件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

② 指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

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是一种反奴隶制的斗争。各国历史既如此复杂，大都和我国现在这样先进行土改，后发展工业的情况不相同，故以不写国际历史一段为宜。国际历史和中国相同者，只有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毛 泽 东

六月二十九日

关于加速进行土改等问题致 中南局等电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毛 泽 东

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

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请邓、谭、叶、方、张、莫诸同志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告我为盼。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二日

原电如下：

福建省委并中央：

十一月十九日电悉，同意你们召开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会议，切实布置限期剿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等工作。

华 东 局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饶(漱石)陈(毅)并华东局并毛主席：

省委讨论了毛主席及华东局对福建的指示后，完全拥护毛主席这个指示，即限期剿灭股匪、全力加速加宽的进行土地改革和发展地方武装。省委决定根据这个指示，重新作全省工作部署，并定十一月二十五日，召开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会议，加速布置。主要内容如下：

(一) 除争取在明春前消灭全省股匪外，采取将土改分两步完成的办法来加速加宽土改面。除闽侯专署七个县及其他六个专署各一县至两县完全按土地改革法进行外，每个专署尚可扩大两县至四县，和解决地主阶级土地及其控制的公田问题。其他问题，在春耕后、夏收前解决之。这样，除十七日电中所报二十个县可按土地改革法进行外，建阳专署增加崇安、浦城、邵武、水吉四县，南平专区增加沙县、顺昌、尤溪三个县。福安、泉州、漳州三个专区各增加二至四个县。具体县份待地书来商定，但以沿海地区先搞为原则。永安、南平也进行一个县。全省约共三十六个县。

(二) 尚有百分之三十地区，则宣传土改，加紧剿匪、反霸、减租、武装等土改准备工作。减租在这些地区不做一个阶段。其内容为：发动农民，加紧对封建地主势力的斗争（批准农民不交地主租），并照顾小土地出租者（少减，免减）。这些地

区仍不能放松领导，因农民不交租，实际等于否认地主土地所有权，仅因主观力量不够，未分配土地而已，故斗争必将激烈化，须注意领导，才不妨碍生产。

（三）地委已开始土改准备，各县也实验一个乡。但在十二月份，县仍以一部分力量，结合区完成秋征。在秋征中，加紧整理农会，查黑地等。准备十二月底可完成实验乡工作。一月至四月可展开土改，四月下旬至五月，可临时以春耕为中心。春耕后，再继续执行土改。

（四）省委及军区，将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加强各地委力量（军区和省直，估计可抽五千人组成工作队）。

（五）剿匪与土改密切结合起来。以剿匪部队的工作组开展土改，以土改增速瓦解匪众，并在不乱杀原则下加紧镇压反革命、匪特、恶霸。

以上妥否？盼批示。

福建省委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应注意 防“左”倾危险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

十二月十二日电悉。送来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十八日收到。我们基本上同意你们发这样一个指示，着重纠正土改中的右倾偏向，以便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但在指示中还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

哪些“左”的错误是不许再犯的，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忽视联合中农的重要性，破坏富农经济，对地主普遍地扫地出门，乱打乱杀，在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大轰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面既放手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不犯或少犯“左”的错误。否则，某些干部很可能重犯过去某些“左”的错误。在土改试点中有些好的经验，望你们选择二三个乡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写出全部过程，予以发表，要各地学习和仿效。另选一二个乡的坏经验加以系统的批判，亦予以发表，要各地防止和避免。这样的指导方法是最具体最有效的，望你们注意采取。

中 央

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 在经济上应团结所有的人 进行生产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

中南局并告各中央局：

八月二十七日电悉。在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农村中，除开严格禁止地主及其他反动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外，在经济上应该团结所有的人来进行生产；就是对于那些守法并认真进行生产的地主，亦应包括在团结和保护之列。就是说，对这些地主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亦应在可能范围内予以适当的解决，对于他们在生产中所积累起来的财产，亦应加以保护，不得再加分配。这些地主要求加入供销合作社者，应允许他们加入。在他们加入合作社后，应照其他社员一样替他们推销土产和供应物资给他们，并分得红利，但应剥夺他们在合作

社中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这就是说，在经济上应该团结他们生产，但在政治上必须防止他们在合作社中进行捣乱。对于富农加入合作社者，他们在合作社中则应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以示区别，但当地党和政府应注意不要让富农控制合作社的领导权。

中 央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概况、 特点及其意义

诸 班 师

一

在我国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之一。由于中国共产党所抉择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决定我国农村的土地改革,不是始于全国胜利之后,而是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在一个个业已解放的地区先后实现的。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已有1.2亿农业人口(总人口约1.3亿)的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还有约2.8亿农业人口(总人口约3.4亿)的新解放区和即将解放的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①

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怎样进行?经过长期土地斗争实践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是有丰富经验的。早在1948年春,针对1947年冬部分新解放区发生的“急性土改”的错误,^②我们党就明确

^① 不包括台湾、港澳地区的农业人口和总人口数。

^② 指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军到现在河南、安徽省等部分边沿地区,随军干部不顾当地敌人武装力量尚未肃清,社会环境还不稳定,农民群众还未充分发动,就匆匆忙忙实行土改,分浮财、分土地。结果,使外来干部脱离群众,少数积极分子陷于孤立,群众没有得到多少果实,粮食、浮财大部被投机分子、流氓分子侵占,土地亦多系明分暗不分,造成这些地区社会财富过早分散,社会秩序陷于混乱,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地指出：在新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有策略的。必须依据其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在新区进行土改，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同时，我们党还严厉地批评了在新区这种“急性土改”的做法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①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具体规定：新区农村的任务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②

上述我们党有关新区土改问题的指示，是符合新区实际的，不仅有效地纠正了当时“急性土改”的错误，而且对建国后新区怎样进行土改，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建国后除了华北和河南省、陕西省一部分新区，因长期处于老解放区包围和影响下，或因解放较早，已基本上具备土改的先决条件外，绝大多数新区因解放不久，尚不具备土改条件。在这些新区，特别在建国后陆续解放的西南、西北的大片新区，还涉及更为复杂的少数民族问题。由于各新区的情况复杂，在土改问题上，党中央提出有分别、有步骤进行的方针是正确的。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问题，更应谨慎对待，认真处理。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和政府对建国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一开始就区别新区的不同情况，根据“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

① 参见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② 引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方针,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的。整个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1) 边准备、边土改阶段(1949年10月--1950年6月)

在这个阶段,除了对已具备土改条件的约有2,600万农业人口(总人口约3,000万)的华北和河南省、陕西省部分新区,于1949年冬开始进行土改,到1950年春已胜利完成任务外,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主要集中在做好土改准备工作。土改准备工作是繁多的。诸如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划定土改范围,进行调查研究,建立各级土改委员会,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改造乡村基层政权,整顿农协组织,准备和训练土改干部,修订土改法,宣传土改政策,建立人民法庭,等等。我们党和政府在繁多的土改准备工作中,重点抓了两项工作。一项就是对不具备土改条件的一部分新区,先后开展了清匪反霸及减租减息运动。通过这些运动,在新区,不仅社会环境安定,封建制度受到严重打击,而且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有显著的提高,农民群众在乡村中的政治优势已经树立,广大干部得到了锻炼和培养。据华东、中南两大区初步统计,两区农协会员已有2,400万,民兵约100万,已改造的乡政权约38,000多个。^①另一项就是修订土地法。这是一切土改准备工作中居于首位的工作。为了使新区土改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建立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土地法的修订工作。早在1949年11月,毛泽东

^① 此次新区土改,除了对地富底财不挖、不追;对中农的土地财产,由过去“原则上不动”改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其意图在土地财产分配时,完全不动中农的土地财产)。其余政策均同解放战争后期的政策规定一致。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不动富农问题,但未深入讨论,作出决定。1950年3月,他又亲自起草电文代表中央就土地法修订中几个问题征询各地意见时,又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当然,此次土地法修订,所涉及到的,不只是富农政策,也有小土地出租者、地主的政策;不只是没收、征收土地政策,也有分配土地政策、特殊土地政策。由于全党努力,经过较短时间的反复酝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终于在同年6月产生。所有这一切土改准备工作的就绪,这就为新区下一阶段的大面积的铺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 边土改、边准备阶段(1950年6月—1952年12月)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之后,我国新区土改进入有计划、大面积地铺开阶段。1950年秋冬,首先在1亿农业人口(总人口约1.2亿)、具备土改基本条件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与此同时,对其余1.6亿农业人口(总人口约1.9亿)的地区的一部分又先后有计划地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为下期土改准备条件。^①就是这样,边准备、边土改;边土改,边准备,互相交替,这部分地区的土改,才分别于1951年、1952年相继完成。到1952年年底,就全国而言,除留下1,6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在新疆、西藏、四川、云南等省区)尚未进行土改外,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胜利完成。

① 在这期间,新区的土改,一般都经过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两个阶段,作为土改的准备。但也有例外。如福建省部分地区,1950年冬,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加速土改,经中央批准,曾采取剿匪和土改的办法,先没收地主的土地,公田进行分配,第二步再征收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

二

三年中,我国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从总的来说,发展是顺利的、健康的。实践证明,我们党为新区制定的土改政策是正确的。这些土改政策的制定,不仅继承了过去的经验,而且在有所发展中具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同建国前党的土改政策相比较,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 路线与政策的关系问题。一切具体的方针、政策都是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应该以路线为其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可是在建国前,我们在具体土改实践中,所以经常出现偏差和混乱,特别是侵犯中农利益时有发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路线和政策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当时我们党提出的土改路线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而在《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却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对富农则征收其多余的土地财产。这样规定,虽然有利于尽量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争取贫雇农支援革命战争,参加革命战争,有利于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但是,由于它侵犯了中农利益,不恰当地消灭了富农经济,已超越了反封建的范畴,不只不利于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阶级,发展农业生产,甚至与贫雇农的长远利益也是相悖的。建国后,在新区土改时,路线与政策相矛盾的情况已根本解决。我们党不仅制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样一条完整的、适合我国国情和民主革命任务要求的路线,并且根据路线要求制定了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为例,同建国前比较,主要不同的是:1. 对富农的政策,由征收其多余的土地

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土地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及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得侵犯”；对其所有出租的少量土地，也“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对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2. 对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则提高了其土地保留不动的标准。由原来规定小土地出租者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得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一百改为百分之二百。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3. 对地主的政策，主要是限制了没收范围。只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它财产不予没收”。4. 对中农的政策，则“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得侵犯”。上述政策的规定，与路线无疑是一致的。特别是对富农的政策的规定，是符合我国富农的特性的。长期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土地改革中，在政策上反复、曲折较大的，就是富农问题。我国富农既具有一般富农的共性，也具有一般富农所没有的个性，即除了剥削雇佣劳动外，大多数还兼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贷。过去对富农的特性的认识是片面的。建国后，我们党对富农政策是解决得好的，进一步明确保存富农经济是指“富农所有的耕地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并且把一般富农和半地主式富农区别开来，分别对待。正因为我们党为新区土改制定的土改政策，在路线和方针、政策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相辅相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我们才能建立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也才能胜利地完成土改任务，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2）土改和生产的关系问题。在土地改革中，土改和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这是我们党一贯提倡和坚持的。建国前，由于革命

战争和尽量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影响，各解放区在贯彻这一方针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土改和生产结合，总的来说，是不够好的。建国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情况就不同了。不但在保护中农利益、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工商业等基本政策的规定上，而且在具体部署土改的时间和进度时也比过去要充裕得多，这都为全面贯彻这一方针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在土改中各地必须正确执行政策和不违农时。根据各地经验，党中央曾就土改不违农时问题先后制定了若干政策和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土改应利用农忙间隙时间进行；对所有权尚未确定的土地，应责成专人耕种，实行谁种谁收；地主怠耕者，应给以处分，或临时指定农民代耕，并保证耕种者收回成本及其劳动所得；贫苦农民土改后耕种仍有困难者，应大力帮助，通过群众性的劳动互助、借贷和政府发放贷款等办法，加以解决。

(3) 放手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的关系问题。充分发动群众，这是实现土地改革的基本方法，也是贯彻土地改革路线的根本保证。以党的政策去动员、启发、组织和领导群众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既要防止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也要防止做群众的尾巴。党中央为了吸取建国前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领导新区土改中一再强调要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党的政策集中体现了群众正当的合理的要求，是符合群众利益的，其中有的符合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有的对群众的眼前利益虽作了某些必要的限制，但正是为了维护群众的长远利益。所以，执行党的政策，绝不会妨碍放手发动群众。大量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艰苦细致、扎扎实实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群众的切身体验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和群众利益是一致的，群众就会拥护党的政策，执行党的政策就会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

众,关键在于分清敌我友,在于不仅要坚决依靠贫雇农,而且要团结中农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打击真正的敌人。在斗争方式上,则要教育群众,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善于运用合法斗争方式(如运用讲理斗争制服地主,运用人民法庭惩办和镇压不法地主),防止过去那种乱打乱杀的非法斗争方式的重演。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还需要处理好城乡关系问题。随着土改的深入,农村派人到城市直接捕人或索退押金的现象日益增多。为了维护城市社会秩序,保护城市工商业,建立城乡人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1951年2月,党中央根据武汉等城市的经验,发出指示,决定各地凡满五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均应设立城乡联络委员会,作为该城市政府下属机构,统一负责,处理这方面的事项。^①这一机构的建立,对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互助和巩固工农联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4) 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早在1949年下半年,向少数民族地区进军时,我们党就制定了少数民族工作必须“坚持民族团结,慎重稳进”,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关系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基本方针,对这些地区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取决于少数民族的觉悟程度、民族干部的成长程度和民族上层的改造程度,都要经中央批准后才能付之行动。因此,要求各地细致地考察、探索和把握各少数民族土地制度的状况及其特点,以供中央针对各少数民族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此次新区土改,除了约1,6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情况复杂,不具备改革条件,故有意识地推迟外,也涉及一些少数民族散居、杂居、聚居区,因其社会经济结构与汉族地区相同或大体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地区设立城乡联络委员会的指示,1951年2月。

相同,并已具备中央上述条件的,经中央批准后,亦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对社会经济结构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地区,执行的政策基本上与汉族地区一样;对社会经济结构与汉族地区相似,则执行的政策就相对地宽些、灵活些。

三

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这一革命变革所涉及的不仅经济、政治,还有军事、思想等各个领域。由于这一革命变革的胜利,结束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统治,从而使整个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 3 亿无地少地的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 7 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大约 700 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广大农民由地主阶级的牛马变成了农村的统治者,由土地的奴隶变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得到巩固。诚然,建国后土地改革的胜利是伟大的,虽然在我国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还不可能彻底肃清,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奋斗,加以解决。

关于建国初期 镇压反革命的文献选载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九五一年五月)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

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陈赓，宋任穷，贺龙，李井泉，新疆分局，山东分局，并告华北局，东北局，内蒙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质（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

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不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例如私人仇杀及偷窃公共物资等，亦须处刑，但应与反革命行为加以区别。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四）在实行上述各项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但这种审判和批准的手续应该简便迅速，以便在情况紧急能及时地加以镇压。如果在某地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现象，则必须立即坚决地令其停止，然后加以审查。

（五）为了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地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某些地方有灾荒或有一部分贫苦人民缺乏食粮的现象，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生产救灾，并以一部分公粮出卖；到实在困难的时候，对实在无法渡过灾荒的某一部分人，还须给以救济，或借给

一部分粮食,在收获后归还。只有一方面认真地安抚人民,纠正自己在工作中及作风上的缺点;另一方面,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捣乱破坏行为以严厉的镇压,又对其胁从分子、罪恶不大的分子给以宽大处理,令其改过自新,才能巩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对于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和肃清反革命残余问题,所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明确指示。也是全国人民目前迫切的要求。

但是,有不少干部和党委,或者由于在胜利后发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或者由于在新的环境中受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致把统一战线中的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对敌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相混淆,把正确的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

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

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各级党委，对于已被逮捕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即领导与督促主管部门，根据已有的材料，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地加以处理。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对于罪恶较轻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下级党务人员，应即实行管制，加以考察。这些分子如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应予以严厉制裁。

对于真正的胁从分子、自动坦白的分子和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分别予以宽大的待遇，或给以适当的奖励。

（二）对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组织和特务间谍分子，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已逮捕者，应分别情况，依法惩处。未逮捕而有证据或有重大嫌疑者，应依上级指示，予以逮捕。

（三）关于反革命案件的检查，应由检察、公安部门负责。其审判，仍由人民法院或军管会军法处负责。目前法院工作，应以处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

为了防止在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发生“左”的偏向，各级

党委必须坚持反对逼供信和禁止肉刑，必须注意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关于外国人的处理必须经过政务院批准。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情形，公安和司法部门应按级向上级作定期报告。

（四）法院、检察、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各级党委应加强自己对于它们的领导，并适当地充实其干部。监狱管理必须严密，必须有可靠干部负责。

（五）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各中央局必须于本指示发出一个月内即十一月十日以前，作出第一次报告，并订出今后执行中央方针的计划，电告中央批准，然后照此实行。

各中央局所属的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关于在自己区域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及自己的工作计划，必须于本指示发出四十天内即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向各中央局作第一次报告，此项报告同时发给中央一份。嗣后各中央局及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均须每四个月由党委书记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专题报告一次。

镇压反革命分子， 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①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毛 泽 东

克诚同志并告子恢同志，

^①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的电报的节录。

十二月七日的综合报告收到,很好,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
没有话说。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九日

对反革命分子判刑 可分别不同情况处理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毛 泽 东

叶黄萧林并告中南局:

一月十七日电悉。广东情况已明了,你们的部署是正确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务。此外,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广东必须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敌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

毛 泽 东

一月廿二日

大城市应当认真地严厉地 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①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各大城市市委: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下面是北京的镇反计划,请你们研究仿办。其中说到拟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

中 央

二月二十五日

要向各界人士广泛地解释 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②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省军

①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

② 这份电报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区：

请注意利用中央政府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机会，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所写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一文，写得很好，她是司法部长，又是民主人士，各地应注意利用此文说服那些存有错误思想的社会人士及胆怯的人们。将史良此文和中央的条例，彭真的报告及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二日社论印成一本，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学习。

中 央

二月二十八日

要取得党内思想的一致和 各界人民的拥护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饶漱石同志转上海市委：

同意三月十五日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这次计划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首先要取得党内思想的一致，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沧县地委的经验。其次要取得各界人民的拥护，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北京市委的经验。他们是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如果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久要举行，也可以这样做，否则可以先逮捕。北京市取得各界代表人物拥护的方法主要是一次一百多人的小型会议，又一次五千人的

大会。前者除说明情况外，还陈列典型的证据和案情给他们看，结果引起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坚决镇反。后者准备不久召开，主要由苦主登台控诉，以期争取五千个代表人物的拥护，会后即大杀一批。由北京的经验看来，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是可以取得他们拥护的，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将一二两项同时做，例如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清理工作已经在做，并且有成绩。

毛 泽 东

三月廿四日

镇压反革命应当准确、精细、有计划、 有步骤，完全由上面控制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黄克诚同志，并告子恢，漱石，小平，剑英，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我认为黄克诚同志三月二十三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凡各地有如黄克诚所说“逮捕范围扩大、

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畏缩不前，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好好掌握，不要出乱子。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各省市。

毛 泽 东

三月三十日

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 做到家喻户晓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及地方军区并告中央各直属部门：

对镇反工作宣传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北京天津两市最近两星期来大有进步，对镇反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普遍揭露，利用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几千人乃至万余人的会议，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利用展览会，大肆宣传，使家喻户晓，使全体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参加镇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效非常之大。中南局现亦发了指示，扩大镇反宣传，可为各地参考。

毛 泽 东

三月卅日

严格限制镇压范围， 控制捕杀批准权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

毛 泽 东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地委：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方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毛 泽 东

四月二日

镇压反革命要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 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

毛 泽 东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兹将福建公安厅关于福建镇反工作的报告转给你们参考。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反动派多,处决的比例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地自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关于工作组,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毛 泽 东

四月七日

将捕杀批准权分别收回到 地专和省级^①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

兹将华北局五月六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电转给你们。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计四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四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中 央

五月七日

①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党、政、军、 群团体内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指示^①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兵团及志司,并告中央及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

①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二百零四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中 央

五月八日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①

（一九五一年五月）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

^①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稿时改写的一段话。

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使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工作 要有一些具体组织形式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

毛 泽 东

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地委，县委：

使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工作，要求一些具体形式。关于审查案卷方面，华东各地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组织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无锡实行的结果很好，各地都应仿照办理。实行这种

办法,民主人士真正得到了学习机会,去掉了怀疑,和我党更加靠拢,我党也就更加主动了。

毛 泽 东

五月十九日

建国初期的镇反斗争概述

张 民

五十年代初在我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领导广大人民同旧社会的反动残余势力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采取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强力措施。这场运动的意义伟大而深远，它不仅涉及三年恢复时期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且影响所及以后进行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七年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

镇反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1949年，我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党又领导人民开始运用手中政权，实行改变贫穷、改造社会的计划；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建设，并创造条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夺取政权以后肩负的新的伟大的历史使命。然而，当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虽被推翻了，他们仍极端仇视新中国；大陆内残存的众多

的特务、土匪、恶霸地主、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甘心遭受覆灭的下场。这些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内外策应，千方百计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反革命分子在建国初期进行了种种罪恶活动：炸桥断路，撞车翻船，焚烧粮食、棉花、器材、仓库甚至整个工厂、毁坏锅炉电机造成停产停电，对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产生了严重影响。在饮水、食品中投毒，残害无辜群众包括儿童；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威胁和恐吓积极分子，离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骗取民财，强奸妇女，抢劫行凶，甚至在城市纵火，焚烧民房、商店、医院、街道，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扰乱了社会秩序。组织暴乱，围攻我基层政府，潜伏我党、政、军机关部门，腐蚀收买干部和工作人员，刺探收集各种情报；搞袭击、暗杀活动，制造白色恐怖。据统计，1950年在广大新区，我们有近四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仅广西省就达七千二百多人。对于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敌人更是磨刀霍霍。台湾国民党的保密局曾向大陆各大城市派遣行动组和所谓“精干勇敢行动人员”搞暗杀。例如，特务陕站行动组企图刺杀彭德怀、贺龙、甘泗淇等。号称“行动能手”，“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特务刘全德潜入上海，以陈毅、潘汉年等为暗杀目标。台湾派出的北京行动组专门行刺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还企图制造更加惊人的政治事件，准备在1950年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检阅台；但这个重大阴谋案在实施的前几天被我公安机关破获了。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胜利了的人民决不能掉以轻心。早在1949年3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在已经解放的区域里肃清反动残余力量的任务，并强调了今后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各种反动分子作各种斗争的重要

性，“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同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更加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性质和任务，精辟地指出了专政和民主的辩证关系。他还针对人们在胜利面前容易滋长麻痹思想和糊涂观念，指出我们通常说的要消灭国家权力，不是指现在，“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为建国后的镇反作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把镇反专门列入一项条款，表明了我们党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原则，已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二)

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是十分严峻、激烈而复杂的，它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而时起时伏。建国以后，就全国范围或大部地区的形势来看，我们同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斗争大体上有三次重大回合。

第一次是1950年初。当时我国北方农村较大的区域，如河北、山东、平原、苏北、皖北等地，春荒严重。反革命分子趁机捣乱，他们一方面散布谣言，破坏春耕和土改，离间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另一方面劫粮、焚粮，挑动不明真象的群众抢

粮，制造恐慌和动乱。在南方和西北地区，大批股匪、潜伏特务企图破坏、阻止我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频繁地发起武装暴乱，搞所谓“大陆游击”，策应美蒋的军事行动。如美蒋飞机“二·六”轰炸事件，炸毁了上海电力公司，严重破坏了上海重要的水电动力设备，炸死市民五百余人，伤千余人。针对日益严重的敌情，为了巩固人民的胜利成果，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广大新区，在剿匪的同时，严厉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决不能过分宽容，任其猖獗，并从政策上作了五点规定。西南、西北、华东、中南及华南这些敌情严重的地区接到中央指示后，都采取了一系

第三次从1950年秋季开始。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随后很快把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并对东北边境狂轰滥炸。这时，国内的反革命分子闻风而动，气焰嚣张达到顶点。他们叫嚷，“黑暗将过，黎明即来”，“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时机已到”，“失意的人们，团结起来，反苏反共”，并且四处活动，大肆破坏。为了顺利地开展抗美援朝和各项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在发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第三天，即1950年10月10日，作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掀起了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一起，统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

镇反运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全面发动阶段，从1950年10月10日至1951年2月20日。中央双十指示发出后，在当月，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区委党委都召开了工作会议或紧急会议，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研究当前敌情，检讨过去工作中的问题，对积压的案件和今后的镇反作了新的部署或决定。会后，各地层层抓落实，订计划，先后逮捕和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同时进行公开宣传，组织群众参观镇压反革命的现场和反革命罪证展览。到1950年底和1951年初，全国大多数地区初步扭转了对镇反“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运动已初具规模。

二、普遍高涨阶段，从1951年2月21日至5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发布和彭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条例”问题的报告，以及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全国各界人民、各党派、各人民团体，都纷纷发表讲话、宣言，一致拥护，使运动高涨起来。到五月底，国内残存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已大部被逮捕并处决，为整个运动

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清理积案阶段，从1951年6月1日至10月31日。在这五个月里，各地根据中央谨慎收缩的方针，一般停止捕人杀人，组织力量集中清理积案，和清查“中层”、“内层”，对少数必须捕杀的反革命分子加以严格控制，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从而有效地纠正和防止开始出现的草率从事的倾向，保证了运动健康、深入地发展。到10月下旬，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完成了对反革命分子杀、关、管的计划。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会词，标志着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四、扫尾和建设阶段，从1951年11月至1953年秋季。中央最初部署完成这一任务的时间为六个月，要求大部地区对清理工作进行一次复查，加强和健全各种治安保卫制度，继续同暗藏的、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少数镇反不彻底或尚未开展的地区，应订出计划，和土改、抗美援朝等工作结合起来进行。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使各地领导投入了主要的精力，原先的镇反工作计划没能全部完成。1952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对此又作了重新部署，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3年秋季，历时三年的全国镇反运动终于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三)

镇反是建国以后一次成功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我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一致的，采取的方法符合历史条件，因此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积极的。

一、验证和推进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镇反运动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它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党对革命胜利之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必要性、艰难性和长期性的正确估计，以及相应制定的理论原则的真理性，同时又推动了我们党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等许多党的领导人成功地把理论原则化为整套方针政策，尤其是提出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的多种途径和有效地对敌专政的方法，使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二、密切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镇反运动之前，广大群众对各地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宽大无边”的偏向非常不满，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民主建设事业也蓬勃发展，但党和政府并没有因此对局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文过饰非，而是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果断采取措施，并在运动中多次公开承认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这件事，体现了党和政府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消除了怨言，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在当时呈现出万众一心，活泼热烈的政治气氛。

三、加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取得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合作的经验。毛泽东对此是这样总结的：愈是彻底打破关门保守思想的地方，真正让各界人士与闻实情，亲身参加，经过学习和锻炼，就愈能去掉他们的怀疑，向我们党靠拢，从而那里的工作也就愈加顺利。

四、政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通过镇反运动，共和国年轻的专政队伍得到了清理和纯洁，锻炼和壮大，积累了经验，提高了业务水平，各地普遍建立了公安、检察、司法机构。尤为喜人的是，政府在法制建设上摸索出一些经验，形成制度，

例如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人民地方检察署组织通则》，等等。

五、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场运动，杀、关、管了大批反革命分子，摧毁了旧社会遗留的残余反动势力，消除了人民脚下的“地震”，全国范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广大工农群众扬眉吐气，焕发出极大的生产建设积极性。建国初期经济形势的迅速发展，是同镇反运动的贡献分不开的。

六、清除了土地改革的障碍。土改是一场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必然会遇到封建阶级的疯狂破坏。镇反以前，恶霸、地主、惯匪、特务等在广大农村的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在尚未开展或初步发动土改的地区，搞暗杀恐吓，袭击农会，竭力阻挠土改；在基本完成或已经完成的地区，进行反攻倒算，夺地夺房，抢劫耕牛，妄图“变天”。镇反运动掀起后，彻底清除了这批无恶不作的封建渣滓，打开了土改工作局面，改变了一些群众“分田不敢要，分房不敢住，生产没心思”的状态，保证了土改的胜利完成。

七、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镇反运动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配合是十分密切和至关重要的，两者不仅几乎同时开始，而且在我志愿军进行决定全局胜负的一至五次战役时，国内正展开对反革命分子大规模的逮捕和镇压。这种配合最直接的表现是，粉碎了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合的企图，巩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后方。

八、为“一化三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主要是经济战线的保卫和清理工作取得了伟大胜利，社会秩序得到安定，这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和 作战方针的文献选载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九五一年七月)

编者按：1950年6月27日，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略朝鲜，并出动其海军第七舰队，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0月上旬，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安全。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要求以及我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配合朝鲜人民军，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沉重打击了美国侵略军和南朝鲜伪军的嚣张气焰。经过持续两年多的军事较量和停战谈判，终于迫使美国在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电，大都已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第一、二册和《彭德怀军事文选》。这里仅就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问题选载了6份电报和一篇讲话，供研究参考。这组文电和讲话按时间先后顺序编发。

关于我军应当入朝参战 致周恩来电^①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

毛 泽 东

(一)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① 这是原电报的节录。当时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

② 南满是旧称，指沈阳至大连铁路线以东的庄河、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关于十三兵团部改组为 志愿军司令部致邓华等电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邓华^①同志并告彭^②及高^③，

(一) 你们是否已前进？我意十三兵团部应即去 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二) 如部队渡河须有机构在安东^④指挥，则可留适当同志率一部机构留在安东，你和其余同志率必要机构即住彭处为宜，望酌定。

毛 泽 东

十月二十一日三时半

①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②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③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④ 安东，即今丹东市。

中央军委关于作战方针问题 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①

(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

彭,并告高:

四日二时电悉。

一、同意你的作战方针,但望注意:敌人此次进攻虽以主力九个师旅(美四个师,英两个旅,土一个旅,伪两个师)放在西线,作为主攻部队,可是南汉江以东仍有八个师(美两个师,伪六个师)纵深配备进行助攻,而沿海又有两个师(伪首都师,美陆战一师)为之策应,其特点为力求东西呼应,齐头并进;其弱点为东线伪军多力弱,山多呼应难。我如能在东线歼敌一两个师,打开缺口,则西线敌人冒进,可能被停止,但也须设想敌进占汉城后侦知我西线正面力薄仍有继续前进逼我东线后退可能。

二、为防止上述不利情况发生,请令邓华集团^②在寻机歼敌部署中切忌仓促应战,如敌冒进,宁可让其深入,利我围歼,如敌不进,必须寻敌弱点,利我分割歼其一部。宋时轮兵团^③二十六军,应令其于二月十日夜赶到铁原、涟川线担任防守并掩护交通运输任务。韩先楚集团^④在汉江南岸支持至六日晚后,如敌前进不止,应在汉城北三八线布置抵抗阵地。杨得志兵团^⑤将

① 这是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回电,经毛泽东修改、补充。

②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他指挥志愿军第三十九、第四十二、第四十、第六十六军,简称邓华集团,拟在东线向原州、横城方面阻击敌人。

③ 宋时轮兵团即第九兵团,当时宋时轮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④ 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他指挥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和志愿军第五十、第三十八军,简称韩集团,在西线汉江南北地区进行防御。

⑤ 指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当时杨得志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

于二月十三日全部集结于安东、凤城线,请考虑使用该兵团对西线敌人如再越过三八线向平壤前进时的作战问题。对西海岸仁川至镇南浦之线的防卫,请令人民军严密注意。

三、如我出击受阻,西线敌人已向三八线逼近而我 在东 线已无战机可寻时,我邓华集团可以考虑放弃洪川、春川地区,将来再打。

军 委

二月四日二十时

中央军委关于作战方针及兵力部署 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①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四月二十六日电悉。

一、同意来电所拟作战方针及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的兵力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二、请注意在此次战役中对伪一师、美三师、二十五师、二十四师、土耳其旅及英二十八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两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三、关于敌军调动情况,我们只知美军四十师、四十五师先后在日本北海道登陆,友方谍息则云美军两个师已到日本,还有两个师在运日途中,故不知美国已有四个师或六个师到达日本。

^① 这是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经毛泽东修改、补充。

现东京二十五日既有四个美师抵日的消息,已令作战部、情报部与新华社集中注意力分别收听日、美、蒋、李四方面广播和电讯,以便弄清情况及时电告你们。

四、从此次敌人且战且退及在此之前的沿海袭扰的情况看来,敌人确有诱我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但我主力如停在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而只以一个兵团及人民军向南进逼,估计敌人在未得到大量补充(估计五月份将有一批新兵)或援兵(即运日的部队)能使用以前,还会有一个犹豫时间而仍然与我们进行拉锯战,企图消耗我们。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对我们并无不利,只要我们避免主力消耗,转而消耗和分散敌人,则推迟敌人登陆或向北进攻,使我完成各种准备,倒是合乎理想的。不过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陷被动。敌人如果沿南汉江集结,我三十九军、四十军可即北调成川、沙里院地区,不再南进,以利元山、镇南浦之线的东西策应。

五、修熙川至杨德公路,西南工兵团已从东北派出,尚需何种器材及帮助,望速查办。龟城径球场至德川修通铁路事,因中间须凿通若干山洞,短时间万难修成。但我们仍令铁道部派员前往勘察,切实计算究需多长时间和多少器材,好订具体计划。

六、关于加速空军作战准备及各兵种协同作战问题,请与刘亚楼、陈锡联、许光达^①面谈后给以指示。关于后勤问题,尤望将前方意见面告杨立三、张令彬^②速谋改善,此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军 委

四月二十八日

① 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许光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

② 杨立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张令彬,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关于持久作战方针和 今后作战的指导原则^①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彭 德 怀

一 五次战役的基本总结

五次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汉江,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二十几万,其中美军伤亡十万至十四万人。这不仅大量消耗了美帝的人力、物力,而且使美军士气降低至一定程度,因而引起美帝内部及各帝国主义间的争吵与混乱,促进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斗争的积极性。同时,朝鲜人民军和我们取得了同现代化军队作战的经验,提高了军事水平,增进了朝鲜和我国的国防力量,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

但由于我们在作战指导上犯有若干错误,部队干部军事水平一般不高,缺乏同现代化敌人作战的经验;敌人拥有装备的优势,严重限制了我军的机动;加上朝鲜三面环海,地形狭长,因而在五次作战中,虽已取得伟大胜利,但未能更多地歼灭美帝的有生力量。

二 持久作战方针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规定,目前朝鲜战争不能速胜,而必须采

^① 这是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根据即将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取持久作战的方针。

1. 敌人装备优势。

2. 美英军的士气还未低落到应有的程度。

3. 朝鲜三面环海,海防不强;中间道路少,公路铁路多靠海岸线,在敌海空军威力圈内;地形又不便于大部队高度机动。

4. 朝鲜物产有限,我军不能就地补给,必须由国内经长距离供应,特别是越南进运输线越长,困难越多。

5. 朝鲜群众工作尚未深入,地方群众性武装尚未建立;特务、反革命在内地到处活动,不仅容易暴露我军行动,且必须分兵控制,巩固后方。

6. 我军参加朝鲜战争是被迫仓促应战,装备技术、运输工具、物资补给、后备兵力组训以及各种组织等,都缺乏应有的准备。

7. 我们部队干部军事水平一般不高,必须亲自经历,才能逐渐积累经验,逐步提高,所以许多别人已犯过的错误总会重犯后才能纠正。

由于上述主客观条件的规定,并且经过了五次战役的证明,目前想一下消灭美英军几个师是不可能的。美英军主力不被歼灭时,朝鲜战争的结束是很困难的。因此,必须给敌人以相当的消耗削弱,争取时间加速我军的必要准备,以逐渐改变主客观情况,而后才能大量歼灭敌人。因此,朝鲜战争不可能速胜而必须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

三 今后作战的指导原则

1. 有阵地地稳步前进,不要冒进。

2. 不断轮番,各个歼敌。

3. 反复拉锯,逐渐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4. 做好必要的准备再战,不打仓促无准备的仗。
5. 由小敌小打,争取逐渐发展到大打。
6. 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有重点地钳击敌人。
7. 机动灵活,量力而行。
8. 攻防密切结合,双管齐下。
9. 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斗上的速决战。
10.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
11. 大力开展敌军工作,切实作好瓦解美伪军的政治工作。

四 朝鲜战争发展的前途

1. 由于美帝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与世界人民为敌的,而朝鲜人民与我们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代表人民愿望的,这个战争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个战争发展的全部规律。

2. 敌军士气虽尚未低落到应有的程度,但由于所进行的战争本质是侵略性的,无论任何欺骗压制,它的士气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在我们继续打击消耗敌人,加紧对敌瓦解工作,以及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下,必将使敌军士气加速降低下去。

另一方面,我们和朝鲜人民军目前虽遇到一些可以克服而

建设步兵随伴炮兵,增加高射火器、自动火器,加强运输工具,提高技术,以及改进后勤工作,保证部队必要的适时供应等,必将可更迅速地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4. 美帝国主义侵略战线太长太宽,被迫兵力分散,因而人力物力日益陷于困难,特别是它的侵略野心同它的实际力量是很不相称的。这种情况从下面事例可以表现出来:

① 六月一日美国政府训令美国代表奥斯汀^①通知联合国,声明由于“美国全部可用的军事力量现在都钳制在朝鲜和西欧”,目前不能为计划中的联合国“集体安全部队”提供任何军队。

外电评论称:这一事件证明“号称‘强大的’美国军事机器的精体已被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摧毁。”

② 塔夫脱^②曾宣布,如果美国国防预算超过七百亿,那就是冒极大的危险。可是华盛顿六月八日电,接近杜鲁门^③的人上说:“美国国防预算日前达每年六百亿美元,但并未包括朝鲜战费在内。”而“朝鲜战争预算就需一百亿至一百五十亿美元,甚至需二百亿美元。”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刊论文:“美国在侵朝战争中损失的人员和金钱已比一九四二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所损失的还要大。”“一年内死伤总数已达七万多人(此数已被大大缩减),而对日战争第一年只死伤五万七千人。”“花费的金钱比太平洋战争的一年所花费的多一倍。目前已运往朝鲜的军事装备一千五百万吨,而一九四二年送往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装备仅为六百五十万吨。”

① 奥斯汀,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

② 塔夫脱,当时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③ 杜鲁门,当时任美国总统。

③ 朝鲜战争已经把美国推到不可救药的危机之中。杜鲁门六月十三日广播，将继续采取“管制”办法以抑制日益加深的通货膨胀。并且指出，将进一步“增加捐税”，剥削人民。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一九五一年每一个美国人民所负担的战争支出已达三百美元，比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一百倍。

而我军则拥有大量的后备力量，足够的必需的物资供应（当然由于我们开国不久，各种潜在的资源尚待开发），这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

5. 从过去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打一次败仗，就引起美国内部和各帝国主义间的一次争吵与混乱。这种争吵与混乱，一次比一次厉害。美帝国主义陷入长期的消耗战，败仗将日益加多和加大，美帝内部矛盾就必然日益扩大且加深起来。特别是美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斗争，必将随着战争的持久而日益发展扩大起来。这就将使美帝侵略集团不仅在国际间日益孤立，而且在美国亦必然日益孤立。如最反动的麦克阿瑟①也不得不声言，中国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是不可能战胜的；承认美国的侵略战争“并没有使他们遭受致命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却在遭受重大的损失”。魏德迈②哀鸣，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原来支持美帝的一小撮国家，越来越不肯“卖力”了。国内人民的和平运动已变得更有组织了，如东部各州本月内就要举行五百个集会，纽约从六月十五至二十日要举行一百个集会，另纽约州将举行二百个集会。

相反，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每打一次胜仗，就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和平民主斗争向前发展，国际声援加大，国内人民情绪高涨，

① 麦克阿瑟，当时任盟国驻日占领总司令，侵略“联合国军”总司令。由于美国侵略军在朝鲜遭严重挫折，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被免职。

② 魏德迈，当时任美军第六军军长。

因而支援战争更加积极。

6. 一、二、三、四、五次战役经验证明,我们虽然是在缺乏各种应有和可能的准备情况下,被迫仓促应战,虽然是初次出国;缺乏以劣势装备对现代化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但却能够亲密配合人民军作战,把美英帝国主义从鸭绿江打退到汉江,消灭敌人二十几万,奠定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今后主客观条件的发展日益对我有利,我们要进一步坚持努力,艰苦奋斗,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7. 从上面各种事实和分析,朝鲜战争的必然胜利可说是已成定局了,但实现这个伟大的胜利不是唾手可得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帝国主义虽已是腐朽的、垂死的制度,它必然要走进坟墓,但是它决不会自己走进去,而必然要做疯狂的垂死的挣扎。从当前来看,美帝这个野兽虽在战场上负了重伤,但是,它反咬我们几口的力气仍然是有的,而且它阴险狡诈,随时都准备狠狠地咬我们几口。所以,我们无论从长远的对帝国主义斗争,或是从当前的对帝国主义战争来讲,不经过艰苦复杂、持久顽强的斗争,要想坐等胜利,或随便就可胜利,是完全错误的,是幼稚无知的。特别是如果不百倍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和甜言蜜语,是会上帝国主义的当的。只有我们具有最大的勇气和毅力,高度的机智和灵活,熬得过最艰苦、最困难的过程,并能寻找有利时机给这个负伤的野兽以惨重的打击,才会使它知难而退,偃旗息鼓。到那时,最后胜利才会到来,和平才有保障。

关于同敌方代表准备和实行 谈判期间我军部署致彭德怀等电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

毛 泽 东

德怀、高岗同志，并金日成同志：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十天到十四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

(一) 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十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

(二) 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三) 杨成武^①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

(四) 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毛 泽 东

七月二日二十四时

^① 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关于和谈致李克农、邓华、解方 并毛泽东电(摘要)^①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

彭 德 怀

和谈中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状态。除此以外，其它（如交换俘虏等）属枝节或技术性问题。关于枝节或技术性问题，我不应过于拘谨，免陷被动。

我方坚持基本原则问题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是取得对方士兵及和平人民普遍同情与拥护的；是可以打击美、英军战斗意志的；是可以教育人民，孤立美帝和逐渐分化其所谓联合国阵营的；也就是配合（或叫协同）朝鲜战争取得胜利的最迫切的工作；也就是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向侵略集团采取攻势的严重任务。如此做法，可能使美帝国主义者完全陷于被动。如果没有和平攻势（和谈）的政治斗争，只有单纯的军事斗争，要想迅速孤立美国，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

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提早结束战争，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但和谈并不一定是顺利的，可能遇着很多困难，甚至曲折过程，可能还需要经过严重的军事斗争。再有两三次较大的军事胜利，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不管在谈判中有多少困难，坚持和蔼的说理的态度，使破裂责任归之于对方。

① 根据《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题目为编者所加。

抗美援朝战略决策和 作战方针的考察

王 建 华

战争胜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作战方针和战略决策却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其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在于党中央、毛泽东能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朝鲜战争的实际出发，适时地做出一系列正确决策，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而迅速地扭转了陷于危机的战局，经过持久的斗争，终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在世界现代战争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密切注视朝鲜战争的发展，适时做好参战的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平民主阵营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阵营则到处镇压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美帝国主义想称霸世界，到处干涉别国内政，在朝鲜支持南朝鲜李承晚傀儡政权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企图。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为首的劳动党、共和国政府领导下，进行了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朝鲜人民军很快突破“三八线”^①，28日解放汉城，使李伪军受到沉重打击。美国怕它扶

^① 三八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线作为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的南北分界线。朝鲜战争爆发前，三八线以北地区出现了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权；以南地区，在美国扶植下，出现了李承晚集团统治的所谓大韩民国政权。

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垮台,造成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迫不及待地进行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武装干涉;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海、空军支援伪军作战;27日,杜鲁门又发表武装干涉朝鲜内政、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迫使它的一些成员国追随美国出兵侵略朝鲜;30日,美驻日本的陆军受命侵朝;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非法决议,授权美国委派指挥官,打起“联合国军”的旗号,统一指挥侵朝的各国军队^①。这些都表明了朝鲜战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极为关注,一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霸占我台湾后,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美国不会轻易退出朝鲜和亚洲,战争将可能扩大。为防患于未然,我国从各方面作了应变的准备。

6月28日,毛泽东针对美国的侵略行径和杜鲁门的声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正地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②。同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驳斥杜鲁门27日的声明。随后于7月中旬,在全国开展了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以肃清一些人的崇美、恐美思想。同时,抽调了四个步兵军,三个炮兵师及一部分高炮,工兵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进行战备训练。8月初,正当人民军将敌人赶到洛东江

① 派兵参加侵略朝鲜战争的国家,除美国外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加拿大、泰国、法国、土耳其、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卢森堡等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只是象征性地派了点部队。

② 《朝鲜问题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4年7月第1版,第134页。

以东，解放了南朝鲜 90% 土地时，党中央便分析了朝鲜战争发展的几种可能性和必要时派志愿军支援的问题。8 月下旬，当人民军在大丘、釜山与敌人形成胶着状态，敌人将进行疯狂反扑的迹象已经明显时，我中央军委决定：调第 9、第 19 兵团作为二线机动兵团；组建四个飞行团、三个装甲旅、十九个高炮团和十个步兵军的队属炮兵，以加快特种兵的建设。同时，检查和讨论了边防军的准备工作。9 月初，将第 50 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调整了沿海和东北防空兵力的部署，搬迁和转移了东北的部分工厂和战略物资。这些都为志愿军赴朝参战作了准备，当敌人打到中朝边境时，党中央镇定自若地处置了这一突发性的事变。

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祖国的安全，志愿军入朝作战

9 月 15 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人民军被迫战略退却。29 日，美军进至三八线附近，准备继续北犯。在此紧急时刻，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及时地向美国发出警告。30 日，他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国庆一周年会上郑重地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①10 月 3 日，周恩来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向美国提出严重警告，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军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疯狂的侵略者，错误地估计中国人民的决心与力量，认为我国出兵的时机已经错过，现在的警告是虚张声势的恫吓，因而一意孤行，执意北犯，企图武力征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 月 1 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使南朝鲜伪军越过三八线。2 日，

^① 《朝鲜问题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83 页。

他给“联合国军”所属部队下达进犯三八线的命令。9日,美军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在广播中叫嚣,要人民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在“联合国军”占领下组织朝鲜统一政府的提案。15日,杜鲁门在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接见麦克阿瑟,讨论朝鲜战争最后阶段的安排问题。麦克阿瑟得意地向杜鲁门说:“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每年11月第4周的星期四,1950年为11月23日——笔者注)前结束。”^①杜鲁门当即授予麦克阿瑟一枚橡树叶勋章,以表彰他侵朝的“功绩”。

杜、麦会晤后,敌人更加疯狂地进犯。10月19日,侵朝敌军占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后,便分兵多路沿交通线向中朝边境急进。一些战争狂人叫嚣“鸭绿江边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②同时更加频繁地出动飞机轰炸我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村庄,炮击我海关村,我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朝鲜战局处于急转直下的境况时,毛泽东于10月1日接到金日成代表朝鲜人民要求我国出兵支援朝鲜的电报。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经过连日反复研讨,认为我国虽然面临着很多困难,但从和平民主阵营的全局利益和我国长远利益出发,为了拯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中国人民应当不惜作出民族牺牲。会议毅然作出的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军队作战,援助朝鲜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第1版,第428、429页。

② 转引《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6页。

同志的战略决策，并且指出“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①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极其英明的。

三、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是制定志愿军战略方针的根本原则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主要作战对手是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军队，它拥有绝对优势的空军和海军，陆军的装备也高度现代化。志愿军只有以步兵为主的陆军。装备的优劣悬殊很大。志愿军虽然兵力雄厚，但在朝鲜狭长的半岛上作战，回旋余地不大，不便开辟若干战场来分散敌人兵力，而且没有空、海军的掩护，反而要分散我一部分兵力兼顾侧后，以防敌人的登陆。因此，志愿军战略方针是先利用山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在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如敌人来攻，则在阵地前分割歼灭之。待苏联武器到达并装备训练起来后，再配合人民军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这是一个稳妥可靠的方针。

10月19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入朝作战。志愿军入朝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敌军已占领平壤，并错误地认为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已不复存在，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很小，于是分兵放肆地沿交通线进犯。因此，我志愿军已不能先敌到达预定地区组织防御，但这却给志愿军一个歼敌良机。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反攻，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21日3时半，他电示志愿军领导：“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556页。

题”。^① 志愿军首长据此按运动战的打法进行部署，25 日在两水洞与敌人预期遭遇，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经过十二昼夜的激战，歼灭 1.5 万多人，将敌军赶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战局，胜利结束第一次战役。随后按照“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新的战略方针，连续进行了四个战役。到 1951 年 6 月 10 日为止，经过五个战役，共歼灭敌人 23 万，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完全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局面。五大战役的胜利表明，抗美援朝战争的指导者能审时度势地根据战争的实际变化，不失时机地抓住战机，改变战略方针，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敢于去夺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四、坚持持久作战，逐步改善我军装备，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是志愿军的作战指导方针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有战胜敌人的许多条件，但由于敌我之间武器装备优劣相差悬殊，成为我军难以速胜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志愿军出国时拟先防御后反攻，就是个持久胜敌的方针。赴朝后，乘敌之隙，接连打了五个战役，虽然扭转了战局，但歼敌不多，力量对比仅趋于平衡。在战役中明显暴露出我装备落后，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并很快战胜敌人的弱点。往往由于我军后勤供应不上，火力不强，突破敌人阵地后不能扩大战果，而包围了的敌人如不能及时解决战斗，只好让其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逃走。反过来，敌人可以依靠它补充快、机动快的优势，进行反扑，致使我军得不到较长时间的休整。在第四、第五次战役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因素决定了朝鲜战争的长期性。所以，第四次战役开始后不久，中央军委于 1951 年 2 月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77 页。

9日作出了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3月1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按：指第四次战役——笔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①

中国人民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粉碎了敌人不让我休整的企图，同时使更多的部队得到了实战锻炼的机会。轮换下来的部队，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休整补充，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新轮换上去的部队，物资充实，装备齐全，士气旺盛，这样，我志愿军在前线始终对敌保持着战斗力强、数量优势的部队，敌人对我无可奈何，不敢轻举妄动。

持久作战，对美国非常不利。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现在把大量的兵力长期陷在亚洲的朝鲜战场上，必然削弱它在欧洲与苏联抗衡的力量。它的欧洲盟友对此也极为不满。那时，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投入了1/3的陆军，1/5的空军，将近1/2的海军。同中朝人民军队经过六七个月的较量，结果伤亡10万余人，耗去军费100多亿美元，而且看不到有任何胜利的希望。美国当局有鉴于此，在5月16日不得不作出“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最后决策”。6月初，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向我方表示了这个意图。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鉴于第四、第五次战役，战线在三八线上反复拉锯，敌我力量趋于平衡，敌人妄图把我打回鸭绿江已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49页。

不可能，而我军装备在没有大改善前，要消灭敌人重兵集团，把敌人赶下海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敌人有谈判的意向，于是作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的战略指导方针。

在这个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美国命令其“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 6 月 30 日正式发表愿意举行停战谈判的声明后，中朝双方复电表示同意。经过磋商，停战谈判于 7 月 10 日正式开始。与此同时，我志愿军的军事战略也转变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一方面积极备战，改善供应和装备，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体系，以粉碎敌人可能的进攻；另一方面，以各种防御的积极手段，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迫敌知难而退，结束战争。

在转入停战谈判后，我方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积极的军事斗争作为谈判的后盾。敌人无理提出，他们拥有海、空军优势，在划军事分界线时，要多划去我方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补偿。被我方拒绝后，便发动了夏季和秋季攻势。结果付出了 15.7 万人被歼灭的代价，一无所得，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具体地实行了“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歼灭战的作战原则，积小胜为大胜，并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在粉碎敌人夏秋季攻势后，我志愿军为配合谈判，向敌人发动秋季有限目的的进攻和在西海岸的攻占岛屿作战，结果又歼灭敌军万余人。到 1952 年秋季，我志愿军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工事体系形成，便有计划地对敌人发动秋季战术性反击，从 9 月 18 日开始，历时 44 天，歼敌 2.7 万人。毛泽东对这种打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

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志愿军各方面的作战条件都有了相当的改善，1953年夏季将过去对敌人的战术性反击扩大为战役性反击。从5月13日至7月27日，连续对敌人进行了三次反击。特别是第三次反击中的金城战役，在敌人四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上，我志愿军集中了五个军24万人，千多门大炮，经过20多分钟的火力准备，发射炮弹1900吨，一小时内全部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这一战役充分显示了经过持久作战、敌我力量对比变化的程度。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人，连同前两次反击，整个夏季反击战役歼敌12.3万人。这些有力的军事斗争，迫使“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复信表示，今后“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②终于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书上签字，从此结束了历时两年多的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表明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艰难困苦和民族牺牲，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保卫了祖国安全，捍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维护了东方与世界和平以及和平民主阵营的利益、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其次，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全面实现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第三，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了高度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敌人，初步取得了现代条件下战争的作战经验，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70页。

② 转引《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30页。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腐蚀 的文献选载^①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月)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坚决进行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各中央局，并请转发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军区，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

兹将高岗^②同志于本年 11 月 1 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中 央

1951年 11 月 20 日

① 这组文电中署名中央的电报，都是毛泽东起草的。文电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②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邓小平^①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并请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

(一) 你于 11 月 25 日给我们的电报以及早已送来的 1952 年工作要点，均收到了，你们的方针和部署均好，我们均同意。除早已将西南局 1952 年工作要点转发你们参考外，现又将小平此电转发你们参考。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②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中 央

1951年 11 月 30 日

①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② 即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确定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方针。

必须严重注意干部 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 1951 年 11 月 29 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中 央

11 月 30 日

切实执行七届二中全会 防腐蚀的决议^①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 1949 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

^①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的四段话，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一决定稿时加写和改写的。

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①,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后来于1952年4月2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公布。惩治浪费的条例后来没有正式制定。有关对浪费问题的处理方针、原则和办法,在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发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作了明确的规定。

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

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华东局、福建省委，并告各中央局，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福建省委办公厅 12 月 7 日 15 时电，询问可否将中央 12 月 4 日发来之北京市委反贪污运动报告和中央的批示以绝密文件印发至县委，以便统一展开反贪污运动和统一执行关于反贪污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制度等语，兹答复如下：（一）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这是半公开的文件，不是“绝密文件”。（二）中央于 12 月 4 日转发的北京市委报告，12 月 5 日转发的中央贸易部党组报告，12 月 7 日转发的中央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中央轻工业部、中央水利部等各党组报告，以及尔后转发的各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一概照上条办理。（三）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这点已

在中央 12 月 4 日指示中说清楚了。(四)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以上各点，请加注意。

中 央

1951 年 12 月 8 日

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展开反贪污、 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毛 泽 东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传各级军区直至团级，志愿军党委。

(一) 兹将华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这是军事系统在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下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第二件。第一件是装

甲司令部许光达^①等的报告,已发给你们了。(二)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毛泽东

1951年12月11日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要形成 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请各中央局转发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南局12月13日关于在西南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请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使科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机会阅读。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象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西南局所规定的六项

^① 许光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

办法，也是正确的。

中 央

12 月 17 日

加强党对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统一领导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 1951 年 12 月 20 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

中 央

1951 年 12 月 22 日

对压制群众批评的负责干部 要敢于揭露和惩处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 央

12 月 22 日

各级领导都要亲自“上前线”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西南军区党委会 12 月 27 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

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①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各大军区都应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1月份应发4次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此电和西南军区的一周简报均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使广大干部能够看到,越快越好。

毛 泽 东

1951年12月30日下午4时

^① 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和建国初期的 反腐败斗争

汪 裕 尧

1951 年底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展开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三反”)的斗争,是建国初期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一场严重斗争。这场斗争,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它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一批腐化分子,教育挽救了一批干部。影响所及,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荡涤,整个社会风气曾为之一新。

前面刊载的毛泽东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 10 份文电,基本上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历史面貌,阐明了斗争的重大意义,概括了我们党指导这一斗争的方针政策 and 主要经验。它们虽然都是 30 多年以前写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一)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发生在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两年之后,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我们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也由于我国经济落后,私人资本

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而在全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尽可能发挥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因素。但是，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不法分子，唯利是图，对国家的限制必然要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这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成为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与此相联系，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往往采用请客、送礼、行贿、入股，直至施用美人计等方式，向手中握有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进攻，把他们拉过去为自己服务，因而必然要发生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建国初期进行的这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

对于全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会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我们袭击这一点，党中央是预料到的。早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干部经受住了胜利的考验，继续保持了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我们队伍中的

一些不坚定分子,进城以后,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和引诱下,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感染下,渐渐地忘乎所以,陷进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同时,随着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旧社会沾染的恶习和影响,还没有来得及改造,这是国家工作人员中发生贪污浪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加之建国之初,百废待举,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繁重,有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建立或者还很不健全,这也使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有可乘之隙。

(二)

同国家工作人员中贪污受贿等错误行为作斗争,并不是从“三反”时才开始的。建国以后,我们党对这方面的问题即时有发现,并作了必要的处理。但在前两年只是零打碎敲地解决问题,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因而没有能起到应有的威慑和教育作用。

1951年9月,东北地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干部中的严重贪污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严重注意。同年10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斗争的决策。此后,毛泽东于11月下旬以中央名义先后批转了东北、西南、华北三个中央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地“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1日,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审阅这一决定时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这个决定下达后,即开

始了“三反”斗争的全面发动。

为了推动“三反”斗争的展开,在决定下达的一个月时间内,就以中央名义下达了4个指示,批转了37个报告。这些文电,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特别是反贪污的斗争。12月31日,中央委托薄一波、安子文等出席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的有50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当场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于1952年1月上旬,所属一切单位的领导干部务须发动群众实行坦白检举,否则一律撤职查办。在这次会议上点名表扬了做得好的单位,也批评了做得差的单位,并撤职查办了几名高级干部。这次会议在中央机关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单位领导干部回去连夜开会部署。第二天,在1952年元旦的团拜会上,毛泽东又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一天,很多部长、副部长都没有休息,团拜会一结束就回机关,抓紧时间发动群众。到1月3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大会。1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向各地通报了中央机关发动“三反”斗争的情况,要求各地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此后,“三反”斗争进入高潮,在地方专区以上、部队团级以上机关都普遍开展了起来。

“三反”斗争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表明,党和国家机关内大的贪污案件往往是同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违法活动相联系的,大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同社会上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勾结起来干的。为了把“三反”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需要内外夹攻,在工商界中同时进行反对各种违法活动的斗争。因此,中央于1952年1月26日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

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央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是大中城市,团结工人阶级、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从2月上旬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包括省城)广阔的“五反”斗争的有力配合下,“三反”斗争进一步迅速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这次“三反”斗争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发动群众阶段、“打虎”阶段、定案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为了指导这场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建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委领导“三反”斗争的办事机构。从2月上旬开始,不少单位结束了第一阶段,即发动群众阶段,先后进入揭发、批判和斗争贪污分子的“打虎”阶段。在第二阶段,从北京开始,各大行政区都先后举行了审判大贪污犯的公审大会,给了贪污分子有力的打击,同时使人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正气大伸,邪气大降。随着斗争的深入,犯有贪污、浪费等错误的人员的定案处理问题提上了日程。为此,中央于3月6日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3月8日,政务会议批准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同时还批准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于是“三反”斗争陆续转入第三阶段,即核定定案处理阶段。当时由于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为了不误农时,中央决定县区乡三级机关的“三反”斗争推迟到秋后结合农村整党进行。从全国范围看,已经开展“三反”斗争的单位,到5月底为止,处理阶段已经或者即将结束,有的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进入建设阶段。同年10月25日,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问题的报告,历时11个月的“三反”斗争正式宣告结束。城

市的“五反”斗争,也大体在这个时候宣告基本结束。

(三)

毛泽东在领导“三反”斗争的过程中,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决心和巨大魄力,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洞察力和领导艺术。他在斗争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和总结的主要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 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腐蚀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前面说到,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唤起全党的注意。在东北地区揭露出干部大批贪污的问题以后,他敏锐地看到了资产阶级腐蚀对于革命队伍的巨大危险性,决定随即发动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强调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毛泽东在问题刚刚暴露的时候就尖锐地向全党提出,并把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作为全党的一件大事来抓,这是很有远见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2年2月3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相结合》的指示,进一步指出,“三反”斗争是一个更加深刻更加现实的整党运动,不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党内存在的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就不能被彻底揭露并得到应有的惩处,广大的党员、干部就不能从中受到应有的教育,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就不能得到认真的清理和有效的克服。因此,

中央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在“三反”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干部作一次认真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很不称职的人的领导职务,大胆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使“三反”斗争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践证明,把反对资产阶级腐蚀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它对 50 年代成为建国以后我们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有着重要的作用。

(2) 反腐败斗争要从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领导干部抓起。毛泽东十分重视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三反”斗争中的作用,把它看作反腐败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发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他为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付出了很大精力。对于做得比较好的,及时进行表扬,并转发他们的经验,号召大家学习。他先后多次批转了西南局的报告,肯定邓小平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正确意见;赞扬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上前线”指挥“三反”斗争;支持武汉市委坚决撤销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领导干部的职务;他还推广了天津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带头作自我批评,放手发动群众,使斗争迅即展开,领导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经验。凡此等等,对于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推动“三反”斗争的展开都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他对行动比较迟缓、斗争抓得不力的领导干部,则进行严肃的批评和督促,甚至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前面说到的通过中直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限期发动群众打开斗争局面的做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对于那些因本身有严重问题阻碍斗争开展的领导干部,则坚决撤职查办,直至进行党纪国法的制裁,决不手软。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严重问题,不下这样的决心,是很难将群众发动起来打开局面的。

(3) 开展反腐蚀斗争一定要抓好典型的重大案件的处理。毛泽东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三反”斗争一开始,他就明确指出,对犯有贪污错误的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对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按照这个方针,各地在发动群众坦白检举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典型案件公开作了处理。首都北京和各大区、各省市的所在地,普遍开了公审大会,依法审判和处理了一批贪污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会以后,许多贪污分子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从宽处理。在这些案件中影响和震动最大的是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刘、张二人原是天津地委的两任书记,是30年代初入党、有20年左右革命历史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立下了功劳。但在全国胜利以后,经不起和平环境下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引诱,为了贪图个人享受,满足腐化生活的需要,竟凭借职权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工资和骗取银行贷款,总数达155亿元(旧币。下同,旧币1万元折合新币1元)之多。他们大量贪污后任意挥霍浪费,过着可耻的腐化生活,仅个人开支和送礼即达3亿多元。刘青山并吸食毒品竟至成瘾。刘青山、张子善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丧失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应有的品质,严重地违反党纪国法,终于受到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判处死刑的严厉惩处。这一重大案件,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过问下作出处理的,它既说明了资产阶级腐蚀干部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的坚强决心。在经历过“三反”斗争的人们中,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实践证明,抓住典型的重

大案件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影响大、震动大、教育意义也大。

(4) 反对资产阶级腐蚀要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个思想是西南局在 1951 年 12 月 13 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他们认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原因在于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毛泽东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建国初期的“三反”斗争就是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大规模的方式进行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采取这种方式,就不能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也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已经不必也不能采取过去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更不能象当年“打老虎”那样,从上向下压指标、摊任务(这样做,在当时也是不适当的,它助长了逼供信的现象,后来经过核实定案,这方面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纠正,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反对资产阶级腐蚀,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是集中搞一二次运动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我们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包括以法律为武器与之进行斗争,并且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才能奏效。但是,在适当时候,集中抓一下,造成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动员群众群起而攻之,还是取得了显著效果的。

(5) 反贪污要同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往往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所以反对浪费必须同反对贪污同时进行。一些单位开展“三反”斗争的经验表明,从浪费现象中往往可以发现贪污现象,因此反浪费的斗争又有助于反贪污斗争的进行。而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的展开和深入,必然会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的官僚主

义和自由主义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因此,在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所在单位发生严重贪污或浪费现象,而事先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的严重官僚主义者,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贷。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主张,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来,在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党中央从新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多次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纠正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以后,这个问题被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年初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中央一级机关 8000 人干部大会,要求中央机关在这方面做表率。几个月来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中央对几起大案的严肃处理,以及对不正之风所作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受到了群众的拥护。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同建国初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当时以“三反”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所提供的经验,对于我们是有不少可供借鉴的。

关于粮、棉、油统购统销的 文献选载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九五四年七月)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 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一

过去几年,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改革,从封建势力的枷锁下,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全国农业经济恢复较快,连续了几年的丰收,并在粮食供应方面做了许多有效的工作,从而使粮食生产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粮食贸易由解放前的大量入口转变为停止入口并可以小量出口,同时保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但是由于城市和工业的需要逐年增大,人民生活逐年提高,食用量增多,特别是由于粮食自由市场的存在和粮食投机商人的捣乱,使农村中的余粮户,贮存观望,等待高价,不愿迅速出卖粮食,反映到供销上面,则是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按期完成,粮食销售却远远超出计划,造成供销不平衡,市场紧张。这种情况,直到今年秋天之后,

仍在发展。截至目前为止,全国的购销情况是:有的不能完成收购计划,有的虽然完成了收购计划,但销售数字却大大超过销售计划。这说明了粮食问题的极大严重性。如果不设法加以解决,那么在粮食战线上,不久就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严重的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以至形成牵动全面的物价波动,影响整个的国家建设计划。必须指出,现在全国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虽落后于粮食需要的增长速度,但是只要调度得法和措施得当,还是够吃够用,且能略有积余的。现在在供销方面所表现的紧张性,其本质是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所以粮食问题不是采取枝节的办法所能解决的,而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成为全党当前极端迫切的任务。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把粮食供应放在长期稳固的基础之上,除了努力促进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化和技术改良,借以增产粮食,把粮食生产发展的速度,逐步提高到足以保证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水平外,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如下的措施:

(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

(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亦即是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的政策;

(三)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控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

(四)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上述四项政策,除少数偏僻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必须全国各地同时实行。上述四项政策,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能控制市场的销量;只实行

计划供应,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而如果不由国家严格地控制粮食市场,和由中央实行统一的管理,就不可能对付自由市场和投机商人,且将由于人为的粮食山头的相互独立,给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捣乱机会,结果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亦将无法实现。

实行上述政策,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加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

根据概略的计算,目前每年国家必需掌握着七百亿斤的商品粮,才能有把握地控制粮食市场,满足城市人民和乡村缺粮人民的需要。故除了全国农业税收的粮食部分二百七十五亿余斤之外,还须向农民计划收购四百三十一亿余斤。这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由于过去三年的丰收,农民手中存有若干余粮;一九五三年年成不坏,粮食总产量相当于一九五二年;而就农民拿出的粮食数字来说,一九五二年农民缴纳国家的公粮和卖给国家及私商的粮食,共约为六百七十亿斤左右,一九五三年实行计划收购,农民要拿出的粮食,所多不过三十余亿斤,所以说这是可能的。

但是,粮食的计划收购(统购)是涉及到广大农民,首先是广大中农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它不但会遇到投机商人的抵抗,遇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且如果工作做得不够,还会遭受到

一部分余粮户的反对。因此,在实行计划收购时,(一)统购价格必须合理。国家所定的统购价格,在大体维持现有的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在此原则下,全国各地的秋粮统购价格将大体维持目前的收购牌价,只有对于某些大区之间的毗邻地点和其他个别地点的粮价定得不合理者,才予调整。目前统购牌价尚未颁布,各地的收购牌价,不得大区批准,一律不准提高。(二)统购价格及统购粮种,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杂粮是否实行统购及统购品种,亦由中央规定,以便于合理地规定地区差价和调节品种比价,消除粮食投机的可能。(三)统购价格必须固定,以克服农民存粮看涨的心理。在既定的收购数字和收购价格下,农民可以分期交粮,分期取款;可以一次交粮,一次取款;也可以一次交粮,分期取款,而在后一种场合,可由银行给予较为优厚的利息。以上办法可根据地方情形,酌情采用。(四)实行统购同时,必须加强农村的物资供应,加强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使农民出卖粮食所得之现款,能够买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物资,以便利农民。(五)统购面宜于稍大,不宜过小,才利于完成统购的任务。(六)实行统购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并须采取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和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的办法。在乡一级应将控制数字公布,使群众心中有数。(七)粮食入仓的运输,适用公粮入仓的运输办法。(八)为了帮助贫农解除困难,避免购粮资金的投放过分集中,应在一九五四年考虑实行粮食预购的办法。

应该指出,国家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只是不利于奸商,不利于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粮食投机者和剥削者,不利于农民中那种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而对于所有农民,包括余粮户在内,都是有利的。这不仅因为农民得到了合理的粮价,得到了物价稳定的好处,更主要的是因为国家和粮食投机商以及农民的资本

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的结果,使农民摆脱投机者的操纵和剥削,并将加快地促进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觉悟,因而就可能加快地促进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而农民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最后地解除自己的贫困,过着一年一年富裕起来的生活,才能使商品粮大量增加,供应城乡人民的需要。把道理向农民讲清楚,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因此可以说,实行计划收购,不仅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而且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工农联盟,而且会加强工农联盟,不仅不会妨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工作做好了,可以更大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

我们的计划供应(统销),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配给制度,更不同于日本占领时代的配给制度,因为我们的供应是足量的,粮食品种是合乎人民健康需要的,而我们供应的范围不但是保障县以上城市,而且包括集镇,包括缺粮的经济作物区,包括农村人口中大约十分之一左右的缺粮户和每年都有的灾区粮食的供应。这就是说,我们保证供应的人口,仅在农村,即近一亿,加上城市,总数接近两亿。由于实行计划供应,这两万万城乡人民可以不受奸商的剥削,吃到所需的合理价格的粮食。所以,这是一个对于广大人民极共有的措施。

实行计划供应,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同计划收购一样,是一项没有经验的新的工作,一时还不可能订出一个统一完善的制度,所以在城市开始实行时,只能规定一些简便易行的办法,只能由简到繁,由宽到严,对有组织的群众,可通过其组织,对一般市民,可暂凭户口簿购买。在集镇、经济作物区、灾区及一般

农村,对于缺粮户,则亦应采取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和由群众民主评议的办法,使真正的缺粮户能够买到所需要的粮食,而又能够控制粮食的销量。对于旅店、熟食业、食品工业等,则按过去一定时期的平均实销量,定额给予供应,不许自行采购。以上具体办法,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计划供应中,粮食品种的调剂,将成为十分重要的工作。对于主要城市和工矿区,给以适当数量的细粮,是必要的。但由于国家细粮产量不足,故须教育人民,有甚吃甚,吃得粗一些,以便于全国的统一调度和搭配。粮食加工必须提高纯度,降低精度,以节约粮食。这样作对人民的健康是有益无害的。总之 粮食计划供应能够更加有效地保障城乡人民的粮食需要,保障国家的建设,能够更加保证粮食价格的稳定和一般物价的平稳;而实行的结果,和计划收购一样,受到打击的也只是粮食投机商人,因此这一措施是会取得广大城乡人民的拥护的。但也必须看到,供应开始,人民一下还不习惯,有的还可能有所顾虑,品种供应上不可能尽如人意,可能招致部分群众的不满,对于这些,需要我们在实行的过程中,找出更好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和做充分的宣传教育工作。

为了实行计划供应,在城市和集镇上必须适当配置供应粮食的国营粮店、合作社或代销店,目前尚无此项供应机构者,应在实行计划供应之前配置完毕。

四

为了保证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的实施,必须实行粮食市场的严格管理,必须将粮食市场掌握在国家手里,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因此:(一)一切有关粮食经营和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经营的商店和工厂,必须统一归当地

粮食机关领导,使事权专一集中。(二)对于私营粮商,必须采取严格的管制办法,所有私营粮店,一律不许自由经营粮食,但可以在国家严格监督下,由国家粮食机关委托办理代国家销售粮食的业务,即只能起代销店的作用。小杂粮亦由国家经营,在国营尚未准备就绪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在有监督的条件下,可以暂时允许一部分粮商加以经营。(三)所有私营加工厂,一律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加工,或介绍给合法消费户按照国家规定的精度从事加工,不得自购原料,自销成品。(四)一切非粮食商禁止跨行跨业兼营粮食。(五)城郊农民运粮进城出售,由国家商店和合作社收购,不许私商购粮牟利。(六)在城市,居民消费量有余和不足间的调节,不同习惯不同粮种需要间的调节,可到指定的国家商店及合作社或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卖出和买入(代销店不得经营此项业务);在农村,农民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之余粮,可以自由储存和自由使用,可以按照牌价,售给国家,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且完全可以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有无相通和自行交换。(七)为了切实管制粮商,取缔投机,各地应组织检查机构,进行经常的检查和监督;对于违犯国家法令的奸商,必须严肃处理。

五

为了保证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的实施,必须由中央实行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指挥与调度。所有方针政策的确立,所有收购量与供应量,收购标准与供应标准,收购价格与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地方则在既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下,因地制宜,分工负责,保障其实施。中央与地方的具体分工是:(一)粮食的收购和供应计划,由国家计划委

员会颁布控制数字,各大区根据控制数字和当地情况,制定计划报中央批准,然后按照计划,负责收购、供应和保管。(二)按照计划拨给大区供应的粮食,全部由各大区负责掌握调度。(三)除拨给各大区的粮食以外,其他粮食包括各大区间的调剂粮、出口粮、储备粮、全国机动粮、全国救灾粮等,统归中央统筹调度。(四)各大区如遇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中央负责解决。(五)中央认为必要和可能从地方调出一定数量粮食时,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的调度。(六)计划供应的标准,由大区提出方案,报中央批准。(七)中央统一规定若干大中城市及各大区间毗邻地点的粮价,大区和省根据中央所定的原则,规定其他城镇的粮价,报中央批准。

六

如上所述,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关系到每一个城乡人民,特别是关系到每个农民的大事,这个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巩固工农联盟,在一个重要方面把广大农民引向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而脱离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就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就可以大大地减少浪费,节约粮食,就可以把农村工作大大地推向前进一步;而如果做得不好,政策掌握不稳,动员说服工作做得不够,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会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挑拨下,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骚动事件,而尤其重要的,它将影响农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大吃大用随意损耗粮食的浪费现象。因此必须动员全党的力量,向广大人民,主要是向农民进行充分的工作,才能完成这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必须指出,实现这个政策的关键,在于教育党员和教育农民。在党员和农民群众还没有明瞭这个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的时候,是会在党内和在农民中遇到抵抗的。所以必须由上而下,首先在党内召集一系列的会议,向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讲通道理,然后通过他们,去向所有农民讲清道理。必须使他们懂得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懂得只有实行党在过渡时期中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即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引导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才能一步一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的产量,才能使所有农民真正脱离贫困的境地,而日益富裕起来,并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使他们懂得,只有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粮食政策,才能保证国家和人民的粮食供应,才能稳定物价,保障经济建设,才能打击粮食的投机奸商和囤积居奇的剥削者,才能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才能把农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引导农民抛弃资本主义的道路,而逐步地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使他们懂得,如果不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粮食政策,听任粮食的投机行为和剥削行为自由地发展下去,即是说,听任农村经济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自由地发展下去,其结果,除了少数的投机者和剥削者变为资产阶级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将会陷于被剥削被奴役的贫困地位。所以必须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政策,才是对农民有利的。使他们懂得,国家工业化的建设,是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农民的最高利益,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才能够使国家有可能用机器来帮助农民发展集体农场,以便于大大地和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并有可能供给农民以丰富的和便宜的生活资料,

因此，大力帮助国家工业化的事业，拥护国家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政策，乃是农民对于国家的一种重要义务，是农民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农民是一定拥护的。

必须指出，实现这个政策，争取劳动农民，克服农民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的这种落后方面，孤立从事粮食投机的少数分子，这是一件极其复杂极其艰苦的新的工作，故须全党动员，全力以赴，才能做好这件工作。必须大量抽派得力的能够掌握政策的干部，到农村中去，中央局、省委、地委及各级政府的负责同志，在计划收购的时间内除留少数处理日常工作外，应亲自到下面去，研究情况，掌握政策，创造并及时推广经验，尽可能地减少偏差和错误。特别是对于农村大约百分之十的落后地区和落后乡村，尤须十分注意掌握，并派得力干部坐镇，因为这是最容易出乱子的地方。

最后，在时间的安排上，为使工作做得充分，要求各地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底以前，完成各级的动员和准备；并确定于十二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开始农村的统购工作。至于城市的计划供应，则可根据各地情况，酌定适当日期，报经中央批准后，提早开始实行。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实行 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央同意中财委(财)关于目前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办法的报告，并决定下列两点：

(一) 批准中财委(财)提出在全国计划收购花生仁八七二、

四〇〇吨，芝麻三一一、〇〇〇吨，菜籽四三一，四〇〇吨及其他杂油料一三〇、七五二吨，以及对各大区所分配的数字，请各地即在计划收购粮食时一同收购。其中油菜籽则待一九五四年春熟时另行收购。上述收购总数望能争取完成（炒花生可以限制，多用榨油）。至于个别品种如需调整，请和中财委（财）商定。

（二）为了适应统购统销的业务，请各大区、各省、市加强油脂业务机构。

附：中财委（财）关于目前食油的产销 情况及处理办法的报告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目前食油供应的情况是紧张的，特别在城市如上海、广州、唐山等地。食油供应紧张，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较长时期带根本性的困难问题。主要原因是生产不足，产量只达战前百分之七十六，解放后生产恢复的速度慢，和内销、外销增长的速度快，不相适应。三年来生产未增加，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七万吨（油料皆折油——下同），仅增加百分之三点八，一九五三年又减产，竟低于一九五一年的水平；三年来内销每年增加约十万吨（根据几个省的典型调查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到十）；三年来的外销每年增加约在八万吨以上（非食用油未计在内），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增加十一万吨，一九五三年又比一九五二年增加近八万吨。在全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工农业生产一般的皆超过了战前水平，人民生活消费较为提高，国外需要我国出口的油脂量也大增，而油料作物生产仍大大落后于战前水平，

便不能供应国内、外的需要。这种严重的产销不平衡，是目前食油紧张的根本原因。

一九五二年内销食油有积压，国营公司及合作社皆叫“油多”，这是市场上一时不正常的现象。一九五二年初“三反”“五反”时，市场营业缩小，国营公司收购多，销售少；合作社在农村大量经营油饼，掌握的食油，一时销售不出，便误认为食油数量过多，而社会生产量当时并无多大增加。一九五三年从第二季度起，由于在第一季度出口多至十四万吨（一九五二年第一季度只出口四万吨），内销量又增大，市场便开始紧张，调度困难，许多地方市价高于牌价，私商投机活跃。估计一九五四年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发展。由于一九五三年灾害减产，可供一九五四年内销数量比一九五三年估计要减少八万吨，加上由于人民购买力增长而增加的购油量，估计不会少于七万吨（中央商业部估算）；因此一九五四年国内市场缺油的情况便会比一九五三年更加严重，约计缺少十五万吨左右。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照目前自由市场的收购与供应的方法继续下去，农民惜售，私商投机，黑市价高涨，产油区封锁缺油区，这些情况就会继续发展。如城市、工矿区得不到必要的供应，将会发生混乱局面，外销计划也难以保证，问题是严重的。

中财委（财）为此召开会议，研究了全国食油产、销的情况，并提出解决今后食油不足的措施，报告如下：

一、全国食油产销的基本情况

（一）全国食油生产情况：战前一九三五年产量为二二二万吨（油料折油），一九五二年只达到一六九万吨，较战前相差五三万吨。油料作物总面积未减少，单位面积产量降低很多。菜籽产量比较战前相差很远，约当战前百分之三十五，芝麻相当战前百分之六三，花生接近战前水平。解放以后，生产恢复很

慢，一九五一年较一九五〇年增长较快，一九五二年增长很少，一九五三年不但产量未增，而且低于一九五一年。产量增长不快的原因，主要是没有领导增产，农民只注意粮食增产，未重视油料。同时在经营政策和价格政策上有过错误。一九五二年误认为“油多”；收购控制数字太少，收购价格也偏低，农民自然无心增产，加以今年灾害影响，减产较多，其中突出的是花生，山东、河北等花生的集中产区，皆告减产，估计一九五三年食油的总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减少十万八千吨。

（二）食油出口增长情况：战前一九三六年出口总量为二六万八千吨（较高的一年），一九五二年出口为二六万吨（非食用油未计——下同），已接近战前。一九五三年增长至三三万七千吨，比一九五二年外销增加接近八万吨，外销量约占产量百分之二一点三，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战前出口主要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极大部分向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一九五三年向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出口二六万吨，占总出口量百分之七〇。出口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外兄弟国家要得多，很难减少；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以此增加外汇，换进基建设备（一吨食油可换四吨钢材）。但一九五三年出口增加八万吨，是由于误认一九五二年油料积压，带有盲目性的。

（三）食油内销数量是逐年增大的：国营公司在城市的销油量一九五一年为二〇万吨，一九五二年为二九万吨，一九五三年为三九万吨。合作社在农村销量也不断增加。合作社为了大量掌握油饼，在乡村就近榨油，因此乡村供油量也便增加了。农村销油增加使城市的食油供应更加紧张。但是另一方面可供内销的数量却又逐渐减少。一九五二年可供内销量是一〇二万吨，一九五三年为九七万吨，预计一九五四年可供内销量只有八九万五千吨，少于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三年可

供内销量不足还可以库存量弥补。油脂公司在一九五二年三季度末的库存量为九万一千吨。到一九五三年三季度末已减至三万二千吨，落在合理库存量以下。一九五四年度，收购减少，销售增加，库存不足，食油紧张极为严重，便无法弥补。

（四）公私比重的变化：三年来在外销与国内市场中公私比重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油脂出口上，国营比重一九五一年占出口总量的百分之七五，一九五二年增长至百分之七七，一九五三年增长至百分之八十七。在国内市场中，收购方面一九五一年国营和合作社收购量占商品量的百分之四十四，一九五二年增长至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五三年则增长至百分之七十四；供应方面增长的比例，大体是相同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经逐渐增加。一九五三年下半年由于停止葫麻籽、芥菜籽等出口，私营出口商更加削弱。国内市场，由于华东等地区的食油紧张，加强了对私商的管理，国营及合作社的阵地扩大，私营比重也更形缩小。

二、解决食油问题的措施

解决今后食油困难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必须增加生产。为此，应积极增加各种油料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并扩大菜籽的播种面积，利用未耕沙地多种花生。对不影响粮食产量的油料，如茶油、葵花籽、大麻籽、花椒油等尽可能增加产量。具体作法，农业部将提出今后增产的办法，并加强对油料作物生产的领导（农业部将另作报告）；商业部需酌量提高油料的收购价格。

但增产是不能立刻见效的，为了缓和一九五四年食油市场的紧张形势，必须采取下列办法：

（一）实行计划收购（即统购）：对油料作物的统购和粮食统购一同进行，不另订时间，也不另立名目，全国在一九五三年度（一九五三年十月到一九五四年九月），共统购花生仁

八七二、四〇〇吨，芝麻三一、〇〇〇吨，菜籽四三一、四〇〇吨，葫麻籽九二、四〇〇吨，芥菜籽一二、四〇〇吨，茶油二五、九五二吨。共折油六十八万五千吨，分配各大区的数目如下：

1. 华北区：花生仁一〇〇、〇〇〇吨，芝麻一五、〇〇〇吨，菜籽六、五〇〇吨，葫麻籽五四、四八〇吨，芥菜籽一二、四〇〇吨。

2. 东北区：花生仁六五、〇〇〇吨，芝麻一五、〇〇〇吨。

3. 西北区：花生仁五、〇〇〇吨，芝麻四、〇〇〇吨，菜籽一三、一五〇吨，葫麻籽三七、九二〇吨。

4. 华东区：花生仁四六五、九〇〇吨，芝麻五〇、〇〇〇吨，菜籽一二一、六〇〇吨，茶油一、〇五二吨。

5. 中南区：花生仁一九三、五〇〇吨，芝麻二二一、〇〇〇吨，菜籽一六八、一五〇吨，茶油二四、九〇〇吨。

6. 西南区：花生仁四三、〇〇〇吨，芝麻六、〇〇〇吨，菜籽一二二、〇〇〇吨。

再加上由粮食部统购的大豆可榨油一五〇、〇〇〇吨，合作社收购的籽棉可以榨油的一五〇、〇〇〇吨共三〇〇、〇〇〇吨，连前共可收购到食油九八五、〇〇〇吨。

(二) 计划收购的办法：在花生、芝麻的集中产区，由各中央局根据各区所分配的油料收购数字，分配给各集中产区的省和地方（专区或县），和统购粮食一同布置，一同收购，以保证收购到必需的油料。在集中产区由于商品性高，统购的比率（即统购数量占产量的比例）可以较一般地区提高（大约花生占百分之七〇左右，芝麻占百分之六五左右）。在花生、芝麻的一般产区则由各中央局根据各地油料作物的产量，除去在集中产区的收购数字，分配给各省一定数目，追加在粮食收购数字

内，随粮收购。即在统购粮食时，一律允许农民交纳油料作物，规定合理的油粮比价，使农民乐于交纳油料作物以代替粮食。各种油料的收购价格，由中央商业部另行电告。

（三）对油商的管理：在统购区统购油料时不准私商收购油料。统购任务结束后，农民的剩余油料是否可以向当地榨油坊出卖或只准卖给国营公司或合作社，此点待研究后另行决定。在未实行统购油料的省区，则仍准私商购销油料。

（四）在食油供求紧张的情况下，一九五四年在大、中、小城市势将实行计划供应（统销）。但由于农村中缺油户比缺粮户更多，对农村人口的定量标准不易确定，定少了农民不满意，定多了无法供应。因此，对食油计划供应的范围及办法，尚待研究。同时食油计划供应的时间，可以略迟于粮食的计划供应。

（五）采取下列办法扩大油的来源：（1）扩大推销煤油八万吨，希望以此换出一部分燃灯植物油来供应市场；（2）以动物油来代替工业上一部分植物油的消费量；（3）尽可能提高榨油率，从原来供应土榨的油料中转出一部分供给机榨；（4）试行榨谷糠油、骨油等。

（六）为了缓和食油市场的紧张程度，一九五四年食油出口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规定的控制数字减少十万吨。

（七）目前国营与合作社的油脂业务机构是不统一的，为了适应统购并准备担负统销的任务，必须加强中商部的油脂公司，以此为中心来组织国营与合作社的油脂业务机构。

中共中央批准“中财委(财)关于实施棉布计划供应和棉花计划收购的报告”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

中央同意中财委(财)关于实施棉布计划供应和棉花计划收购的报告,特发给你们,望加强对于各项准备工作的领导。

附：中财委(财)关于实施棉布计划供应和棉花计划收购的报告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 从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为人民衣着所必需的棉花、棉纱和棉布,也和其他许多消费品一样,都感到供不应求。这一趋势,今后还要继续发展。为了保证生产、调节消费、稳定市场以支持工业建设,除已实施统购的棉纱应加强管理、按计划供应外,必须及时采取棉布计划供应(即统销)与棉花计划收购(即统购)的措施。

(二) 一九五〇年以来,除一九五二年因“三反”“五反”,市场曾一度滞销,情况比较特殊外,其他几年,棉布生产增长的速度,都落在社会需要增长速度之后。一九五一年产布八、六八四万匹,比上年增百分之十九,而市场销售(不包括军用)七、七三五万匹,比上年增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五三年产布一四、六二七万匹,比上年增百分之二十七,而市场销售(不包括军用)一三、三

九七万匹,比上年增百分之四十七。一九五四年后,棉布供不应求的情况,将更为突出:一九五四年计划产布一五、六六九万匹,社会需要(包括军用)与国家储备需布一六、六八三万匹,不足一、〇一四万匹。市场销售计划压缩的结果,仅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三,这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四年中市场销布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十一左右的情况,是很不相称的。一九五五年后,由于棉花增产受到限制,棉布产量增加的速度,将更缓慢。如一九五五年计划产布,比上年只增百分之二点八;一九五六年比上年只增百分之七点八;一九五七年比上年只增百分之六点四。根据以往几年棉布社会需要增长速度的情况来看,今后几年计划产量的增长速度,肯定是和社会需要增长的速度不相适应的。

在上述情况下,国家如不及早将全部棉布货源掌握起来,实行计划供应,就可能出现供应脱销、市场混乱、物价波动的不利局面。一九五四年棉布库存虽尚充裕,但秋后粮、油再加棉花计划收购后,农民拿到了大量货币,就难免不向棉布冲击;等到一九五五年春发生供应不足,库存削弱时再来实行计划供应,就会陷于被动。虽然在秋季各地任务繁重,此时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在工作安排上是比较困难的,但为了今后能保存棉布实力,稳定市场,从整个国家建设的要求出发,还是在一九五四年秋旺季开始前(八、九月间)实施棉布计划供应,较为及时而且有利。

棉布计划供应,采取全国城乡一律分区定量凭证供应的原则,亦得在分配各省、市供应的控制数量内,由各省、市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供应方式。在分配供应数量时,拟根据一九五三年销售实绩适当压缩城市消费,适当增加农村供应并适当照顾各地不同的购买力水平、消费习惯和气候寒暖等条件,而不能采取简单的平均主义的做法。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般应足量供应。

棉布计划供应是一件繁重复杂的新工作,我们又没有经验。

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前,各地必须充分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以便八、九月间能顺利实施。必须明令公布机织棉布、洋经洋纬及洋经土纬的手工织布全部由国家统购,不准私营厂商及织户自由出售(对土经土纬的手工织布,国家可不全部收购,得留一部分在农村小量交换,互通有无,以适应农民使用土布的习惯);必须扩大棉织品(包括针织品)的加工、定货,尽量压缩自由市场;必须进行研究,提出具体的棉布计划供应方案。在计划供应实施前,必须统购批发商的棉布,并对批发商及其职工负责安排;必须调查棉布零售商和摊贩情况,以便进行管理、利用和改造,并提出安排办法。在实施计划供应前,还必须做好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

至于与衣着有关的汗衫、卫生衫、棉毛衫、毛巾、袜子、线毯等针织品,均直接间接与用布有关(农村有以白布做毛巾的,也有用布做袜子的),如棉布实行计划供应,这些针织品,都可能会增加消费。但针织品品种复杂,数量零星,如同时实行计划供应,困难很多;好在棉纱已全部掌握,通过棉纱的控制,可以适当限制针织品的生产,不致盲目增产而过多地消耗棉纱,以致影响棉布的生产。故一九五四年拟暂时仍通过市场供应,必要时通过价格予以调节。其他丝织品、毛织品、麻织品等,供应比重很小,目前均暂不拟实行计划供应,必要时亦可在价格上予以调节。

(三) 原棉的增产是我国棉纺织品增产的关键。从一九五〇年以来,在中央正确的增产政策指导下,经过生产部门的努力,年产量至一九五二年达二、五八四万担,比一九五〇年增百分之八一点九七,基本上已能满足工业生产和社会需要。但一九五三年由于农民多种粮食、少种棉花,加上某些地区发生灾害,棉产量减为二、三五三万担,比一九五二年减少百分之九,以致不得不进口部分外棉,以维持生产。今后的外汇不可能用于进口棉

花；国内棉田的扩大，因受粮田的限制，有一定限度；单位面积产量，在农业没有集体化以前，亦难以迅速提高。因此，五年计划中只规定一九五四年计划产棉二、七五四万担，比上年增百分之十七；一九五五年比上年增百分之十二；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每年均递增百分之十。实现这个计划，要很大的努力；就是这个计划实现后，也还是不能满足今后几年人口增长和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对原棉不掌握必要的数量，有计划地分配使用，就很难保证棉纺织工业及市场絮棉的供应。如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五年八月间，估计机器纺织用棉至少需一、九二〇万担，部队用棉三〇万担，国家供应民用絮棉三三〇万担，全年损耗二〇万担，国家就必须掌握二、三〇〇万担，即须占一九五四年计划产量二、七五四万担的百分之八十四（过去几年棉花收购约为产量的百分之七〇至八〇），始能满足各方需要。但在小农经济存在，国家对农村物资供应尚不能完全满足需要、棉农惜售及今后布匹供应又较紧等情况下，若仍采取自由收购的方式，就很难完成二、三〇〇万担的收购任务。为此，一九五四年新棉上市，即应开始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以防止私商抢购与棉农惜售，节约民用絮棉，并适当压缩土纺土织，这样才能保证机纺用棉和军用棉。如决定棉布实行计划供应，则农民更可能惜售棉花，更非实行计划收购不可。

一九五四年完成二、三〇〇万担的计划收购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且计划收购量占产量的比率较往年为高，民用絮棉及手纺用棉难免紧张。因此，在新棉上市前，必须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必须在棉花成长期间，采取有利棉花增产的各项措施，鼓励棉农生产积极性，保证棉花产量按计划以至超计划完成；必须明令公布取消私商、小贩经营原棉，禁止自由买卖，由合作社代国

家进行计划收购；必须明令公布并动员棉农除自用棉外，其全部棉花应按国家规定的时间和价格出售给国家；必须对土纺土织的手工业户，分别进行登记，并适当加以管理，以便掌握仅仅维持其生产，不让发展；必须号召节约絮棉，调剂与掌握絮棉供应。

由于合作社几年来包收棉花的结果，经营棉花的私商基本上已消灭；但在四川、河南、山东等国家收购比重较小的地区，可能还存在少数棉花小商贩。在计划收购后，对这些商贩应妥善安置，以免造成社会失业。

（四）上述实施棉布计划供应与棉花计划收购的意见，中财委（财）曾在最近召开的各大区财委副主任会议上加以讨论，原则一致同意。关于棉布计划供应与棉花计划收购的具体方案，已责成中央商业部于七月初召开专业会议加以确定。

以上报告，中央如认为可行，请批转各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党委，并请各级党委加强对棉布计划供应、棉花计划收购准备工作的领导。

粮棉油统购统销的历史作用

户 佳

统购统销是我国政府在建国以后陆续实行的对粮食、棉花、油料等有计划地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一项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出现了一个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使亿万农民从土地的奴隶变为土地的主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空前发挥,全国农村经济迅速恢复,粮食连年丰收。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088亿斤,比1949年增加926亿斤,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八,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粮食贸易由解放前的大量进口,转变为停止进口并可少量出口,同时保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底子薄弱,人口众多,1952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只有500多市斤,基数是很低的。城市和工业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使粮食需要量不断增加。1953年夏季以后,全国粮食形势已变成国家“收进的少,销售的多”,该年七、八、九三个月,粮食销售超过计划19亿斤。加上1953年东北等一些主要粮食产区遇到水灾等自然灾害,光东北地区减产粮食30亿斤,使国家粮食收购量减少24亿斤。粮食的自由交易,粮食投机商的囤积居奇,使农村中的余粮户贮存观望,等待高价,不愿迅速出售粮食。这些情况影响国家粮食收购计划的完成。据陈云在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上的估计,

从当时的情况看,不但粮食的收购计划将完不成,而且粮食销售量会突破 1953 年财经会议上定的 480 亿斤的计划,将达到 600 亿斤。这对全国粮食市场会产生巨大影响,粮食问题的紧张,对于一个革命刚取得胜利不久的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将造成粮食市场的混乱,影响物价的稳定。因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

民以食为天。对于粮食、棉花、油料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活资料,在不能保证完全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不采取断然的管制措施显然是不行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1949 年 9 月制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28 条,就曾指出:“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显然,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把粮食供应放在长期稳固的基础之上,除了努力促进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化和技术改良,借以增产粮食,把粮食生产发展的速度逐步提高到足以保证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水平外,必须采取在全国范围内的粮食(这是最主要的,其次是棉花和油料)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政策。

陈云作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对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实施、贯彻和研究、解释等方面均起了重大作用。他早在 1950 年 12 月,就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从 1951 年起对棉纱实行统购。1953 年 6 月 25 日,他又致电周恩来,提出粮食要统筹统支。同年 10 月 10 日,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作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提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政务院在陈云讲话的基础上,于 1953 年 11 月 23 日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中,陈云认为,在解决粮食问题时,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

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①。

我们党正确地处理了这四种关系。为了使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物资供应得到保障，我们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8条关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的规定，决定对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这个《决议》所提出的一些主要措施是：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的政策；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政策，即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的政策；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实行在中央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这个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还指出，实行这些政策，“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加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

同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同年11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十条具体办法。

^① 《陈云文选》（1949—1956）第206页。

195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财委关于实施棉布计划供应、棉花计划收购的报告。同年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

为了贯彻执行粮食这种最重要物资的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

通过这些具体的决定和命令，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以及糖料、烤烟、生猪、桐油、重要木材、茶叶等其他农产品实行了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供应。

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在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基本商品匮乏的情况下，起了有效保障城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广大人民基本生活资料需要和稳定物价的作用，妥善地解决了粮食供求的矛盾，也促进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当时来说，这个政策是必要的步骤和措施。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它对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统购统销政策也有局限性。这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得到发展时日益显露出来。由于产品统购统销，农民用不着根据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缺乏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农产品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求，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商品流通受到阻碍，不合理的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得不到调整。

近几年来，随着党的农业生产政策不断放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紧缺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统购统销政策需要逐步加以改变。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规定粮食、油料在完成统购任务后,可以实行国家、集体、个人等多种渠道经营。同年12月,全国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实际上取消了对棉布的统销政策。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同年3月25日全文公布了这一文件。这个文件规定取消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统购政策,实行多种渠道经营。可以预言,在粮食、油料等主要农产品进一步丰富以后,统购统销政策将全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正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但是,粮食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由于我国可耕地少,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粮食数量较世界平均水平低,而且11亿人口的吃饭不可能指望依靠国际粮食市场,所以粮食的形势现在仍然是严峻的,不容过于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建国初期的粮食、棉花和油料的统购统销,更可看出它的历史作用。